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90

人民的春天

阿拉伯革命的未来

The People's Spring: The Fut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嵇 飞/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0年12月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成为随后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运动的导火索。2011年，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及骚乱迅速蔓延至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将其称为“阿拉伯之春”。

但这场运动能否实现人们寄予其中的希望呢？本书作者阿明在书中透彻地分析了这一运动的起因、过程及结局，深刻地表明，尽管这场“春天”恰遇资本主义的“秋天”，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为了把创造未来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避免倒退到伊斯兰化之中，阿拉伯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寻找到积极的、真正适合阿拉伯国情的崭新之路，并与世界人民一起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



The People's Spring: The Future of Arab Revolution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7920-0



9 787509 779200 >

定价：68.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90

人民的春天

阿拉伯革命的未来

The People's Spring: The Fut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嵇 飞/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 /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嵇飞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书名原文：The People's Spring: The Fut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

ISBN 978 - 7 - 5097 - 7920 - 0

I. ①人… II. ①萨… ②嵇… III. ①政治事件 - 研究 - 中东 - 21 世纪 IV. ①D7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357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90

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

著 者 / [埃及]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译 者 / 嵇 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仇 扬 杨 慧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7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20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5 - 068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Samir Ami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由萨米尔·阿明授权翻译出版，根据英文版译出。版权所有。

英文版导言： 论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前景

2011年5月，我将本书最初的法文版交予出版社，这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我想对此进行一些评论。

为什么发生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年初所发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起义并非事出突然，如果说西方大国感到吃惊，阿拉伯的不少活动人士却对此早有预见。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期间（1955~1970年），阿拉伯国家正处于南方各国及其人民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和较为公平的全球体系而斗争的最前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布迈丁、埃及的纳赛尔政权、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还有南也门共和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根据西方的标准，它们不是“民主的”政权（它们的国家实行一党制），甚至根据我们的标准它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意味着积极赋予人民权力。但尽管如此，它们在其人民的眼中却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取得了切实的成就：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权利，工业化，就业保障，向上的社会流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独立自主和反帝立场有关。它们因此不断受到

西方大国持续、猛烈的打击，这尤其表现为以色列的多次入侵。

在短时间内，就说 20 年里，这些政权取得了其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后，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们偃旗息鼓了。恰好此时苏联解体，这助长了帝国主义者的新自由主义攻势。统治阶层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而选择了退缩和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其结果是社会状况的急剧恶化，仅仅几年时间便丧失了民族主义的平民国家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益处原为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得，但现在则是遍地的贫穷和失业，而这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正常后果。这些都为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有一点很奇怪，“民主革命”最强烈的支持者——他们呼吁西方来拯救他们——当中，有些正是热心支持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领导人。

因此，起义并非事出突然，许多迹象已经表明它们将会发生，比如说突尼斯矿工的罢工（发生于加夫萨市），2007 ~ 2008 年在埃及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小农因富农对其加剧剥削而进行的日益强烈的抵制运动，以及诸如凯法雅（意为“受够了”）之类新兴中产阶级组织的抗议活动。我还想指出，巴林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示威，但它们被沙特阿拉伯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西方对此丝毫没有表示不满），另外，在也门，基地组织被“引入”，其目的是抵消来自进步力量的“威胁”，而进步力量在南方国家尤其强大。

这个阶段以突尼斯和埃及举行选举告终。

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在选举中获胜

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在埃及选举中获胜（2012 年 1 月）并不奇怪。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了社会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所谓“非正式的”经济活动的急剧扩张，在埃及它为一半以上的人口

(根据统计数据, 达到 60%)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穆斯林兄弟会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 它能够利用社会状况的这种恶化并使这种恶化持续下去。其意识形态恰好赋予了这种原始的集市经济某种合法性。由于有大量的资金供其使用 (由海湾国家提供), 它得以采取有效的行动: 为非正式经济提供预付款以及开展慈善工作 (医保中心等)。兄弟会就这样逐渐取得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 而且使得这个社会有赖于它。不过, 如果它没有完全迎合海湾国家、华盛顿和以色列的目标的话, 那么它的成功原本不会来得如此容易。那三者是亲密的盟友, 它们有着共同的想法: 阻挠埃及实现复兴。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埃及将意味着由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所组成的三角霸权的终结: 海湾国家希望埃及顺从于其在社会伊斯兰化问题上的话语权; 对美国来说, 买办化的、贫穷的埃及仍将与其一伙; 而对以色列而言, 积弱的埃及会令巴勒斯坦孤立无援。

因而, 推行令“埃及革命”流产的计划将会确保自萨达特以来一直实行的那个体制得以持续, 那是一个建立在军事统治与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结盟基础之上的体制。不过, 事实证明, 要让这个联盟把其所握有的利益拿出来与兄弟会分享, 这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2011 年 10 月, 突尼斯进行了选举, 从中所产生的制宪会议由一个右翼集团主导, 这个右翼集团汇集了伊斯兰教的政党——伊斯兰复兴党的众多人士, 此外还有无数的反动人士, 他们曾是本·阿里政权的一部分, 现在也仍然在位, 并且以布尔吉巴主义的名义渗透到各个“新政党”之中。他们全都无条件地支持市场经济——虽然它并非完美无缺——换言之, 他们支持一个依赖、附属于别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和美国所要的正是这个: “如果我们想要让事情保持不变, 事情就不得不有所改变。” (引自兰佩杜萨的小说《豹》)

尽管如此，有两项变化已经被提上了日程。积极的变化是将实行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民主（一种低密度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将会容忍不同的意见，对“人权”比较尊重，它会终止前政权的那些恐怖行径；而消极的变化则是在对待女性方面很可能将会出现倒退。

换言之，它将会回到一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实行多党制的布尔吉巴主义。西方大国的计划建立在反动买办集团的力量之上，这个计划就是迅速结束这个过渡期（没有考虑这场运动的后果便对其加以接受），不让这场社会斗争有时间组织起来，这样好让反动集团通过合乎体统的选举而独占合法性。突尼斯的这场运动并没有对遭遇推翻的政权的经济政策发生很大的兴趣，其批评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其家庭的腐败上。许多抗议者，甚至左派抗议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布尔吉巴和本·阿里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基本导向并无质疑。其结果因此可以想见。

不过，有时相同的原因会带来相同的结果。如果埃及和突尼斯的平民阶层看到社会状况无可挽回地恶化，造成普遍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恶化，他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现在对此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事实，即只有迅速地对激进的左派进行整合（其行动纲领远远不止要求举行正规的选举），才能回归名副其实的为变革而斗争。制定社会民主化战略——远非仅仅举行正规的选举，而且还要将这种民主化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激进左派的责任所在。这将意味着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强化本国在国际上的自主权，即表明独立和公开反帝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垄断者及其在国际上的仆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不会帮助埃及这些国家从其当前的困境之中摆脱出来。寻求南方国家中新伙伴的帮

助会让这个过程变得不那么艰难。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并不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们所关注。革命的最终目的仿佛只是迅速进行选举——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仿佛就是投票箱。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合法性，那就是斗争的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以后将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正面对抗。

略论沙拉夫主义

沙拉夫主义（也称沙拉菲亚主义）是对拉希德·里达和穆斯林兄弟会愚民宣传的补充。它公开反对自由（因而也反对民主），这是由于在其看来，自由与人性相悖，因为人被造出来即为奴隶（请注意沙拉夫派的用词），是为了服侍他们的造物主兼他们的主人的。当然，这个学说没有说明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如何确定这个主人兼造物主的确切要求。比如说，它同意不同意增加工资？这就为宗教性的、伊朗式的统治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统治即教士的独裁统治中，沙拉夫派宣称自己是乌理玛，从而垄断了这方面的知识。

沙拉夫派是现代性的敌人，因为现代性植根于人类在处理世俗的事务和涉及人类社会的问题上所拥有的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发挥创造性就要拥有自由，就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这为沙拉夫派所排斥。沙拉夫派的领导人自称他们属于这个现代的世界，因为他们教其学生使用电脑、教他们商业管理知识（所使用的教材是由美国的援外机构国际开发总署所发放的内容极其平庸的小册子）。对此说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说法不仅滑稽可笑，同时还反映了此处的真正主人是风头正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要有仆人来玩这些花招，仅此而已。

穆斯林兄弟会与沙拉夫派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工。穆斯林兄弟会

需要一张民主“证书”，奥巴马给了它，而要拿到这张证书，它不得不把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即沙拉夫派切割开来。

阿尔及利亚的内部改革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在第一次“南方人民的觉醒”中，即在万隆会议所开启的不结盟运动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节节胜利的时代，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打头阵的国家。这是因为它们取得了真正的、进步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它们原本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后来这两个国家陷入了泥沼之中，最终它们接受了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那些国家和社会“同流合污”。

阿尔及利亚模式显示出一个清晰的迹象，那就是它具有更强的连贯性，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遏止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在。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现在仍然成分多元而内部分裂，一些人依然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另一部分人则聚集在买办政策的旗下，两者之间分歧严重（有时这两种彼此冲突的倾向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而在埃及，主导阶级在萨达特和之后的穆巴拉克之后已经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

出现这样的差别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很自然地带来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但在埃及，纳赛尔主义是在增长期接近结束之时形成的，它被1919年的革命引发，在1946年变得激进。1952年的那场意义不明的政变正是由于这场运动陷入僵局才发生的。

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后，其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赢得独立后所出现的新阿尔及利亚相比前殖民时代焕然一新。它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对于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其渴望之强烈在阿拉伯世界的

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在马格里布地区找不到，在马西利格地区也找不到。与此相反，现代埃及从一开始（始于穆罕默德·阿里）即由贵族所建立，这个阶层随后逐渐变为贵族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阶层）。这些差别导致了显然更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涉及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未来。侯赛因·贝拉洛夫在《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改革抑或革命》（即将出版）一书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已然暴露了其丑陋的面目，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至此就被束之高阁，但这与埃及的情况明显不同，在那里，买办资产阶级同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同流合污。

针对当前的挑战，这两个国家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不同，这源于两国上述的差别。在我看来，阿尔及利亚能够相对较好地（或者说相对不那么差地）应对这些挑战，至少在短期内会是如此。我觉得阿尔及利亚仍有机会推行从内部进行控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埃及的情况则相反：这场运动与反革命的反动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只会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在迄今无力应对这个挑战的所有社会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这两个国家都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没能摆脱困境的主要责任当然应由统治阶级和现有的权力体系承担。但对社会及其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斗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应该进行认真研究。

摩洛哥是否同样有希望实现和平的民主变革？我觉得摩洛哥人民会继续信守陈旧过时的教义，在君主制（君权神授）与国家之间不做切割。毫无疑问，这是摩洛哥人不理解萨拉威人的原因所在：撒哈拉地区的这些骄傲的游牧民对伊斯兰教另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禁止他们向除了真主之外的任何人下跪，即使是国王也不例外。

叙利亚的灾难

美国人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平民起义感到震惊。他们现在计划推动由其支持的小股力量的武装起义，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类似的运动可能出现之前抢先行动，从而占据运动的主导权。在利比亚，对这个战略进行的检验取得了成功（利比亚现在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我写作本文时，美国在叙利亚也获得了成功。读者们此处可参考我在《潘巴祖卡新闻》上发表的有关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文章。

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过去隶属于纳赛尔风格的民族主义民粹运动以及万隆会议时代的其他运动。由于在这个框架下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取得切实的成就，哈菲兹·阿萨德调整了自己的方向，他试图将以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与殖民主义相对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向右转，以保守主义的政策对外让步，希望由此获取利益，这反映在其“开放”（自由化）政策之中，类似于纳赛尔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之后所采取的路线。

这套做法在随后的历史中可谓一目了然。在埃及，纳赛尔1970年去世之后，这个国家马上毫无保留地屈服于由美国、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所组成的反动轴心的要求。在叙利亚，这种自由化造成了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结果，即穷人阶级社会状况严重、急剧的恶化，这损害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针对当前的事态发展，叙利亚政权面对民众抗议除了镇压还是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因此，在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牵头之下，一个条理清晰的计划已然成形，它的目的并非帮助叙利亚人民推翻独裁者，而是照搬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毁灭叙利亚这个国家。

很显然，这三方利益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1）对美国来说，

其目标是打破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对美国深入持久控制这个地区是个障碍；（2）对以色列来说，其目标是造成叙利亚的分崩离析，导致它分裂成几个弹丸大小的国家，彼此之间教派斗争不断；（3）对海湾国家来说，则是固化瓦哈比教派式的逊尼派独裁，尽管这种独裁将建立在对阿拉维派、德鲁士派和基督徒的屠杀和违法灭绝的基础之上。土耳其与美国一道，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永远不要忘记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在哈塔伊省，土耳其建立了招募和训练杀手（所谓的穆斯林）的营地，这些人渗透进了叙利亚。

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命运，阿萨德政权显然一直无力采取唯一有效的政策进行应对，即进行真正的改革和谈判。这是强化民主阵线的唯一途径，虽然有人力图使其无法发出声音，但民主阵线的各个组成部分目前是存在着的。这场涉及面广泛的运动已经拒绝了加入受外国势力操纵的所谓的解放阵线，但与此同时，它并不支持这个政权，对于将国家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沙拉夫派”的恐怖主义简单对立起来的战略，它也持反对的态度。

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及民主问题

我在本书中想要表明一点，即在让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成为热点的问题上，去政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去政治化当然并不局限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在南方国家的第一次觉醒之中，甚至在历史上，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热情褪去之后的社会主义阶段，它就是所有民族主义民粹运动的首要做法。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压制民主实践（我所说的民主并不简单地指举行多党选举），换言之，即对观点和政治建议，还有可能对发表观点和建议的体制的多样性缺乏尊重。政

治化要求实行民主，而除非赋予“对手”以自由，否则民主就无法存在。在所有的情况下，压制民主——它是去政治化的源头——是引发其后灾难的元凶。这可能表现为对过去（宗教或其他方面）的怀旧，也可能是实行“消费主义”和为西方媒体所鼓励的那种错误的个人主义，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人民来说即是后一种情况。不仅中产阶级崇尚消费（发展可能令他们受益），平民阶层也同样如此。对于平民阶层来说，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所以他们热切地盼望从中获益，即使所获利益少得可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合法的）。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种去政治化主要表现为明显“回归”伊斯兰教。通过非正式的集市经济，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屈膝投降的买办阶级和赤贫现象这三者得以结合起来。这并非埃及所独有。在多数阿拉伯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远至巴基斯坦，甚至更远都是如此。同样的结合也在伊朗进行：其集市经济的成功明显是“霍梅尼革命”的主要结果，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伊斯兰教的权力与集市市场经济之间同样如是结合已经令索马里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国家目前已经名存实亡。

当代的帝国主义针对这个地区（“大中东地区”）所推行的战略根本不以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为目标。它们的战略目的在于摧毁这些国家和社会，其手段则是支持所谓的伊斯兰教政权，因为这些政权保证了“贫穷愚昧的发展”（用我已过世的朋友弗兰克的话来说）得以继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断赤贫化的过程。最终取得的“高增长率”为世界银行所称赞，但它毫无意义，因为它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迅速扩大和绝大多数人的赤贫化。

伊拉克为这个地区提供了该种模式。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

已经被不少于三个（可能更多）政权所取代，它们以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和种族（库尔德人）为名实行恐怖统治，对基础设施和工业进行系统破坏，有计划地对数以万计的精英公民，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实施暗杀，还有就是摧毁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差），这样这个国家就只教授宗教和商业课程。这些也是针对叙利亚所设立的目标。

下一个被盯上的是伊朗，在针对这个国家时，借口是它在发展核武器，使用这个借口是因为如果美国的力量不积极参与进来，单凭以色列无法完成这个目标。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政权（它结合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和市场经济），伊朗都确实阻碍了美国凭借军事力量的部署来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所以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

当代帝国主义最终的真正目的，是遏制那些对于它来说最为危险的新兴国家（中国首当其冲），然后再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逼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中还可以加上俄罗斯，如果它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就有可能终结美国军事力量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意味着其他所有的南方国家彻底臣服，由此保证那个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独占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保证它们可以进行掠夺和浪费。这意味着更愚昧盲目的发展、进一步的赤贫和更多的恐怖主义政权的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也只有这些了。

因此，如果这场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在埃及和其他国家得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此问题，我们的周围全是令人放心的说法，这些说法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无论它们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有人说：“这就是命，我们的社会为伊斯兰教所渗透。这一点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它在强势出击。”仿佛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成功并非由于此前的去政治化以及社会状况的恶化遭到了有意的忽略。“这并不怎么可怕，

它的成功只是暂时的，现在得势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将会失败，而其失败将会导致公众不再支持这场运动。”这是华盛顿假装相信的论调，而或是出于投机，或是由于头脑不清，主流媒体和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也编造了这样的观点，也装作如此认为。

不，这不对。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对权力的操纵可能会持续50年。在它一天天削弱它所统治的社会在世界棋盘上的重要性的同时，其他国家则将继续前行。在这场可悲的“转轨”结束之时，这些国家在世界各国的排行榜中将会落在最后。

在阿拉伯世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政治化问题是挑战的核心主题。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不是在进步，而恰恰相反，它是在退步。垄断者的资本普遍高度集中使得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彻底地听命于它们成为可能，这甚至是一种必然的要求。总统权力的加强看起来似乎因人而异，事实却是它往往内在地服务金融财阀的统治。这是迷失的形式，它正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曾经一度由于工人阶级遭受彻底打压而得到了加强）连根拔除，致其不复存在，而以民主的闹剧取而代之。

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民主的雏形在其存在之处伴随着社会的倒退，这些地方的社会倒退相比中心地带依然更加暴烈，因此其信誉正在消弭。民主的倒退是去政治化的代名词。民主意味着公民来到舞台之上，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定规划，而不是仅仅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憧憬改变（轮流坐庄，换汤不换药）。但具有创新想象力的公民正在消失，他们正在被去政治化的个人所取代，这些人是政治生活中被动的观众，是被这个体系所塑造出来的消费者，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

社会的民主化与各国人民的再政治化，这两个进程密不可分。但该如何开始？这样的一场运动可以始于这两端之中的任何一端。什么

都无法替代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对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实际情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对希腊、中国、刚果、玻利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实际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一样。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整个世界都将由于这个体系的崩塌而陷入混乱（这种迹象已然出现）。果真如此的话，恐怕会有最坏的事情发生。

参考文献

Amin, Samir (2001a) "Lybia could break up like Somalia", Pambazuka, 7 September,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76091>, accessed 27 April 2012.

Amin, Samir (2011b) "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malia?", Pambazuka News, 17 February,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70973>, accessed 27 April 2012.

Belalloufi, Hocine (forthcoming) *La démocratie en Algérie: réforme ou révolution?*

Kimyongur, Bahar (2011) *Syriana, la conquête continue*, Charleroi, Couleur Livre.

法文版导言

2011年一开年，阿拉伯各国人民发起了一系列愤怒的起义。不过阿拉伯的这场“春天”能否解决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力量所面临的挑战？针对这个问题有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回答，它们各自的论点具有同样强大的说服力。

很久以前，在塑造古老的、前现代的那场全球化运动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或者更为广泛而言的伊斯兰世界）尽力成为一个发挥着积极作用的主角。不过它却无力避免自己的衰落，尽管在19世纪以及其后的20世纪里它几次辛苦努力，力图从西方大国推行帝国主义所形成的外围地带突围而出，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猛烈进攻之下，它仍然败下阵来。

要应对这个挑战，就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放弃逆潮流而动所产生的幻觉，也就是说放弃从“社会与政治的伊斯兰化”角度看待问题的幻觉。这并不意味着要向西化这蹩脚的东西靠拢——虽然西化能与正在进行中的伊斯兰化完全兼容——而是要解放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创造力（不是逆潮流而动，而是以创造未来为其方向）。如果阿拉伯各国人民想要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与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以积极的姿态塑造自己的未来，那么他们就必须这样去做。

为了进行反思并采取行动，我们有必要对阿拉伯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做出批判性的解读。它是在什么时候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我将在第二章的前面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的第一章对 2011 年爆发的声讨运动做出了一种解释，接下来的四章则在“全球史”的框架之下，针对阿拉伯世界在世界体系昨天和今天的地位，就其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追溯。

这四章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概念进行组织：枢纽、衰落、跃进和迷失。它们与阿拉伯世界在古老的世界朝贡体系以及随后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更替相对应。这些阶段相互之间有所重叠，这是因为有些旧有的特征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部分则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这些想法是在我此前撰写的大量文章之中形成的，这些文章有些专为阿拉伯世界（埃及、马格里布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国家”）而写，其他的则与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具有“全球”体系的性质。在本书中，我仅保留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层面。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进展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当中所提到的参考书目。

迟至 1500 年的世界体系仅仅关注了我们这个星球的东半球（欧亚大陆和非洲），而这个东半球（同样）是在对此时尚处于“前哥伦布时代”地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从 1500 年开始，这个体系所关注的是整个地球，在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之中把对各国的研究融为了一体。

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春天”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过去的 20 年里所经历的春天一样，是我所称的南方人民的第二次觉醒。第一次觉醒发生于 20 世纪，一直持续到它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击发生对抗为止。第二次觉醒则采取了多种形式，既有针对新

自由主义扩散所带来的专制独裁的猛烈反抗，又有“新兴”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质疑。这个“春天”因此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秋天”——普遍化的、全球化的、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与20世纪的那场运动一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处于体系外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重新获得独立，在于恢复他们在改造世界方面的主动权。因此，这场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帝运动，因此，潜在而言，它也是反资本主义的。

如果当前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地与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那些工人联合起来（后者有必要经历另一场觉醒），那么就有可能在全人类的层面展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前景。但这绝不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而注定发生的。资本主义的衰落有可能会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转变之路，但它也有可能导致人类堕入普遍的野蛮状态。这种可怕的前景可由三个因素的结合而产生：美国的军队以及美国在北约的唯其马首是瞻的盟国军队，它们力图以武力控制这个星球，这件事它们已经着手在做；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国家内部民主的衰落；还有就是起义之中的南方国家出于怀旧情绪而拒绝接受民主（其所采取的形式是“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所倡导的宗教极端主义抱有幻觉）。

因此，力争世俗的民主化在当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会决定未来各国人民是获得解放还是陷入野蛮状态。

目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90

英文版导言：论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前景·····	1
法文版导言·····	1
第一章 阿拉伯的春天？·····	1
第二章 作为古代世界体系枢纽的中东·····	27
第三章 衰落：马穆鲁克国、复兴运动的失策和政治性 伊斯兰教派·····	70
第四章 跃进：万隆时代与阿拉伯的大众民族主义·····	89
第五章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事业迷失于“再度买办化”·····	118
结论：巨大的挑战·····	183

第一章

阿拉伯的春天？

2011年一开年，阿拉伯人民便发起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充满了愤怒的起义。这个春天是第二次“阿拉伯世界的觉醒”的开始吗？或者这些起义将陷入僵局并最终流产——就像我在《南方的觉醒》一书中所探讨的那场第一次觉醒那样？如果前一种可能性得到了证实，阿拉伯世界的前进运动就将必然成为世界范围内超越帝国主义的那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失败则会令阿拉伯世界继续处在它目前仰人鼻息的边缘地位，阻止它崛起成为塑造这个世界的一支积极力量。泛泛而论“阿拉伯世界”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在这个地区内每个国家客观条件的多样性。所以我接下来将着力讨论埃及这个国家，它被普遍认为在其所在地区的总体变革之中扮演了并且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围地带，埃及是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甚至还是在19世纪之初，远在日本和中国之前，针对埃及及其在阿拉伯马西利格地区（马西利格的意思是“东方”，即北非的东部和黎凡特地区）的近邻，穆罕默德·阿里总督就设想并实际实施了一个振兴计划。这场蓬勃开展的实验占据了19世纪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直至19世纪70年代，到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的后半阶段，它

才偃旗息鼓。在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大英帝国残暴的外力入侵，它是那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武力入侵共有两次：先是1840年发动的海上攻势，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控制了赫迪夫的财政；第二次则是1882年最终的军事占领，英格兰一门心思追逐自己的目标：确保一个现代的埃及无法实现崛起。当然，埃及的那个振兴计划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它显然设想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崛起并凭借资本主义实现其崛起，这不同于埃及的第二次崛起尝试——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那个振兴计划自身的社会矛盾性，与其根本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假设一样，无疑要对失败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但以下的事实依然成立：正如日本那样，如果帝国主义者没有侵略埃及，那么这些矛盾性很有可能会得到克服。由于被英国打败，崛起中的埃及被迫在近40年里（1880~1920年）卑躬屈膝，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它的各项制度遭到更改，以服务于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积累模式。这种强加于它的倒退不仅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生产体系，还击垮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系统地强化了所有那些反动的、中世纪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从而让这个国家继续仰人鼻息。

埃及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它的精英阶层——从来都不曾接受这样的一个地位。顽强的抵制引发了第二波起义运动，这发生在接下来的约半个世纪里（1919~1967年）。事实上，我把这个时期看成斗争和重大进步运动的继续。其目的有三：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三个目标——不论其多么有限，亦不论其表述有时颇为混乱——彼此密不可分，就像现代埃及在那个时期密不可分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一样。照此观点进行解读，纳赛尔主义的系统化阶段（1955~1967年）只不过是那场始于1919~1920年革命的长期进步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埃及那半个世纪高涨的解放斗争从一开始即强调——随着 1919 年华夫脱党的组建——政治现代化，通过（1923 年）实行资产阶级形式的宪政民主（有限的君主制）和重获独立来实现政治现代化。设想中的民主就其形式而言允许逐步的世俗化（如果说它不是激进意义上的世俗化的话），其标志是把十字架和新月连接起来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在 2011 年 1 月和 2 月的示威游行中再次出现）。随后，“正常的”选举得到了允许，没有丝毫的问题，科普特人（埃及土生土长的基督徒）不仅可以被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所选举任职，这些人在被选上之后还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

在反动集团的积极支持下——这个反动集团由君主派、大地主和富农所组成——英国人竭尽全力阻止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 世纪 30 年代，独裁的西德基·帕夏废除了 1923 年的民主宪法，这引发了其与在反帝民主斗争中担当先锋的学生运动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兄弟会于 1927 年成立，其组建过程得到了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的积极支持，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后者的目的在于以此反制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威胁。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由拉希德·里达所制定，属于“伊斯兰”教义之中瓦哈比主义的最为落后的“沙拉夫”变种，是新生的“政治性伊斯兰教”中最反动的、反民主和反社会进步的思潮。

此时，墨索里尼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世界性的战争爆发在即，这迫使伦敦向民主力量做出了一些让步。1936 年，华夫脱党在吸取了教训之后，被允许重新执掌政权，英国与埃及之间的一部新条约也得以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所当然地造成了民主运动的某种中断。但早在 1946 年 2 月 21 日，随着工运和学运的合流，斗争的潮流日益高涨，而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登上舞台之后，斗争更是呈激进化之势。在英国的支持之下，埃及的反动派再次以暴力加以应对，为达成

此目的，他们动员了穆斯林兄弟会，形成了西德基·帕夏的第二轮独裁统治——不过，这未能阻止这场抗议运动。1950年，选举不得不举行，华夫脱党再次执政。该党废除了1936年的条约，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动了游击战，这些行动只是在开罗发生纵火案（1952年1月）之后才遭遇了挫败，而穆斯林兄弟会则深深地卷入了这桩案子。

1952年由“自由军官”发动的首场政变，更主要的是1954年纳赛尔借此上位的第二场叛乱，在一些人看来令此前不断进行的斗争运动达到了顶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导致了这场斗争的终结。纳赛尔主义抛弃了以上所提及的埃及觉醒观，它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完全抹杀了1919~1952年的全部历史，其目的在于将“埃及革命”的开始推至1952年7月。在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谴责了这种主张，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那两场政变旨在终结民主化运动的激进性。他们的分析没有错，因为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之后，纳赛尔主义仅有反帝斗争之形而无其实。纳赛尔主义随即贡献出了它所能付出的一切：一种绝对反帝的国际姿态（与泛阿拉伯运动和泛非运动有关）和某些进步的（却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这一切均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普通民众被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所有权利），甚至还废除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这招致政治性伊斯兰教前来填补由此而形成的真空。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1955~1965年），纳赛尔主义的斗争便耗尽了其进步的潜能。这为自此以后都将由美国领头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操纵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工具——以色列，从而实现分化瓦解这场运动的目的。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败北，这标志着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这场社会潮流的终结。其退潮的始作俑者即为纳赛尔本人，是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开放”当然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而没有坚持学生运动（在纳赛尔死前及死后不久，学生运动在1970年曾短暂地占据

了舞台) 等各方所呼吁的激进化斗争。其继任者萨达特强化并扩大了这种“向右转”，而且他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了他新的专制体系之中。穆巴拉克则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接下来的倒退持续了几乎又是半个世纪。埃及屈服于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需要和美国的战略要求，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完全不再作为一个活跃的因素存在。在其所在的地区，美国的主要盟国沙特和以色列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埃及和海湾国家的默许下，以色列随即得以不断扩大其对巴勒斯坦被占地区的殖民化进程。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建立起了一套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套制度虽然遭受了批评，但它至少统一而连贯。纳赛尔认准了工业化是摆脱殖民性的国际分工——在这样的分工下，埃及被迫接受棉花出口国的角色——的出路所在。他所实施的制度维护了这样的一种收入分配体系——既有利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又不会造成普通民众的赤贫化。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则肢解了埃及的这个生产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毫无章法的制度，它完全建立在企业的营利性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大多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企业的分包商而已。其所宣称的高经济增长率虽被高度赞扬了 30 年，但实际上并无一点意义。埃及的增长极为脆弱。不仅如此，这样的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还带来了令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饱受痛苦的高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爆炸可谓一触即发。而后爆炸发生了。

表面看来的“政权稳定”虽为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历届政府官员所吹捧，其基础却是一支由 120 万人所组成的庞大的警察队伍（军队的人数只有区区 50 万），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每天进行犯罪活动。帝国主义强国宣称这个政权正在“保护”埃及不受伊斯兰教的威胁，但这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事实上，这个政权让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控制了教育、司法和主要的媒体（尤其是电视），从而将

它们完全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中。唯一被允许的公开场合的演讲在沙拉夫教派的清真寺里进行，这让伊斯兰分子能够抨击政府，从而看起来好像是产生了“反对派”。美国政界人士的言论完全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因而呈现虚伪的两面性（在这方面，奥巴马并不亚于布什）。华盛顿在事实上支持政治性伊斯兰教，这摧毁了埃及社会直面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造成了教育和科研的灾难性的衰落），与此同时，华盛顿偶尔也会谴责这个教派的“滥权”（比如说针对科普特人的暗杀行动），这让它可以将自己的军事干预合法化为其所自称的“反恐战争”。只要这个政权手中还握有一个安全阀，即穷人和中产阶级工人大规模前往石油生产国务工，它就仍能显得“宽容大度”。随着这个安全阀的失去（亚洲的务工者取代了阿拉伯国家的务工者），反对这个政权的各种运动随即获得了复兴。2007年的工人大罢工（过去50年里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大的罢工），受农业资本剥削威胁的小农所发起的顽强的抵制运动，还有中产阶级人士当中民主抗议团体（例如“受够了”和“四月六日”运动）的形成，都预示着爆炸的不可避免——埃及人期待着爆炸的发生，外国观察者却深感震惊。解放斗争的大潮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分析其发展的方向和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主运动的构成成分

正在进行之中的这场“埃及革命”，撼动了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可能预示这一体系的终结。埃及人民的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将三个活跃的构成成分连为一体，这三个成分分别是出于自愿并以其自己发明的“现代”形式“再度政治化”的年轻人，激进左派的势力以及追求民主的中产阶级势力。年轻人（约有

100 万活跃者）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先锋。马上加入他们的则是激进的左派和追求民主的中产阶级。在抗议示威活动进行的头四天，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号召会众对其进行抵制（毫无疑问，示威者会被镇压工具所击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是到了后来，在示威活动为全体埃及人民所响应，动员起了 1500 万之众的示威者之时，穆斯林兄弟会才迟迟接受了这场运动。

年轻人和激进左派有三点共同的诉求：恢复民主（结束军警政权），采取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而不是屈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屈从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军事扩张的要求）。他们所呼吁的民主革命是一场民主的社会革命和反帝革命。尽管就其社会构成、政治及意识形态表达而言，这场年轻人的运动呈现多元色彩，但总体来说它是一场左派的运动。它对激进左派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而自发的同情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整体，中产阶级仅仅声援了这场运动中的民主化目标，他们并不必然彻底反对“市场”（就其当前的存在而言）和埃及的国际结盟安排。不应被忽略的是一群博客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在可以证明是美国中情局所组织的一场阴谋中，他们或者显身或者隐身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的主要推手通常是来自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他们极度“美国化”，但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现有独裁统治的反对者。在其网络上的论述中，虽然民主这一主题最为突出，但他们所表述的是华盛顿对此进行操控所需要的那个版本。这个事实使他们成为反革命链条当中活跃的一环，而这是华盛顿以东欧的“颜色革命”为蓝本，以“民主革命”为伪装，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活动。不过，认为推动民众起义的也是这场阴谋则是错误的。中情局所力图做到的是逆转这场运动的方向，令运动人士远离他们实现社会进步变革的目标，将他们导

入运动的歧途。如果这场运动不能整合各方的力量，不能就战略目标取得共识，不能创造性地采取有效的组织和行动形式，那么中情局的这个花招就很有可能得逞。因此而失败的社会运动的例子可谓多矣——只要看看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即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企图在埃及捍卫“美国式民主”的博客作者（他们用英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在网上写文章！）所表述的观点往往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地位的合法化。

这场运动中的这三个活跃的构成成分呼吁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这个呼吁很快便得到了全体埃及人的响应。虽然在起初的那些天里，政府的镇压极其残酷（致死 1000 多人），但这并没有吓倒这些年轻人及其盟友（他们从来没有呼吁西方列强提供任何帮助，不像在其他一些地方的人）。这场运动从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农村之中的各个角落聚集了 1500 万埃及人，他们连续多天（有时在晚上也是如此）不间断地进行抗议示威，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及其盟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压倒性的政治胜利所带来的结果使对方开始恐惧。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发现他们只得抛弃此前他们一直力挺的穆巴拉克。与此同时，军方的将领们打破了沉默，他们拒绝承担镇压的脏活（以此维护他们自身的形象），最终他们罢黜了穆巴拉克及其左膀右臂。

埃及人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积极的挑战。因为与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这些人远非是一个“同质的集体”。在其主要的构成成分中，有些无疑是运动可能渐呈激进化的力量源泉。人数达 500 多万的工人阶级进入战场，这就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历过无数次罢工因而斗志高昂的工人，从 2007 年开始在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有了 50 个以上的独立工会。由于废除了农业改革方面的法律，农业领域的剥削横行，小农对此进行了顽

强的抵制，这表明他们是这场运动中又一支激进的力量。不仅如此，广大的“穷人”也积极参与到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之中，他们往往还加入了由街坊四邻所组织的各种街道委员会，以“保卫这场革命”。这些“穷人”的络腮胡、面纱和他们的衣着打扮可能给人以埃及社会从骨子里来说是个“伊斯兰”社会，甚至这个社会可以为穆斯林兄弟会所动员起来的印象。但在事实上，是他们自发涌上了运动的舞台，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则别无选择，只能跟在他们的后头。因此一场竞赛正在展开：谁——是兄弟会及其（沙拉夫派的）伊斯兰教教徒，还是民主联盟——将能成功地与仍处于困惑之中的大众结成有效的联盟，甚至（这是我所反对的一个说法）“令他们唯其马首是瞻”？

在建设工人与民主力量之间的统一战线方面，埃及正在取得明显的进步。2011年4月，五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埃及社会主义党、大众民主联盟——它由此前“忠实的左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中绝大多数的党员所构成、民主工党、“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以及埃及共产党——它曾是全国进步工会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组建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通过这个平台，它们致力于共同开展斗争。同时，这场运动中所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种民主党派、独立工会、佃农组织、由年轻人组成的社交网络以及无数的社会组织）发起组建了一个全国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约有150个成员，穆斯林兄弟会及各右翼政党拒绝加入，这再次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它们反对革命运动继续下去。

对抗民主运动：反动的集团

与过去的起义斗争一样，埃及的民主社会运动和反帝运动起而对

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反动集团。对这个集团，我们或许能以其社会构成（当然是其构成阶级）加以识别，但同样重要的是依据其政治干预的方式以及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对其进行定义。

从社会角度而言，反动集团的领头者是埃及的整个资产阶级。过去40年里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依附性财富积累带来了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在伴随着“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而生的骇人听闻的收入分配不公之中，他们是唯一的一批受益者。他们约有数万人之众，这些人并非世界银行所称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所有人的财富全都源自与政治机构的沆瀣一气（腐败是这个制度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埃及目前的政治话语中，人们称之为“腐败的寄生虫”）。在当代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他们积极支持埃及成为美国的一个无条件的盟友。构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是军队里的许多将军、警察中的不少高官、与国家及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创建的国家民主党有关系的大量“平民”（文职官员），以及各种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及爱兹哈尔大学的主要教士，他们全都是亿万富翁。

当然埃及还有由活跃的小企业主和中型企业家所构成的资产阶级。不过，他们是买办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掠夺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往往沦为附属于本地垄断资本的次级分包商，仅仅起着外国垄断资本传送带的作用。在建筑业中，通常的原则是这样的：“大佬们”攫取了国家的建工合同，再将工程分包给“小喽啰们”。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是同情这场民主运动的。

农村里的反动集团同样不容小觑。他们由富农组成，作为纳赛尔农业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取代了此前富裕的地主阶级。纳赛尔政权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包含了富农和穷苦的农民，所以这个政权主要

是在为富人干活。但这个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贫苦农民所可能遭受的不公对待进行了限制。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这些措施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废除，农村里的富人随即开始加快了对穷苦农民斩草除根的步伐。在近代的埃及，农村里的富人一直作为一个反动阶级而存在，现在则比以前更甚。他们还是伊斯兰保守教义在农村的主要宣扬者，此外，由于他们与政府官员和宗教机构（在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地位等同于一座有组织的清真寺）之间存在紧密的（往往是家庭）关系，他们还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军方和警方的高官，但也包括技术官僚及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直接源于农村里的这些富人。

这个反动的集团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政治工具：军队和警察、国家机构、萨达特所创立的享有特权的国家民主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宗教机构（爱兹哈尔大学）以及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美国向埃及军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每年达 15 亿美元左右）从来都没有用于埃及的军事防务。相反，由于腐败的普遍存在（最大的讽刺是不仅知道并且容忍，而且还积极促成了腐败），军援所带来的后果极具破坏性。这些援助让军队的最高将领们将埃及买办经济的一些重要部分纳入了自己的囊中，以致“军队企业”成了一个人们见怪不怪的词。正因如此，通过自我任命而承担起指导埃及过渡过程责任的军方最高统帅部，虽然与镇压行动保持距离，以此显示自己的中立，但它实际上毫无中立性可言。它所挑选并服从的“平民”政府主要来自前政权的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人组成，后者采取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措施，其目的在于阻挠这场运动出现任何形式的激进化。在这些措施中，有一条是邪恶的反罢工法（以恢复经济为其借口），另一条法律则为组建政党设置了苛刻的限制条件，其意图在于按照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

组织倾向限定选举规则，因为这些教派在前政权系统化的支持之下已经很好地被组织了起来。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军方的态度依然不可预见。虽然其干部贪污腐败（其普通士兵是招募入伍的，而军官则是职业的军人），但其民族主义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此外，军队的大部分权力事实上被警察部门所攫取，军方对此心怀怨恨。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时也由于这场运动已经有力地表达了其将军方排除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之外的意愿，最高统帅部将来很有可能躲在幕后，而不是出现在选举中——包括总统选举，其日期目前仍然未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尽管警察部门明显依然保持了其完整性（没有考虑对其提出起诉），国家机构总体来说也是如此（新统治者全是来自旧政权的遗老），但国家民主党已经在风暴中消失，且其合法解散也已经成了命令。不过，埃及的资产阶级将会力保其政党改头换面重新出山，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政治性伊斯兰教派

穆斯林兄弟会是仅有的其存在不仅为前政权所容忍且得到其积极支持的政治力量。如上所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将教育、司法和媒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它。穆斯林兄弟会从来都不是也从无可能是“温和的”，更不必说“民主的”了。其领导人的称呼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导师”，他们是自我任命的，其组织也建立在不经任何讨论埋头执行领导人的命令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其高层领导完全由资产极其雄厚的人所组成（这部分要感谢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也就是说，要感谢华盛顿的资助），其中层领导来自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一般会众是通过兄弟会所运作的慈善服务（这些同样由沙特阿拉伯出资）而招募过来的底层民众，而其强制执行机构则

由在犯罪分子当中招募的民兵构成。

穆斯林兄弟会信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完全依赖外国的经济制度。它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于工人阶级的大罢工和穷苦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采取反对的立场。所以穆斯林兄弟会仅仅在以下两重意义上是“温和的”：一是它拒绝提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纲领，因而实际上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二是它在事实上顺从于美国对于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强力控制。因此它是华盛顿派得上用场的盟友（美国还有比沙特阿拉伯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资助者更好的盟友吗？），而华盛顿现在也正在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资质”提供证明。尽管如此，美国不能承认其战略目的是在本地区建立“伊斯兰的”政权。它需要维持“我们害怕这一点”的假象。这样，它就将“永远的反恐战争”合法化了。而在实际上，这场战争有着与其名称大相径庭的目的：用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地球，从而确保美国－欧洲－日本这三驾马车能够继续独享地球上的资源。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另一个好处，是其让这三驾马车得以在公共舆论中将“伊斯兰教恐惧症”的一面调动起来。众所周知，欧洲在这一地区没有自己的战略，它每天都满足于跟着华盛顿的决定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必要明确地指出美国的战略中这种真正的说一套做一套，因为这种做法已经相当有效地操纵了受到欺骗的公共舆论。美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欧洲）最害怕的是埃及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这样的埃及当然会扔掉经济自由主义，也当然会摒弃北约和美国的侵略性战略。美国将竭尽所能地阻止一个民主的埃及的出现，为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全力支持（对此它会惺惺作态地加以伪装）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虚假民主的替代品，而人们已经看到，在埃及人民的这场争取真正变革的运动当中，穆斯林兄弟会只不过是少数派。

当然，帝国主义强权大国与政治性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合谋既非什

么新鲜的事情，也并非埃及所独有。自 1927 年成立直至今日，穆斯林兄弟会一直都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集团的一个派得上用场的盟友。它也一直都是埃及民主运动的一个劲敌。现在领导着兄弟会的那帮亿万富豪们注定不会转而投向民主事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政治性伊斯兰教派显然是美国及其北约少数派合伙人的战略盟友。过去，在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期间及其之后，华盛顿给塔利班提供了武器和资金，让那批人针对其民族主义的、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政权（被称为“共产主义”政权）发动战争，他们称这些人为“自由斗士”。在塔利班关掉共产主义者所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时候，总是有民主人士，甚至是女权主义者马上出来宣称应该“尊重传统”。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得到了“传统主义的”沙拉夫派的支持，后者也接受了海湾国家的“慷慨”资助。沙拉夫派（狂热的瓦哈比主义者，对以任何别的方式解释伊斯兰教义均不予宽容）在采取极端做法方面毫无顾忌，他们也是针对科普特人展开系统性谋杀的幕后黑手。难以想象这些活动没有国家机器的默许（有时甚至是更可怕的暗中参与），而国家机器（尤其是司法部门）已经被移交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手中。这种奇怪的分工让穆斯林兄弟会得以显得温和：这是华盛顿试图让人假装相信的。尽管如此，我们预计埃及的各个伊斯兰宗教派别之间将会出现暴力冲突。这是由于埃及的伊斯兰教在传统上以苏菲派为主，苏菲派的各个兄弟会现在甚至拥有 1500 万之众的埃及穆斯林教徒。苏菲教派代表的是一种开放且宽容的伊斯兰教义，其所强调的是个人信仰而非宗教仪式的重要性（苏菲派称“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通往上帝之路”）。不过，国家政权对苏菲教派一直极为不信任，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对之，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其公开宣战。海湾各国的瓦哈比教派则与苏菲教派恰恰相反：陈旧落伍、注重仪式、墨守成规、敌视任何与自身理解不同的经文解读、敌

视任何的批判精神——对其来说，批判精神正是魔鬼魔性的体现。瓦哈比派的伊斯兰教认为自己在与苏菲派开战并力图消灭之，为达到此目的，它所依赖的是掌权者的支持。作为对此的回应，当代的苏菲派则呼吁宗教脱离公共事务，甚至是宗教的世俗化；它呼吁宗教与政治（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所承认的爱兹哈尔大学的宗教权威）之间的分离。苏菲派是这场民主运动的盟友。拉希德·里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将瓦哈比教派的伊斯兰教教义引入埃及，1927 年之后，穆斯林兄弟会接过了其衣钵。但只是在“二战”后的 60 年代，美国与当时普遍涌现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产生冲突，为此它与海湾各国结成了盟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海湾国家利用石油收入在埃及大力推动瓦哈比教义的扩散，它才得以真正做大。

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在低潮时期（1967 ~ 2011 年）主导着中东舞台的三个强权大国分别是美国——它是这个体系的老板——沙特和以色列。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国全都恐惧一个民主埃及的出现。这样的埃及是一个反帝及以民生为本的国家。它将摆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将令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丑角，它将再次唤醒阿拉伯民众的团结并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全球控制战略的一座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唯一的目的在于使埃及的这场民主运动流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它们力图给埃及强加上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所把持的“伊斯兰教政权”——这是它们令埃及永远屈服的唯一办法。奥巴马发表那些“民主演讲”只是为了欺骗天真的公共舆论，其中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共舆论。

为了让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合法化，很多人在谈论土耳其的例子（“已经变成了民主制！”），但这只是个烟幕弹。这是因为土耳其军队总是在幕后发号施令，不仅如此，虽然很难说它是民主的，而且它肯定是北约的忠实盟友，但它是土耳其“世俗化”的保证。华盛顿的计划——由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以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述——受到了巴基斯坦模式的启发：一支躲在幕后的“伊斯兰教的”军队，由一个或几个“经过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教政党所管理的一个“文官”政府。很明显，依据这样的假设，这样一个“伊斯兰教的”埃及政府将会因为它在关键几点上（永远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永远遵守自诩的和平协定，从而允许以色列继续其领土扩张政策）的屈服而得到补偿，同时，作为对其蛊惑人心之举的补偿，将会让这个政府推行国家和政治生活伊斯兰化以及暗杀科普特人的计划。这就是华盛顿为埃及设计的所谓美好的民主政治！显然，沙特阿拉伯以其全部的（经济）资源支持这个计划的实现。利雅得再清楚不过，其能否获得（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地区霸权取决于埃及是否被打压为侏儒。这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生活的伊斯兰化来做到，也即瓦哈比教派式的伊斯兰化全面开花，其中包括反科普特人的措施以及拒绝承认女性拥有同等权利。

这种形式的伊斯兰化是否可能？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其代价是极端的暴力。战斗将围绕已被推翻政权的宪法的第二条展开。这一条规定伊斯兰教的典籍是法律的源头所在。这是埃及政治史中的一个新玩意儿。1923年的宪法和纳赛尔的宪法中均无任何此类规定。在华盛顿（“传统应受尊重”）、利雅得（“可兰经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宪法”）和特拉维夫（“以色列是个犹太国”）三方的支持之下，萨达特将其塞入了他所制定的新宪法当中。

穆斯林兄弟会的计划仍然是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这一点可由其坚

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宪法中的第二条所证明。不仅如此，这个组织最新提出的措施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世界观：它提议组建一个乌理玛理事会，授权其确保任何拟议中的立法均与伊斯兰教的典籍相一致。这样的一种宗教性的宪法委员会将与伊朗的那个委员会完全一样，凌驾于“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府之上。这是一个宗教性的、由单一超级大党控制的政权，所有代表世俗化的政党都将是“非法的”。这些政党的成员与非穆斯林人（科普特人）一样，都将因此而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有这一切的迹象，华盛顿和欧洲当局言谈之中似乎仍然认为，对于穆斯林兄弟会最近宣称它在放弃其神权计划方面（其具体措施并无改变）的机会主义的、言不由衷的表态，各方应该加以认真对待。中情局的那些专家们难道看不懂阿拉伯文？结论必然是：华盛顿希望看到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从而保证埃及仍然为美国所掌控，也保证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华盛顿不希望权力落入民主人士之手，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将对埃及二流的国际地位发起挑战。最近成立的自由公正党明确提出以土耳其模式为蓝本，它完全只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工具。它提出承认科普特人，这突出表明了如果它想要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计划之中所要延续的穆斯林神权国家。穆斯林兄弟会也在转守为攻，它正在建立各种“工会”“农民组织”，以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称各异的“政党”，其唯一目的就是在正在形成中的由工人、农民和民主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制造纷争——当然，这是为了让反革命集团从中渔利。

埃及的这场民主运动能否将这一条从即将到来的新宪法中赶走？只有通过回顾现代埃及史中展开的（展现）那些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争论，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高潮期间的特点是多元观点的公开表

达，这令宗教（总是存在于社会之中）退居于背景之中。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穆罕默德·阿里到赫迪夫·伊斯梅尔执政期间）就是这样。现代化这个主题（其形式为开明的专制而非民主制）占据着舞台。1920~1970年也同样如此：最为突出的是纳赛尔主义崛起之前“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与“共产主义者”之间观点的公开冲突。纳赛尔止住了争论，代之以一套民粹主义的泛阿拉伯的但也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在矛盾为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回归大开方便之门。应该认识到，与此前的情形相反，在低潮阶段，观点的多元化消失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大行其道，这表现为伊斯兰教思想垄断了政府所授权的言论。1880~1920年，英国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转移言论的渠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起接受教育的埃及所有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和行动者的流放（主要流放至利比亚）。但也应指出，“反对”英国占领的思潮也将其自身置于那种中世纪的共识之中。阿拉伯复兴运动（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发起，并由穆罕默德·阿布杜继续）则是这种背离正道的组成部分，它与新的民族民主党所鼓吹的奥斯曼帝国式的幻觉有关，该党由穆斯塔法·卡米尔和穆罕默德·法立德创立，毫不奇怪。在那个时代接近结束之时，这种对正道的背离导致拉希德·里达极端反动的著作问世，其主张随后被哈桑·班纳所拾起，此人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

1970~2010年的低潮期间，相同的情况再次出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那套官方的话语体系完全是伊斯兰教式的（这可由他们在宪法中强行加入伊斯兰教的典籍以及他们向穆斯林兄弟会拱手相让核心权力所证明），而清真寺里进行的布道是唯一为官方所容忍的言论，这同样是一种虚假的反对。正因如此，宪法的第二条似乎具有坚实的“公众舆论”（美国的权威专家喜欢称其为“民意”）基础。

不应低估低潮时期系统化的强行压制争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受到压制之后，自由争论之风就永难轻易再起。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埃及当前争论的中心或明或暗地指向这场挑战的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的）层面。有迹象表明其方向是积极的：这场运动已经令自由辩论不可避免——仅仅几周时间便足以让兄弟会的“伊斯兰教是解决之道”的标语从所有的示威游行中消失，留下的只有关于如何切实落实社会变革的具体要求（保障意见表达的自由，组建工会、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自由；提高工资和保障工作权；保障土地所有权、受教育权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反对私有化和呼吁实行国有化，等等）。有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在4月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虽然五年前兄弟会的候选人拿到了压倒性的80%的多数票（当时其话语体系是唯一得到允许的所谓反对派的言论），但这次兄弟会的选票份额跌到了20%！不过，对方同样看到了避开“民主制的危险”的方法。在一个完全由穆斯林所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由军方最高统帅部挑选并经4月份的一场匆忙组织的全民公投所批准（官方宣布反对票的比例为23%，而赞成票的比例远远超出，这是因为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而且各清真寺对选民进行了严重胁迫）——的建议下，穆巴拉克的宪法（仍然有效）经过了微不足道的修改，但这明显令旧宪法的第二条文丝未动。对那些仍在台上的腐败分子来说，依据这部宪法进行立法机构选举和总统选举，显然就是以民主为名堂而皇之行欺诈之实。与此相反，民主派这一方则力图推动较为长期的“民主转型”，这会让其观点真真实实为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底层民众所听到，因为这些人仍然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但是，埃及人民的起义刚开始，奥巴马就做出了选择，即开展快速的、有序的转型（也就是说不会对政权的国家机器构成任何威胁），以及举行会让伊斯兰分子获胜的选举。众所周知，在埃及，世

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一样，选举并非建立民主的最好方式，但往往是令民主进程裹足不前的最好方式。

最后来说说“腐败”问题。过渡政权的大多数表态都集中在对腐败进行谴责并威胁将腐败者绳之以法上。穆巴拉克、其妻子以及其他几个人已经遭到逮捕，但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仍然不得而知。针对腐败的这种表态当然广受欢迎，尤其是得到了质朴的公共舆论的普遍欢迎。但过渡政府故意不去分析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不去说明腐败（在美式话语的道德化论调中被表述为个人的不道德）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的、必然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在埃及，也不仅仅是在整个南方国家，不管在哪里，买办资产阶级要形成，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国家机器勾结起来。我认为，在全面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腐败已经成为积累模式的再生产中一个基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垄断者需要寻租，这就要求国家与其积极合谋。国家的那套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的病毒”）宣称“国家不干预经济”，但其实际做法是“国家为垄断者服务”。

风暴区

毛泽东说得没错，他证实了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天然的帝国主义）根本就不会给三个大洲（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构成的外围地带——由占世界上85%的人口所组成的“少数”）的人民带来任何的好处，他还指出南方是个“风暴区”，那里的反抗此起彼伏，有可能（但仅仅是有可能）孕育出革命的果实，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阿拉伯之春”服从于这个现实。这是一场社会起义，它有可能孕育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可实现的路径，长期而言可能结出社会主义的

果实。资本主义体系，即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资本，不能容忍这场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原因之所在。它将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进行阻挠，从经济金融压力直至武力威胁。根据形势的需要，它将支持法西斯的和法西斯式的虚假的替代路径，或者它将强行推出军事独裁统治。从奥巴马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能相信。奥巴马是用不同方式说话的布什。说一套做一套是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有领导人的本质特点。

在本章中，我不打算详细分析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内正在发生的每一场运动。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因为发生在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正如这些国家融入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形式以及它们现有的政权结构也各不相同。

突尼斯的反抗打响了起义的头一枪，这显然极大地鼓励了埃及人民。不仅如此，突尼斯所发生的运动有个明显的优势：从英国流放回国的分子显然无法质疑由布尔吉巴引入突尼斯的那种半世俗化。但与此同时，突尼斯的这场运动似乎无力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固有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利比亚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其统治集团（卡扎菲）及与之作战的力量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根本不具可比性。卡扎菲一直不过是个丑角，其思想的空洞无物反映在其臭名昭著的绿皮书上。因为面对的是一个仍旧古老的社会，所以卡扎菲能够大放厥词，宣扬完全不切实际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第二天又宣布自己是个“自由派”。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西方”，似乎选择了自由主义不会对社会有任何影响。但这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存在，正如常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令绝大多数利比亚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暴动，而地方主义者和政治性伊斯兰分子马上对此加以利用。这是因为利比亚从来没有真正作为一个国家而存

在过。它是个地理上的区域，将阿拉伯世界的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东方分隔开来（将马格里布与马西利格分开）。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从利比亚国土的中间径直穿过。昔兰尼加在历史上是古希腊的一部分，后来它归属了马西利格地区。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曾是古罗马的组成部分，后来归属了马格里布地区。因此地方主义在这个国家一直都很强大。没有人知道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里的成员真正有谁。他们中间可能有民主人士，但里面肯定也有伊斯兰分子，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最为恶劣的伊斯兰分子，还有一些则是地区主义者。过渡委员会的主席是贾利勒，他是一个曾经判决保加利亚护士死刑的法官，由此受到卡扎菲的嘉奖，在2007年到2011年2月担任司法部部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科夫拒绝承认这个委员会，但他的意见没有被美国和欧洲所听取。利比亚的“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武装起义同政府军作战的形式，而非表现为一系列的平民示威活动，而且武装起义的一方马上就要北约对其施以援手。因此，军事干预的机会被提供给了帝国主义强权大国。当然，这些国家的目的既不是“保护平民”，也非“建立民主”，而是控制利比亚的油田并在该国获得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事实上自从卡扎菲向自由主义敞开了怀抱，西方石油公司就已经控制了利比亚的石油。但卡扎菲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完全可以假设他以后会改换门庭，而开始同印度人和中国人打得火热。比石油更重要的是利比亚所拥有的极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卡扎菲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可能把这些水资源用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现在这已成空。有名的法国公司将垄断这些资源的开采权并让这些资源的使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即有可能将其用于农业燃料的生产。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1969年，卡扎菲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离开他们自“二战”以来一直在该国设立的基地。目前，美国需要在非洲为其非洲司令部（美国针对非洲的军事指挥部，是美国控制全世界的军事

部署当中重要的一环，但现在仍然只能以斯图加特作为基地）找个地方。由于非盟拒绝接受它，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敢于接纳它。如果在黎波里（或者是班加西）安插一个傀儡政权，那么这个政府当然会满足华盛顿及其北约副手的所有要求。

叙利亚反叛的各组成方尚未将其政治诉求公之于世。毫无疑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的右转——完全倒向新自由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采取极其消极接受的态度——是民众起义的原因所在。但不能排除中情局在幕后的插手：有人提到成群结队的人穿过毗邻的约旦边界渗透到笛拉地区。在较早之前哈马和霍姆斯两地民众发动的暴动背后，就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推手，将其动员起来可能是华盛顿计谋的一部分，旨在最终打破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的哈马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也门这个国家因为打败了进步力量而实现了统一，后者曾经统治着独立的南也门。也门的反抗斗争是否标志着这些进步力量的复活？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解释华盛顿和海湾国家的立场为何犹豫不决。

巴林的民众起义在一开始即被沙特军队的屠杀和干预所扼杀，主流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对此却几乎不置一词。一如既往的双重标准。

尽管有这些最新的表现形式，但“阿拉伯的起义斗争”并不是显示其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例子。

第一波革命斗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将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集团在亚洲（菲律宾和印尼）和非洲（马里）安排上台的独裁者赶了下去。但在这些地方，民众运动虽然有时动员起了数量庞大的人民大众，其发展潜力却未能实现，因为美国和欧洲成功地导致了它的流产。它们现在力图在阿拉伯世界重复马里、印尼和菲律宾的先例：“改变一切，为的是一切不变！”在马里、印尼和菲律宾等

国，在民众运动推翻了独裁者之后，帝国主义的那些强权大国随即着手建立了与其外交利益相一致、与新自由主义相吻合的政府，由此维护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几个伊斯兰教国家（马利和印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动用了政治性的伊斯兰教派。

与此相反，席卷南美的那波解放运动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采取一以贯之的反帝立场；迈上进步的社会变革之路。

在媒体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那套话语体系将第三世界的这场“民主起义”与柏林墙倒塌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终结的那场运动相提并论。这是赤裸裸的欺骗行径。不管那场运动的原因何在（其原因自可理解），它都最终屈服于西欧的帝国主义强权大国对这个地区的吞并（主要是让德国获利）。事实上，东欧各国自此沦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的外围地带，因此它们现在仍然处在经历自己真正起义的前夜。已经有迹象预示真正的起义即将到来，尤其是在原南斯拉夫地区。可能孕育着革命性进步的起义在三大洲——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爆发的征兆，所以说这三个大洲仍然处于风暴区，甚至比之以前，更可以说它们身处风暴区之中，这个事实驳斥了“资本主义万古长青”以及它将带来稳定、和平和民主进步等一套套令人恶心欲吐的说辞。不过，要成就革命性的进步，这些起义就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障碍：一方面，它们必须克服运动中的各种弱点，其各个组成方必须达成积极的一致，必须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战略；另一方面，它们还必须抵制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的各种干预（包括军事干预）。美国和北约对南方国家事务的任何军事干预，无论以何种借口进行，甚至是看上去无害的“人道”干预，都必须加以禁止。帝国主义不允许这些国家出现民主，同时力图阻止其社会进步。一旦让它获胜，它所建立的傀儡政权就将仍然是民主之敌。欧洲的

“左派”虽然自称激进，但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实质究竟为何，对此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遗憾。

当前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话语体系呼吁实施“国际法”，只要一国人民的根本权益受到侵犯，即可原则上授权进行干预。但让事情向此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它等同于美国的驻外使馆，自动跟随其后的则是欧洲各国的使馆。无须列举多次此类强行干预（比如说在伊拉克）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无须指出所有这些干预全都具有双重标准（我们明显可以想到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践踏，想到对以色列无条件地支持，想到非洲还有无数独裁者仍在获得支持）。

南方人民的春天， 资本主义的秋天

拉美各国人民现在已经经历了 20 年的春天，我称其为南方人民的第二次觉醒——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直至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其发动了反攻。与那个春天一样，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春天形态各异，从完全针对加入新自由主义阵营的那些专制政权的起义，到“新兴国家”针对国际秩序发起的挑战，各种形式都有。这个春天因此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秋天”，即全球化的、金融化的、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与之前的情形一样，这场运动始于处于这个体系外围地带的人民和国家重新赢得独立、重新夺回改造世界的主动权。因此，这场运动归根结底是场反帝运动，所以它仅仅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潜在可能。一旦这场运动与其他必要的觉醒、与处于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工人的觉醒汇合，整个人类就有可能面临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前景。但这绝非早已注定的“历史必然”。资本主义的衰落有可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长期转型之路，但也同样

有可能导致人类陷入普遍的野蛮蒙昧状态。在其北约副手的支持之下，美国依仗武力持续不断地对全世界进行军事控制；帝国主义核心国家中的民主受到削弱；正在进行反抗的南方国家中，民主遭到愚昧摒弃（其形式为接受政治性的伊斯兰教派、政治性的印度教派和政治性的佛教派别所散播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半宗教的幻觉），所有这些都在令人类走向这个可怕的结果。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抵制可能出现的普遍的野蛮蒙昧状态，当前所进行的争取世俗化民主的斗争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Hassan Riad (1964) *L’E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Samir Amin (1978) *The Arab Nation*, London, Zed Books.
- Samir Amin (2006) *A Life Looking Forward, Memoir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 London, Zed Books.
- Samir Amin (2008) *L’éveil du Sud*, Paris, Le temps des cerises. The reader will find there m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viceroy Muhammad Ali (1805 – 48) and of the Khedives who succeeded him, especially Ismail (1867 – 79); of the Wafd (1920 – 52); of the positions taken by Egyptian communists in regard to Nasserism; and of the devi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Nahda from Afghani to Rachid Reda.
- Gilbert Achcar (2009) *The Arabs and the Holocaust: The Arab – Israeli War of Narrat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The best analysis of the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Islam (Rachid Red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modern Salafists) .
- Samir Amin (2011)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Oxford, Pambazuka Press.
- Samir Amin (2011) *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amir Amin (2008) *The World We Wish to Se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amir Amin (2011) “The trajectory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 and Marxism’s tricontinental vocation”, *Monthly Review*, 62 (9) .
- Gilbert Achcar (2011) *Le choc des barbaries*,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第二章

作为古代世界体系枢纽的中东

在中东有限的几个地区（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西伊朗）、印度和中国，东半球最为古老的若干个文明实现了整合。它们在开始时彼此隔绝，但从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它们之间有了足够的接触，“全球体系”得以出现。我据此指出这个体系有三个中心，它们一直维持到被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取代之日。

1. 中东地区，狭义上而言，它由后来成了阿拉伯的马西利格（埃及和土地肥沃的新月地带）、伊朗和土耳其所组成。在广义上，这个地区延伸到了中亚；

2. 印度次大陆地区；

3. 中国地区。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欧洲、朝鲜、日本、东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都处于由上述三个地区为中心所构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

地缘很重要。地缘不仅是这三个中心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的原因所在，而且使得中东地区成为这个全球体系的枢纽。中东是唯一与其他所有地方都有直接联系的地区，无论那个地方是处于中心还是处于边缘地带。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它，欧洲和非洲

这些外围地带之间的联系也要途经它才能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海上航线让欧洲人得以无须经过中东即可与东亚和南亚发生直接的联系之时（到了后来又有了横穿苏伊士运河的航运）。

这三个中心区域之间的贸易有两种走法：一是陆路穿过中亚，另一种则是经海上横渡印度洋。对于前一条道路，穆斯林与中国人之间存在争议，前者最终将其西面的部分纳入了大中东地区，而后者直至今日依然控制着东面的部分。这条大通道一直是世界史上最为稳定的边疆地区之一。后一条通道则为穆斯林（其中最主要的又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所控制，直到后来才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后的英国人（还有法国人，但其卷入的程度相对较低）夺取了控制权。

后来成了阿拉伯的马西利格的那块地方是控制欧洲与重要的“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之间贸易的关键。阿拉伯的马西利格地区与后者之间的贸易一直较少（地缘很重要），它主要的贸易对象是地中海西面的欧洲各国，如西班牙和西西里地区，还有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部非洲。

第一个地区并不等同于阿拉伯世界，后者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的。现在构成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说，其人口（至少是其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讲的是阿拉伯语的那些国家，是从公元前700年开始逐步变得“阿拉伯化”的，这个过程有时很缓慢，并且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得有先有后，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这个地区的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这种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形成”的表述不同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将在第四章中再次提到他们）的那套说法：我认为他们用十足的神话取代了真实的历史。

这个地区从来都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的马西利格。它一直都包括伊朗（及其疆域之外的中亚地区）和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和巴

尔干)的那些国家。因此它总是将穆斯林王朝(它本身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国家不如说是伊朗人的国家,阿拉伯人当时大部分都是土耳其人)与拜占庭帝国联系在一起。只是后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个时间与欧洲进入重商资本主义时代,再也不必通过中东这个枢纽开展贸易的时间相重合——这个地区的上述两个次级地区才被一股政治力量联合了起来,而这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而非阿拉伯的。

但这个地区在其发生伊斯兰化及部分的阿拉伯化之前就已存在。这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那几次征服行动之后该地区出现希腊化之时,那几次的征服行动虽然没有令此前的那个文明中若干个最为古老的中心地带(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希腊)合为一体,却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地区这时已经在发挥着枢纽的作用,并且将自己的这个角色一直维持到了16世纪。因此,我们在谈论阿拉伯世界的枢纽作用的时候,不能将这个阿拉伯世界与其东面的那些合作伙伴(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拜占庭人)割裂开来。

接下来对这个地区枢纽作用的评述将首先针对上述三大中心地区之间的贸易格局展开,对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前现代(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外围地带之间的贸易进行阐述。我将表明中国和印度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中东地区的相对优势则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因为它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走廊。然后,我将分析这个体系的特点。全球史方面的论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这些特点并不重要,而我对这个体系的分析则强调它的朝贡性,我甚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原型。本章的观点仅限于此。

我在此仅仅指出衰落——这是第三章的主题——早已开始,甚至早于伊斯兰化在这个地区的出现。在从拜占庭帝国的形成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几百年时间里,衰落是个连续、漫长、明显“无可挽回”的过程。这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将在本章中指出。

古代世界各地间的贸易

在长达 2000 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不仅如此，即便它在王朝更替期间战乱频发，它的发展也一直是最为持续的。

中国的人口在当代开始之时是 7000 万（约占当时世界上 2.5 亿人口的 28%）。随后其人口不断增加，1700 年时达到了 2 亿（约占当时世界上 6.8 亿估计人口的 28%）。1700~1800 年间，中国的人口加速增长至 3.3 亿，约占世界上 9.5 亿估计人口的 35%。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它在各个方面始终都是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拥有最高的人均农业生产率，最多数量的城镇，其管理者受过教育，其工匠手艺高超，所以它被所有的人都视为“样板”。18 世纪欧洲人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处于辉煌的巅峰，欧洲人力图效仿这个国家（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早在这之前，中东各地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它拥有无穷的财富和权力（参见穆罕默德先知的圣训：“去中国寻找科学”）。

在此期间，中国自始至终都与中东这个中心（先是希腊化的、然后是拜占庭人和伊斯兰阿拉伯人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中东）保持着紧密、持续和深入的联系。

印度是中国之后第二个人类聚居和人类文明的中心。它很早就实现了起飞，当时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换言之，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崛起同时，而印度人所创造的文明与这两个文明之间可能也有着联系。同中国一样，但与中东截然相反，印度文明从其起源直至公元 1700 年一直充满活力。在当代开始之时，印度的人口有 4500 万，1700 年则达到了 2 亿（同中国当时的人口一样多）。但从那时起，印

度步入了危机，1800年在2亿左右的人口上原地踏步，只是后来进入19世纪才赶了上来。印度次大陆今天依然是中国之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但印度的历史比中国的更加动荡。它频繁地受到入侵（总是来自西面），统一难以达成（直至古代的孔雀王朝时代，即我们所考察的时代开始之时，统一才得以实现）。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在对外贸易方面它不如中国开放。它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中东，或者是沿着伊朗和阿富汗这条陆上通道，或者途经海上进行贸易。至于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直到公元600~1000年印度信奉了印度教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完成了其伊斯兰化，中国也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渗透。

中东这个中心的历史演变同中国大不相同。公元前200年，其人口同中国相同（5000万），其总体的发展水平很可能也与中国相当。但到了当代（公元后），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地区（希腊和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内的人口只有3500万，如果加上意大利和马西利格地区——它们构成了这个地区通过罗马帝国向西的延伸——那么人口是5000万（中国的人口却有7000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东这个中心地区（拜占庭加上穆斯林王朝）的人口增长相对停滞。奥斯曼帝国自1500年起的继承者——波斯帝国和土耳其人在中亚建立的首长国和可汗国——的人口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5000万，而1700年中国的人口是2亿，印度的人口也差不多。中东的相对地位自当代以来就几乎一直处于下降之中，虽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短暂辉煌的时刻，虽然也曾有过重塑其地位的努力（在查士丁尼时代，在阿拔斯王朝的头两个世纪里）。

与此相反，在较为久远的时代，中东在世界上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在公元前2000年里，它的人口可能占世界人口（这段时间里，

世界人口从1亿缓慢增至2.5亿)的30%，而不是当代开始之时的18%和1700年的7%。古埃及的人口曾经超过1000万，但到1800年已经跌到了只有200万，只是在当代的20世纪，它的人口才恢复到法老时代的水平。此处不是分析中东为何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早衰之象，但应该指出的是，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给中亚、伊朗和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全球文明的摇篮之一变成了一片荒漠。俄国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部地区是这场浩劫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在抵御入侵方面的能力则要强得多。不过，不变的事实是：自当代开始以来，中东这个中心的活力无法再同中国相比。

正因如此，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在古代相对较为密切，之后即逐渐减少。中国随之加强了与朝鲜和日本、越南、东南亚以及最后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先是走蒙古通道（13世纪），然后是途经海上航线（在现代）。

中东的相对停滞意味着到了公元1300~1500年，在将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因素考虑进去之后，这个地区所产生的财富盈余几乎不到中国的1/3，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500年起）开始之时，这两个地区在这方面则是旗鼓相当。不过，中东地位的下降部分地被其地理位置优势所抵消，这是因为它作为贸易枢纽，在前现代时期几乎所有的跨洲贸易中，是一个必经的中转站。中东的经济因此变得商业化，由于存在着过境商业，其外贸交易量也出现了显著的相对增长。

尽管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相对而言出现了下滑，但在前现代世界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当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重要。商品、技术、意识形态和宗教通过中东进行交流，这让中国最先进的科技得以传播开来，尤其是传播到了欧洲。亘古不变的丝绸之路经过甘肃走廊，穿越天山山脉南麓，绕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者向北（途经哈密、

阿克苏和喀什)，或者向南（途经浩罕和喀什），然后经过原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南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最后到达波斯。

这条至关重要的大通道亘古不变，解释了几个舍此即无法加以说明的现象，例如来自中东的宗教早期的深入渗透：基督教中的景教，还有摩尼教，而在袄教之后（往往被忘记的一点是中亚比德国的部落更早信奉基督教）则是伊斯兰教（它马上在这个地区——花刺子模——深深扎下了根）和佛教（在印度）。这个过程伴随着当地人早期的定居：从9世纪开始，塔里木盆地及周边诸绿洲的居民就已经完全定居了下来。这条大通道上点缀着大型的商业城镇和思想活动的中心，周围则环绕着密集灌溉的农业区。

由此就可以理解前现代的地缘战略冲突为什么主要是针对这条通道的控制权展开的。中国和中东各自所控制的区域之间的军事边界一直非常固定，大致处于中国当今的边界上。

以上关于中东的论述仍然主要适用于“中亚”地区。它作为前现代世界里几个主要中心之间的必经通道，尤其是发挥了把中国与中东联结起来的作用。中亚地区的人口一直稀少，因此其所生产的财富盈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西突厥斯坦的中部地区，在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水道周围，某些时代确实经历了辉煌的发展。途经这个地区的贸易往来相当频繁。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中亚更多地从这种转口贸易中获利，其贸易值中的一部分被留在了这个地方，具体数额当然无从精确估计，但肯定不能忽略不计。

避免针对这个地区做出过多总结因此颇为重要，因为这里的居民群体从来都不是由同一个种族的人所组成，也不能把他们简单地归于游牧民族。事实上，中亚基本上可以由天山山脉一分为二，南部地区是真正的丝绸之路，而在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关系密切的东西方关系中，北部地区仅仅处于边缘地带。

中亚的南部地区本身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三个彼此差异显著的次级区域：中国的新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以南地区 and 阿富汗。穿越中亚、反映了中国与中东之间商业往来的商队总是走途经新疆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河谷的同一条道路。这条路的其他一些走法，即为避开位于这条路南面或北面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选择走准噶尔盆地，或者是走前往费尔干纳盆地的那些关隘，全都坐落在我们所正在考察的这片狭长区域之内。这个中亚南部地区的东面部分（新疆）异常干旱，只有几个散落的绿洲，所以人们无法在此密集定居，除非是在绿洲城镇可由附近经过灌溉的小块良田或者途经此处的长途商队提供物资补给。由于这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主要是游牧民，所以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城市商业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其赖以生存的东西方关系，城市里的商业是无法存在的。

这种客观上的依赖性绝没有限制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及其文明的灿烂，其特点是当地很早即形成定居（最迟至9世纪即已完全定居），在开放的城市中心形成了文化生活（很轻松即采纳了各种先进的、通行的宗教形式，如景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高山形成的阻隔将新疆与突厥斯坦西部分割开来，高山西面的地理条件允许人们在大草原上更多进行游牧，或者围绕着锡尔河和阿姆河开展灌溉农业。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朗高原和阿富汗内陆的延伸，它是定居民（农民和城市居民）与游牧民之间最佳的交会地。在变幻无常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有时是市民和商人（他们依赖于灌溉农业），有时是游牧民。显然，如果是前者，东西方之间的商业交往会更多为其所推动，而如果是后者，则更多受到阻碍。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对于东西方贸易来说是个有利的因素。

阿富汗在这个地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印度一直与中东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除了海上的那条航线，它还途经通过阿富汗北部山区的陆上通道，由此在阿姆河同中国与中东之间的那条通道会合。在这里，由于三方之间的这种接触（中东、印度和中国），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呈现了一种特别有趣的融合性（比如说贵霜国）。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从而避开了喜马拉雅山和西藏这两处无法通行的天堑，从西面绕道而行。这是佛教传播所走的路线。

亚洲内陆的北半部分大致对应今天的蒙古（位于天山以北）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位于咸海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河谷以北），这片大草原一路无所阻挡地一直延伸到中欧，向北到达里海和黑海。这个地区在东西方关系中仅仅起着次要的作用，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迟至公元 1000 年才开始发展；二是暴烈的游牧民族统治着这片大草原。北面的这条道路只是在欧洲大发展的短暂时期内才有人行走，具体到时间，是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欧洲对海上航线开始进行开拓），这段时间对应成吉思汗对这整片地区的征服。

这片地区的主要社会成分与其南半部分的主导社会成分不同。由于游牧民在数量上占优，这里的贸易交往相对薄弱，无法与真正的丝绸之路沿线的情况相比。蒙古仍然没有任何重要的城镇，甚至在成吉思汗时期，其首都也只是个可能仅有 5000 个居民的商业小镇。因为主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不途经这里，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像中亚南部地区那里一样的市镇。不仅如此，中国与天山以北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极其有限，几乎仅限于马匹和兽皮的进口。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可汗国垮台之后，中国的清政府控制了此地的贸易，建立起了游牧民族、佛教和中国商人之间新的联系。与此同时，俄国的扩张引发了其与中国之间为实现地缘政治上的控制而产生的新冲突。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世界——的俄罗

斯并不处于资本主义欧洲的心脏地带，它只是个贫穷的半外围地区。因此，它的对外贸易仅有次等的重要性。

在前面讨论蒙古的社会构成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佛教，这涉及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佛教在亚洲文明中心地区的失败需要一提：在其发源地印度和中国，印度教和儒教很快复苏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在丝绸之路沿线，伊斯兰教也确立了其优势。不过，在西藏和蒙古这两个中亚体系的边缘地区，佛教则确立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已经提到，蒙古以西的北亚内陆地区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南部在内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地方，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入侵者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但由于很迟才皈依，所以并没有在文化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与同样具有侵略倾向的俄国人发生了冲突。

直至很晚的时候，即在公元 1000 年之后，欧洲才参与到这个前现代体系的总体发展之中。在此之前，它一直是片落后而野蛮的外围地带。

当前时代开启之时，包括意大利的人口在内，欧洲的人口有 3000 万左右（占世界人口的 8%，不到中国人口的 30%，不到印度人口的 50%），其中的一半住在意大利和由高卢人所控制的土地上。欧洲的大发展出现得很晚，原因在于直到公元 1000 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几乎没有超过 3000 万人居住于此。但在公元 1000 年到 1350 年之间，其人口增至 8000 万（占当时世界上 4.4 亿估计人口的 18%），不过在 1400 年又跌到了 6000 万（由于黑死病的原因）。后来又出现了人口增长，1700 年时达到了 1.2 亿（占世界上 9.5 亿估计人口中的 13%）。欧洲人口的迅猛增长随即开始，19 世纪的人口则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公元 1000 年以前，欧洲的农业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印度和中东

的文明发达地区，在欧洲大陆上也没有形成什么城镇。不过，从那时起的大发展非常迅猛，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大地上已遍布活跃的市镇和高耸的纪念碑，这显示了欧洲的农业所创造的盈余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结束于 1492 年，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在这一年开始了其世界霸权征程，而在此前的 2~3 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成了一个孕育之中的新中心，其权重为中国的一半。如果我们接受欧洲与中东的农业生产率和城镇化程度相同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假设，那么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权重已经是中东的 2~3 倍。这同此前 15 个世纪里的情况截然不同，那时的欧洲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产生大量的盈余，所以它在世界体系当中几乎无足轻重。

欧洲的贸易大多同中东进行，虽然其进口的商品很多都来自更远的地方，即中国和印度，只是途经中东进行转口。但在 13 世纪，欧洲与中国首次途经蒙古的领土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中东因此被排除在外。成吉思汗的征服行动事实上恰好与欧洲的大发展同时发生，而欧洲在经历了这轮大发展之后，很快就赶上了由东方的三个中心地带所构成的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因此，尽管这条蒙古通道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个世纪，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却相当大。从公元 1500 年开始，海上航线取代了古老的陆上通道。对成吉思汗征服行动的评价被那些探索发现了中国的欧洲人所扭曲。居于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始终都是欧洲中心论的那套话语体系——对蒙古帝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因为它确立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条联系纽带，而事实上这样的一条联系纽带早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欧洲人对此并不知晓而已。事实上，由于欧洲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征服行动的负面后果一直被低估了：其征服行动给中国的北方、中亚的西南部、伊朗、伊拉克和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令古时候这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总体

而言，如果以整个的东西方贸易为着眼点，那么蒙古征服行动的消极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

甚至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在古代体系中处于外围地带的欧洲仍然很落后。欧洲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一直赤字严重，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很多的产品可以出口，同时它又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和技术，以致它只能通过出口贵金属来弥补其赤字。

几个先期的结论

在我们所考察的 20 多个世纪里，世界“朝贡”体系的全球结构是相当稳定的。由于各个地区在人口和财富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改变，这个结构被逐渐推翻，产生了以现代资本主义为特点的新的结构。

对于这个演变过程中几个最为重大的进展，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1) 在这整个的 20 个世纪里，中国一直都在不断进步。它在古代世界的朝贡体系中的地位突出（但并非居于支配地位——具体内容后再叙）而且稳定。这个体系中的第二个次大陆印度也是如此，不过在程度上略逊一筹。

(2) 与之相反，中东在整个期间内的停滞昭示了这个地区在体系内的地位已然下滑。

(3)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欧洲的演变。欧洲在长达 15 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但在资本主义革命爆发前的五个世纪当中，它经历了巨大的跃进。由于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和建设，这场巨变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甚至更加明显，这开启了一个直至此时只与古代世界有关的体系向着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体系的

转型。

(4) 中亚已经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地区，它是必经的通道，将古代所有最先进的地区（中国、印度、中东，还有作为后来者的欧洲）连接起来。中亚研究强调途经这个关键地区进行的交往以及商业和科技交流的绝对重要性。但它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失去其作用，因此它会遭到明显的边缘化。

(5) 从1500年起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之前的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不仅仅是颠覆相关地区的相对地位从而让欧洲占上风的问题。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心，这是因为欧洲在北美的扩张以及日本的露头使中心的范围得以扩大。支配这个概念在此前的朝贡体系当中并不存在，但现在则成了这个新的世界体系的特点。我想强调指出与这个转变有关的另一个转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深刻性并不亚于前者的转变：社会体系中的支配权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经济层面。

早前的阿拉伯－伊斯兰体系和地中海体系

所有人都知道，甚至在意大利的那些城市出现之前，阿拉伯－伊斯兰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就已经拥有了灿烂的文明。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否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型？资本主义原型的形式是存在着的，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们还促成了辉煌的文明。我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观点 [参见我的著作《阿拉伯国家》（1978年）和《欧洲中心论》（2011年）]，与曼索尔·福热在论述阿拉伯世界陷入僵局的历史根源的著作（1990年）中所提看法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现已过世的艾哈迈德·萨德克·萨阿德的著作里的观点相一致。除了可能的分歧——或者说是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共同

的观点是阿拉伯 - 伊斯兰的政治体系不受资本主义原型（重商主义）力量的支配，非但如此，资本主义原型中的那些要素依然遵循着居于主导地位的朝贡体系的力量逻辑。事实上，我认为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是更为广泛的地区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将这个地区体系称为地中海体系。

我曾（在《欧洲中心论》当中）提出，我们可以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行动发生之时（公元前 3 世纪）作为这个地中海体系的诞生之日，由此形成从这个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单一的历史长区间的概念，首先涵盖“古代的东方”（围绕着地中海的东部盆地），然后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并延伸至阿拉伯 - 伊斯兰地区和欧洲。

在这方面，我提出的论点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从公元前 300 年（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东方）持续到 1492 年的单一的朝贡体系。我指的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其统一性体现为共同的形而上学的表现（这个地区在朝贡方面的意识形态），这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连续表达（希腊的、东方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西方基督教的）。在这个朝贡区域之中，我发现将其中心地区（东面的地中海）和外围地区（西面的欧洲）区别开来很有用处。在这个地区的内部，各种交流（几乎一直）非常深入，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原型的表现形式也高度发达，这特别体现在其中部的各个地方（从 8 世纪到 12 世纪伊斯兰教首次勃兴，在意大利是在其后的几个世纪）。这些交流是对财富盈余进行重大的再分配的手段。不过，盈余最终的集中从根本上来说归结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文化区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除了两个短暂的时期，那时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体系内所有的中心地区）。总体而言，西面的欧洲这个外围地区在封建制度下一直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这正是其外围性的表现）。中心地区则一分为二：一边是信奉基督教的

拜占庭帝国的东方；另一边则是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帝国（倭马亚王朝，然后是阿拔斯王朝）。它的内部存在着离心力，后来才迟迟由奥斯曼帝国实现了统一，而这个帝国建立之日，恰是这个时期结束以及东部地区整体边缘化之时——欧洲和大西洋地区这个此前的边缘地带此时变成了中心。

可以认为这个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原型体系吗？支持者的论点是：在这个时期里，始终都不可否认存在着资本主义原型的要素（私人所有权、生产商品的企业、赚取工资的劳动者），它们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呈扩张之势（尤其在伊斯兰地区和意大利），在另一些时间地点则在收缩（尤其是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野蛮的欧洲）。但在我看来，这些要素的存在并不足以总结这个体系的特点。相反，我认为，在关键的意识形态层面，始于这个时期的希腊化阶段（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以及随后（由东而西）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形式而繁盛的、纯粹是朝贡的意识形态，其本质特点主要是形而上的考虑占据压倒性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确实是一个体系，但它不是资本主义原型体系，也就是说，它不是从朝贡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快速过渡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朝贡体系，它不是多个自治的部落社会的简单并置，它们只是恰巧有些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宗教，或者仅在有限的时间内结合为一个帝国，比如说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

我所指出的这个区别隐含着财富盈余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其形式是朝贡而非资本主义中资本的利润。将部族财富盈余集中起来的正常途径是政治上的集权，财富盈余由此流向帝国的首都（罗马、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当然，正如相关中心地区的权威有限一样，这种集权一直并不强大。罗马、拜占庭、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无力

阻止其中转站（亚历山大港、开罗、菲斯、凯鲁万、热那亚、威尼斯、比萨等）经常攫取自治权。野蛮的基督教国家（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的西方国家）全都躲过了这种集权。集权的逻辑同时也刺激了资本主义原型关系的发展，这集中表现为这个地区一直都存在着由商人来处理部分财富盈余的现象，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这种现象还非常普遍和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盛行的那几个世纪里，在十字军东征后出现的那些意大利城市之中。在此基础上，我曾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描述为朝贡加商业式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导致我得出了资本主义可能诞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结论。这将我带回到别人认为是我就这个问题所阐述的其他一些观点上。我曾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大西洋一经出现，其他地方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即被野蛮终止。在我看来，大西洋岸边的西方加速走向资本主义（由此将这个体系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转至大西洋两岸）的原因，主要是（对美洲随后是对全球的）殖民，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方封建制度的外围性。

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朝贡体系？

我的方法论假设令我将更多的文化区视为自治的朝贡体系。在我看来，儒教 - 中国朝贡体系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它拥有自己的中心（中国），其特点是强大的政治集权（即使在内部离心作用的重压下不时崩溃，但总是又得以重建），其外围地带（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很是接近于中世纪的欧洲与文明开化的东方之间的关系。至于印度教文化区是否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朝贡体系，我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说完这些之后，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地中海体系是孤立的，

还是与其他亚洲和非洲的体系有着紧密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之外以及在其形成之前，存在着一个稳定并不断演进的世界体系？有些人（尤其是弗兰克）对后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理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原型的地中海、中国、印度的东方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关系，古代世界的这些地区早期的这种交流甚至十分重要。对我而言，我认为由于我们现有的知识颇为有限，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确有必要，对于从我们的知识当中能够推导出什么、可以提出何种假设、为证实这些假设应从何种方向展开研究，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以便促成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的系统交流。

我并不打算以我自己的“直觉式的观点”取代这些讨论的最终结果。我在此阐述这些观点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以下便是我（目前）的一些看法。

第一，人类自起源以来便是一体的。地球上人类的行程始于一小群原始人在东非的出现，他们南下尼罗河并在非洲散居开来，穿过地中海和苏伊土地峡征服了欧洲和亚洲，跨越白令海峡并可能穿越太平洋（在离现在最近的时代）在美洲定居下来。地球上的各个疆域分别是何时被人类征服的？这些正在开始为我们所知。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人类在地球上逐渐散居开来，不同的人群生活在极端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因而面对各不相同的挑战，这是否带来了进化路径的多样化？还是说进化路径的平行存在意味着这样一个结论，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所遵循的是普适的进化法则？作为补充，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彼此散居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对于知识、经验和观念的传播方向、强度和速度有何影响？

直觉上讲，可以想象有些人群会发现其处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中离群索居，他们会以特殊的、不太可能令自身进化的适应措施来应对挑

战。这些人因此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而被迫复制其组织形态，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会出现不断缩小的迹象。属于这类人群的可能性是生活在北极、赤道雨林、小岛和某些海岸上的猎人、渔民以及依靠采集食物果腹者们。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仍然相当支离破碎。

但其他一些人群却生活在不那么艰难的环境里，这令他们在驾驭大自然（过渡到定居农业、发明更加有效的生产工具等）和实现更为紧密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进步。对这类人群而言，是否存在普适的社会进化法则以及在进化过程中外部关系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随即出现。

第二，对于已经取得明显进步的社会来说，它们是否全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即使它们在经历这些阶段时有先后之别？我们全部的社会科学都建立在这个看似必要的假设之上。这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针对这种必要的演进存在着各种表述，新的理论取代旧理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它们或是基于土地利用和工具使用方式的更替（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或是基于社会组织形式的更迭（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发生的各种进化又被重新嫁接到我们所认为的根本性趋势之上。比如说，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哲学思想领域在各个时代的更替（原始思想、万物有灵论、形而上学、奥古斯特·孔德式的实证主义），等等。我不打算在此讨论这些理论，它们几乎总是或多或少地被后来的研究所推翻。我仅指出：虽然多样性显而易见——这是科学研究的属性，但这些理论的存在表明我们始终有必要进行总结。

在我看来，在所有的进化理论中，最为精密的表述是由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其理论基础是生产方式的集成观。这个观念源于基本生产要素的概念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针对这些生产方式所阐述的特定理论（诸如家庭理论、国家理论等）又

彼此进行了嫁接，这些理论由此得以丰富。我不打算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是否确实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抑或它们是后人重新阐释的产物，与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并不必然相符。我也不打算讨论在如今我们对过去的社会有了更多了解的情况下，这些理论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仅仅指出：这些表述表明了我们仍然需要去理解社会，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总结。

第三，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有几个朝贡社会的总体发展处于大体相当的成熟度，在生产技术、工具使用、商品范围、权力的组织形式、知识和观念体系上，等等。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社会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相当紧密的网络：商品、知识、技术和观念的交流。这种紧密的交流是否足以令我们说已经出现了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虽然被称为朝贡体系）？弗兰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在相互影响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之时（如果没有与乙的关系，甲便不成其为甲），一个统一的体系即已形成。姑且认为这个标准成立吧。但总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关系是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社会进化法则的普遍性绝非意味着单一的体系这个概念。此处所涉及的是两个彼此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社会——被地域或时间分开——出于相同的根本原因而能够彼此平行地进化。第二个概念暗示这些社会并非彼此不同，而是同一个世界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在后一种——必须是全球性的——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普适的法则与这种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互动所产生的效果密不可分。

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两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第一点，经济交流并不必然是点缀性的因素，后者对生产方式进而对发展水平不会造成长期性的影响。交流可能是分配财富盈余的重要手段，对彼此相

关的各个社会当中的某些部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与原则无关，只与事实有关。交流是否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又是在何时、何地发挥这种作用的？对于匆匆忙忙所下的结论，说交流总是（或通常）发挥这样的作用，或者从没（或极少）做到这一点，我无法认可。举例来说，针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我曾说过交流的意义重大。这样的交流足以标志着其朝贡—商业特征的形成，这对理解其曲折的历史，即从“辉煌”阶段过渡到“堕落”阶段以及财富和权力重心从这个地区转移出去，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还曾说过，由于重商主义的欧洲（17世纪到18世纪）主导了这种交流，所以它在形成资本主义原型后迅速迈向了资本主义。但在中国、印度、罗马帝国等地，交流是否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个人没有评价的资格。第二点，我们所说的交流必须不限于经济领域，它的范围远不止如此。针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论述更多强调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的传播）以及军事和政治交流（帝国的兴衰、“野蛮人”的入侵等），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重点则放在了经济关系方面。这种区分是否有误？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恰恰相反，史学家们凭着直觉抓住了主导权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到经济的转变，这也是我自己的论述的核心所在。在这个层面上，是否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朝贡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世界体系？我认为不能。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存在着独特的朝贡性的“文化区”，它们恰好建立在由特定参照物——最常见的是宗教：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所构成的广泛体系之上。当然，这些形而上学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因为它们表达了同一类（朝贡性）社会的本质要求。这种联系进而促进了其相互之间的借鉴。要回答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个还是多个体系），有必要将三个因素结合起来：经济交流以及财富盈余通过这个渠道转移的强度；政治权力集中的程度；意识形态体系的相对多样/单一性以及随

后而至的相对自主性。各个朝贡体系的自主性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其他交流，这些交流甚至有可能非常重要。如果不提及这些交流，许多历史事实和历史变迁便无法理解：各种各样技术的转移（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令丝绸之路得名的丝绸、印刷术、由中国的面条变成的意大利面，等等）；宗教信仰的传播（佛教从印度来到中国和日本，伊斯兰教一直传播到了印尼和中国，基督教远至埃塞俄比亚、印度南部和中亚）等。

在带来了各地活跃的资本主义原型联系（从中国和印度到伊斯兰世界、非洲的萨赫勒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财富盈余转移的交流中，财富盈余——在交流网络的一些关键点上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在世界体系层面的集中当然无法与现代世界相比——现代世界的特点正在于财富盈余的高度集中。无法比较的原因在于当时主要通过权力的集中来实现财富盈余的集中，而当时并没有一个能与19世纪的英国霸权或20世纪的美国霸权相提并论的世界帝国，甚至也没有相似的这样一个世界强国。古代的（朝贡）时代根本无法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层面的分化相比。尽管早期的体系达到了很高的交流水平，但它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分化，虽然在地区层面受益于地区体系的中心（例如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意大利的那些城市、中国和印度）。与此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则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真正分化，因此它是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如果采用这种分析朝贡体系之间交流的方法，可能就需要重新评价臭名昭著的“野蛮人”的历史地位，他们在伟大的朝贡文化区的夹缝中保有一席之地。这些野蛮人所扮演的角色真如人们所说是完全负面和具有破坏性的吗？抑或他们在朝贡体系间交流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使命感，使他们得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后一种可能性可以解释他们在统一广袤的领土方面所取得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他们将自

已置于意识形态策源地的能力（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由野蛮人所统治，是地中海、印度和非洲之间交流的十字路口），以及他们令自己迅速占据朝贡体系中心地带的力量（伊斯兰教诞生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的花刺子模地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等等。

最后，对于是否可以将单一世界体系存在的假设推广到整个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有所保留。是否可以说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存在着朝贡体系，而且这些体系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交流网络？我并不这样认为，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大多数的人类社会制度仍然落后，处于我所称的公社阶段；第二，在国家被公认为是权力的表达形式的阶段，文明的各个孤岛尚未找到完全朝贡式的意识形态表达（参见《欧洲中心论》中有关古代世界意识形态的论述）；第三，这些孤岛之间交流关系的强度依然很弱（这并不排除某些交流关系，比如说在技术借鉴上，能够跨越意想不到的距离）。

朝贡形式的多样性

马克思先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模型，然后才考察其具体的历史形态的出现。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将首先提出朝贡模式的一个抽象表述，然后再考察其具体多样的历史形态。这样的一种考察同样重要，因为面对这些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多种多样。

作为全球史中长期以来的主角，中国的朝贡形式是学者们——尤其是彭慕兰（2000年）和阿瑞吉（1994年）——分析的对象。我发现这两人的分析非常具有说服力 [不同于弗兰克（1998年）简单化的阐述]，因而将其拿来并在其他方面加以发展（阿明，2011b）。这些理论让我们有可能理解中国如何能够做到甚至在欧洲之前即“发明了现代性”。我发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型的朝

贡形式始于 13 世纪。

我研究了“阿拉伯”（以及中东）前前后后的各种朝贡形式。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是活跃，但基本局限在阿拉伯的学术圈里，参与者除我之外，还有萨德克·萨阿德、福热·曼索尔、菲柯·达拉吉（后者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我们的批判尤其针对通俗化的政治论者，他们的论述对主要思想家（如康斯坦丁·兹里克、亚辛·哈菲兹、伊利亚斯·莫科斯）就民族问题所做的阐述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这颇为令人气愤。我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还有它作为这个地区枢纽的功能，我因而将它称为朝贡和资本主义的原型形式。“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应该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考虑 [参见我的著作《阿拉伯国家》（1978 年）]。在这个意义上，阿拉伯的国家原型确实曾经存在（就像中国的国家原型一样），它由“武士商人”所建立，这些人进而成为马穆鲁克权力的特色。对“伊斯兰教”的重商主义理解在这个背景下也成立。在我的著作《全球史：南方的视角》中，可以找到我在这些论争中发表文章的目录。

欧洲过渡到重商主义： 1500 ~ 1800 年

世界体系不可归结于资本主义相对近期的形式，这种形式只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来、伴随着帝国主义（在列宁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的来临和对世界的殖民瓜分才出现的。恰恰相反，我们说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从一开始即表现出来并贯穿这一体系发展过程的始终。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期间成形，这说明 1492 年——美洲被征服的开始之年——是彼此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诞生之时。

我们应该如何认定 1500 ~ 1800 年过渡的性质？人们提出了各种

认定标准，所依据的是那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规范（“古代政权”或绝对君权时代），或者是其经济的特点（重商主义）。实际上，欧洲和大西洋地区老式的重商主义社会及其向欧洲中东部的延伸是有问题的。让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社会见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形过程中某些关键性基本要素的结合。这些关键性要素显著扩展了商品交换的领域，而商品交换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大部；它强化了现代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并以法律来保护这些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它还显著增加了以工资维生的自由劳动者（在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中）的数量。不过，这些社会的经济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不如说是商业性的，原因很简单：生产力的发展尚未令工厂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形式。

由于过渡形式很明显具有上述特点，那么就这个结论再谈两点。首先，这些要素——有些人称为资本主义原型要素（为什么不呢？）——并非于1492年奇迹般出现。很久以前，在这个地区，尤其在地中海周围，在意大利的那些城市里，在大海对岸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就能看到它们。在其他地方，它们也已长期存在：如印度、中国等。那么，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为什么开始于1492年，而不是1350年，或者是900年，甚至更早？为什么认为是欧洲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能够找到资本主义原型要素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或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事实上，为什么不完全放弃过渡这个概念，转而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体系正处在不断进化之中，而在这个体系当中，从非常久远的时代即有资本主义原型的要素呢？我的第二点评论部分解释了我为什么不愿采取上述思路。对美洲的殖民极大地加速了上述资本主义原型要素的扩张步伐。参与这个殖民过程的社会体系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为这些要素所主导。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也是以前所没有出现过的情况。相反，在彼时彼地，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型要素依然隐匿于一个为朝贡制社会关系所主导的世界中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所以现在让我们廓清朝贡关系的主导地位这一说法的含义。

我们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各城市之间所形成的紧密网络是否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型体系。毫无疑问，在这些主导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层面上，资本主义原型形式是存在着的。但这些意大利城市（甚至是其他城市，如德国南部的城市、汉萨同盟城市等）真能与中世纪基督教这个更广泛存在的制度彼此割裂开来吗？这一存在得更为广泛的制度仍然为封建制的农村生活主导，也带来了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习惯法、分散的权力、教会对文化的垄断，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必须承认16~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型政治体系进化的重大作用。这场进化带来了从中世纪权力的封建制分化到绝对君权集中的转变，这刚好与资本主义原型的发展保持同步。欧洲的这种特殊性相当引人瞩目，因为在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我们看不到类似的封建制权力分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优先，封建社会则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地中海的朝贡形式嫁接到了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落后的公社阶段（由野蛮人所构成的欧洲）的一种制度的产物。

国家以绝对君主制为其形式的（姗姗来迟的）定型，从一开始即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抽象意义上与中央集权的朝贡制国家不同。中央集权的朝贡制国家与朝贡的主导阶级合流，后者在国家之外并不存在。欧洲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情况则相反，这种国家建立在次要形态的朝贡阶级的权力废墟之上，它在建国中所主要依赖的是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原型要素（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乡村中的这些要素（以市场为其活动中心的农民）。专制主义产生于这些新的、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原型力量与封建剥削残余之间所达成的平衡。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种特殊性部分反映于伴随着“古代政权”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意识形态。我一直强调这些意识形态具有特殊性——而且在我看来还具有先进性：它们与朝贡制的意识形态分道扬镳。在朝贡制中，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几乎完全基于政治实力对经济基础的主导。为避免误解，需要强调此处的形而上学并不等同于非理性（如启蒙运动的激进流派对其渲染的那样），而是力图在理智与信仰之间进行调和。形而上学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进化并没有压制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需求），而是将科学从对形而上学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一门新的科学领域即社会科学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当然，与此同时，新型国家（“古代政权”）的实践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彼此助力（这远非巧合），共同开始迅速迈向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的英国、1776年的新英格兰和1789年的法国）。它们对专制主义体系发起了挑战，虽然这个体系此前为资本主义原型的进步提供了平台。以民主（尽管非常有限）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新权力观得以引入。与此同时，欧洲人对自己的特殊性形成了新的认识。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基督教下的）欧洲人虽然认为他们的宗教是优越的，正如其他人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宗教一样，但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比东方先进社会（在权力潜力方面）更加强盛。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知道相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他们已经获得了至少是潜在的优越性，因此他们能够征服整个地球，而这正是他们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

进化论批判

根据进化论的说法，所有的人类社会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处于不断进化之中（因此，资本主

义在这方面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个理论源于这样的一种历史哲学，其最终所依据的是竞争这个概念。它当然是基于对事实的现实观察，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时代的所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竞争——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关系是否显示它们知晓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最强大的必然获胜。在理论抽象的这个层面上，存在的确实是个单一的世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单一的人类。可能还可以加上一个判断，那就是大多数与其他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开放”社会适应这种竞争的可能性更大，它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竞争。另一条路则是逃避竞争，尽量自成一统，但这样做有被其他社会取得的进步所超越，而后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种论述并没有错，只是其抽象的程度太高，以至人们不禁要问真正的问题，即这种竞争如何体现出来。两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他们本身是历史哲学家——故意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最高程度的抽象（其目的是反驳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归结为两个概念的运作模式：挑战和应战。我认为这个理论对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成立，因而它对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事情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汤因比（1947年）对于迎接或者不迎接挑战的原因何在并没有给出通行的解释。他满足于对它们逐个进行分析。这几乎是经济学中矛盾的翻版：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宣称其原理（稀缺、效用等）适用于所有的时代，但各种生产方式之间却存在本质的差异，这决定了它们各自具体的制度框架，“人类的永恒理性”在其中表现出来。雅克·皮雷纳（1947年）在我看来远胜汤因比，他提出了一个精致的理论，即（面向海洋的）开放社会与（固守陆地的）封闭社会之间始终处于斗争之中，他毫不犹豫地称前者为资本主义社会（苏美尔、腓尼基、希腊、最初几百年里的伊斯兰、意大利各城市、现代西方），后者则为封建社会（从古代的波斯到中世纪的欧洲）。

对于我所称的资本主义原型要素，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其在开放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量。同样，他从不掩饰其理论意在贬低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向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活力致敬。因此，皮雷纳以人类社会中资本主义趋势与封建主义趋势之间的不断斗争取代了——当然是颇具技巧性地取代了——阶级斗争。

我仍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最好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在恰当的层面进行了抽象。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将历史明确而真实的维度交还给了历史。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突破此前生产方式的性质及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所以我认为不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此前时代各个社会之间的竞争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竞争。首先，这是因为此前时代的竞争极少达到有意识的高度，每个社会都以其自有的方式看待或者相信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这受其神灵佑护，即使危险迫近，令其竞争意识提高之时也是如此（比如说在穆斯林与东征的十字军之间）。另外，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些伟大的朝贡社会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一个社会并非明显优越于另一个社会；优势始终都是相互的和相对的。这与随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其他社会占据压倒性优势完全不具可比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种优势意识至关重要，并因此将资本主义的诞生定于1492年的原因所在。自那之后，欧洲人知道了自己能够征服这个世界，而且他们也这样去做了（参见我在《欧洲中心论》中针对这一点的论述）。我们事后知道（但当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最强大的”社会那时已经形成了具有本质优越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我还想再说一点，那就是在此前时代的竞争当中，地理距离起着阻碍作用。罗马与中国之间的交流虽然非常密切，但我觉得不能认为外部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发挥了同我们自己的时代相类似的影响。我相信距离上的遥远令完全内部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显著增加。这也解释了相关各方为何难以

评估真正的力量均衡。在我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则完全不同，体现为竞争的意识极其强烈，以至在各国当局的日常话语体系中，竞争是个被反复高调提及的地方。

朝贡式地区体系和世界体系举例

下面，我举例说明我的古代世界体系（那时只有所谓东半球的社会，即欧亚大陆和非洲）概念，时间上涵盖 18 个世纪，从中东希腊体系的建立（公元前 300 年），到中国汉朝的建立（公元前 200 年），再到中亚和印度的贵霜王朝和孔雀王朝（公元前 200 年），最后到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1500 年。

第一，我曾说过，这个体系的所有社会在上述时期里均属朝贡性质。但是，还是可以对它们进行区分，有些我会称为中心朝贡区，其他的则是外围朝贡区。前者的特点是在相对较高的国家层面拥有对财富盈余的集中，其再分配则由国家进行控制；而在外围区域，国家尚处于胚胎之中（甚至几乎不存在），这导致财富盈余分配完全解体，由地方性的封建体系垄断。这里所提出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后一种二元对立中所能看到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支配关系，中心地区优先于外围地区（而这与经济支配权有关）。在古代的地区关系中，情况则不是这样。在意识形态权威的主导之下，各个朝贡区或者具有中心，或者处在外围，这取决于集权过程及其通过国家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完成程度。在中心区域，国家宗教所采取的形式或者是国教，或者是有着宗教倾向的国家哲学，它具有普遍的感召力，不同于此前我称为的“公社形态”社会 [参见我的著作《阶级与国家》（1980 年）] 时期各种特定的地方性宗教。一方面是完全成形的

大型朝贡式社会的建立；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的宗教和哲学派系的出现，这两者间有着显著的关联性，这将主导此后 2000 年里的人类文明：古希腊哲学（公元前 300 年），东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公元 600 年），祆教、佛教和儒教（后三种宗教全部出现于公元前 500 年）。在我看来，这种关联性——它绝没有防止各个朝贡文明由于彼此之间保持着联系而带来的相互之间的让步——并非偶然，相反，在我有关何种朝贡方式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论述中，它构成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伴随着朝贡体系的形成，伟大的哲学和宗教运动风起云涌，代表着全球史上第一波革命浪潮的出现，表现为这些哲学和宗教具有普遍的感召力，超越了远古时代地方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这场革命使得朝贡体系成为整个人类的通行体系——或者几乎如此——长达 2000 ~ 2500 年。第二波全球性革命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以及有可能将其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其标志是文艺复兴（还有与之相连的基督教革命）以及随后的三场伟大的现代革命，即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参见《欧洲中心论》）。

在我看来，这种朝贡方式最典型的模式在中国，其出现似乎没有经历太长的孕育期（商周两代至汉朝的建立只有一个千年），但无论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或者意识形态（儒道两教合璧，仅在很短的时期里为佛教所取代）方面，还是在从汉朝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之间 2000 年里的权力观念方面，它所定型的那种形式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国家的财富盈余在庞大的社会层面达到了高度的集中，这不仅仅是在辉煌的时代，于各个伟大的朝代（汉、唐、宋、元、明、清）在这个大陆国家完全或几乎完全实现政治统一之时，甚至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也是如此，那时这个国家分裂为几个王国，但各自的面积在此期间也是相当的可观。在中国的边境上，朝鲜和越南

在这一时代首个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形成了类似的朝贡体系，虽然它们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但它们引进了中国的组织模式和儒教意识形态。

在中东，朝贡体系的形式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行动而定型。在这方面（参见《欧洲中心论》），我曾推荐以此来解读古希腊哲学、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哲学和宗教倾向。不过，这个地区朝贡体系的孕育期很长，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长达 30 个世纪，波斯、腓尼基等经历了 10 个世纪，希腊也有 5 个世纪。不仅如此，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将形成合流，从这三种古代思想，甚至从波斯和印度借鉴一些核心的要素。这个地区在接下来的 2000 年里同样出现了财富盈余的高度集中。当然，亚历山大时代的政治统一并不稳固，之后便出现了分裂。但在这段时期里，它分裂成了几个大规模的王国。因此，几个甚至更大的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公元 300 ~ 1400 年）和萨珊王朝（公元 200 ~ 600 年），随后通过形成于 7 世纪的穆斯林王朝——它在我们此处所考察的时代结束之时（1453 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不断扩张而再次得以逐渐统一，财富盈余的集中程度仍然存在且程度极高（在穆斯林王朝的前 300 年里），或者至少也可以说相当可观，这是穆斯林王朝从公元 1000 年起开始瓦解之后，在北非代之而兴起了阿拉伯 - 柏柏尔人的王朝，在马西利格和中亚西部出现了突厥 - 波斯人的汗国。在对历史的这种解读中，可以将西面的罗马帝国理解为其表现了朝贡模式向西面的地中海沿岸的扩张。罗马帝国在全球史中居于次要地位，其作用是把朝贡式的意识形态——其形式为西方的基督教——传递到了欧洲这个外围地区。

在这方面，欧洲中心论对历史的解读（参见《欧洲中心论》中所做的批判）扭曲了它的成就：在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对野蛮

的封建化过程没有能够形成抵抗（也就是说，朝贡体系的瓦解）。

第三个完整的朝贡中心于公元前 200 年在印度大陆上建立，在经过始于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公元前 2500 年）的漫长孕育期之后，先是出现在孔雀王朝时期，之后是贵霜王朝（其中亚西部有重叠）和笈多王朝。在经历了一个“碾碎”期（7 世纪和 9 世纪）之后，11 世纪起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与伽色尼王朝一起重新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公元 1200 ~ 1500 年）以及随后的莫卧儿帝国（公元 1500 ~ 1800 年），实现了高度的朝贡集中，而德干高原上的印度教国家也属朝贡体系，它们同样代表了这个时期规模可观的王朝。

欧洲（拜占庭地区和意大利之外的欧洲，也就是说，“野蛮的”欧洲）是朝贡体系嫁接到（通过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普救说理念传播）当时的社会形态后的产物，而当时的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已然恶化的公社的基础之上。对此，我想引用我所做出的分析（参见《阶级与国家》），这个分析既解释了对财富盈余的控制是如何瓦解的，同时又明确了封建制是朝贡体系的一种不完整的外围形式，虽说教会部分抵消了国家体系崩溃的影响。当时的欧洲正在缓慢地朝着朝贡体系迈进，这点可由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收复失地运动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百年战争之后的英国和法国）所证明。在我看来，这给欧洲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后发优势，促成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那种早期的本质飞跃（参见《阶级与国家》）。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日本构成了一个外围性的朝贡模式，其与欧洲的相似度之高令我印象深刻，这甚至发生在森岛通夫（1987 年）证实了我的观点之前。日本儒教的堕落，还有从德川幕府（公元 1600 年）开始才迟迟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权，而在此前封建制度即已瓦解，这些都证明了这种外围性（参见《欧洲中心论》），同样，这也解释了 19 世纪的日本为什么能够相当轻松地转型为资本主义。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构成了第三个外围区。它仍然徘徊在公社阶段，在朝着朝贡的形式发展。在这个阶段，朝贡体系中的财富盈余仅在规模有限的社会中进行集中。因此分裂仍然是普遍的现象。

东南亚的情况比较混乱。在我看来，有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中心型的朝贡形态，即使它们所覆盖的空间小于其他伟大的亚洲体系，也可以看到几个外围区（其财富盈余呈分散化）。属于第一类的有 5 世纪起的高棉帝国，以及它之后的暹罗国、缅甸国和柬埔寨国，可能还有 13 世纪起印尼的满者伯夷王国。在印度教（从公元 5 世纪起）以及随后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那些组织有序的社会形成了国家，在我看来，这些社会同属外围区。这一外围区的财富盈余是在相对而言无数个很小的且政权不稳定的国家集聚起来的，而这种分散性导致其崩溃。中亚地区各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相比其他地方，这个地区的边界划定不是那么清晰。早期这里建立了几个大型国家，比如说贵霜帝国，它们把希腊化的中东、萨珊王朝然后是伊斯兰化的中东与印度和中国直接联系起来。在成吉思汗时代（公元 1300 年），这个地区本身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在这一最终定型前后，它进入了伊斯兰的轨道。它的组织方式主要是朝贡式的，有时很先进（大范围的集权使之成为可能），有时则倒退至散乱的封建制之中。但是，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的主要特点是它是东西方贸易（中国、印度、中东及其以外地区与远至这个体系的外围区之间的贸易）不可或缺的中转站。这条陆上大通道亘古以来即与海上通道彼此竞争，但迟至 16 世纪才失去其重要性。

第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 18 个世纪当中，所有的这些社会不仅彼此共存，而且它们之间还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贸易、战争、技术和文化交流），其关系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紧密得多。在这个非常普遍的意义，我们得以谈论这个普遍的体系，而当然不会将其

性质错误地当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属性。为廓清事实，我想区分以下四组联系。

（1）三大中心（一是罗马和拜占庭、萨珊帝国、穆斯林王朝；二是中国；三为印度）彼此之间所保持的联系无疑是在所有联系之中最为密切的，只要考虑到这些中心所拥有的财富和相对力量即可，至少在其历史上的那些辉煌岁月是这样。

（2）阿拉伯-波斯这个伊斯兰中心与三个外围区（欧洲、非洲和东南亚）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贸易没有上一组的贸易联系那么密切（这是因为外围区相对贫穷），而尤其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对称的（我将“非对称性”这个概念与现代世界里中心与外围之间关系的特定的不平等性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这意味着它对中心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但对外围的发展却至关重要。这样的关系显著加快了非洲的萨赫勒和东非（参见《阶级与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区国家的建立，因此为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化铺平了道路（伊斯兰教因而取代了古老的地方性宗教，以此适应朝贡世界的需要）。它们还为意大利贸易城市的出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这些城市，它们还进一步渗透进整个的实行封建制度的欧洲。

（3）中国中心与日本和东南亚这两个外围区的联系同上述第二组联系性质相同。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使用的当然是中亚的大通道，但并不经过位于伊斯兰王朝核心地带的那条运河。这种直接的联系仅仅在蒙古霸权（13世纪的成吉思汗帝国）这个框架之中存在了相对较短的时间。但它对随后的历史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令欧洲得以利用到中国丰硕的技术成果（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欧洲那时已经相当成熟，足以采用从中国输入的先进技术，实现从外围性的朝贡（封建）体系向资本主义这一质的飞跃。不仅如此，这之后不久，欧洲以海上通道取而代之，对于古

代所有形式的长途运输而言，这是它一直控制着的一条大通道，由此，其建立起了与世界上所有地方（非洲、印度、东南亚）之间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它“发现”并随即“征服”了美洲。

（4）印度这个中心（佛教和印度教）与东南亚外围区之间所保持的联系类似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联系。

很显然，就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地区来说，相对各个地区的体量而言，它们对外联系的密切程度差异很大。就经济上所占权重而言，三个关键性中心区域（中东、中国和印度）每一个都多倍于任何一个外围地区。

地理位置赋予中东这个核心地区一种独特的地位，即它没有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欧洲通过对海洋的控制而克服了这个制约因素。实际上，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中国、印度、欧洲和非洲）都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具备这一特点的只有此地。在长达 2000 年的时间里，只要前往欧洲、中国、印度或者非洲，它都是无可回避的通道。另外，这个地区不具备类似于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同质性，不论是在地理方面（从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延伸到咸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安曼海湾，它不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是个整块的大陆）还是在民族构成方面，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最为古老文明（埃及、苏美尔、亚叙、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赫梯、腓尼基和希腊）早期繁衍的产物，说着隶属于不同语系（闪语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行动和希腊化的种族融合所取得的成功触发了各民族集体意识，这种认同感随后又因东方基督教（以萨珊王朝的疆界为限）以及其后的伊斯兰教而得以加强，其中伊斯兰教所起到的凝聚作用最大。

在我看来，这是伊斯兰教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这个地区在回教纪元前三个世纪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最终稳固确立了下来。它

由伊斯兰化的三个民族叠加组成，即生活在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阿拉伯人，从扎格罗斯山脉以东至巴基斯坦的波斯人，以及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和从里海到中国边境的整个突厥斯坦的突厥人。所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将所谓经典的“东方”各民族统一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它还把中亚这个前往中国和印度北部必须途经的大通道纳入了自己的麾下。我认为其成功应归因于以下事实：尽管这个地区在历史上见证了太多的内部冲突，伊斯兰教还是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某种团结，强化了这里的人民相对于“别人”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感，具体而言，这些“别人”就是与穆斯林“国家”接壤的那些地方所生活着的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和非洲人。伊斯兰教的成功给中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地区统一。这是因为在这个地区，跨境贸易超过了当地产生出来的财富盈余，其文明依赖于是否有能力夺取部分的跨境财富。

整个中东地区及其在中亚的附属领地与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非常广泛，这赋予其社会体系一种特殊的性质，正因如此，我斗胆称其为“商业-朝贡”属性，以此表明资本主义的各种原型形式（商业联系、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私人产权或者说土地私有制）在伊斯兰朝贡社会中的规模有多么庞大。此外，在原有疆域之外，中东各国还逐渐征服了非洲和东南亚这些外围区域，这也非常有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商业活力（参见《阿拉伯国家》和《阶级与国家》）。

第三，上述文艺复兴之前 18 个世纪里的世界体系并不等同于（时间上）位于其后的现代体系。认为古代体系全部都是甚或阿拉伯-伊斯兰这一部分是现代体系的先祖，这种看法容易引起误导。因为这只是老生常谈——时间上的更替，仅此而已；或者它暗示着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而仅有量的发展，这个体系的重心仅从地中海南岸转到北岸（意大利各城市），再转至大西洋两岸，但这从根本上抹杀

了这个体系的性质所发生的实质性改变，即质变：价值规律支配着现代体系而非朝贡体系的运动。价值规律的这种普遍化是一个单一的二律背反得以确立的全部原因，这个二律背反在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形成的各国中心凭借其地位所构成的中心地带以及所有在经济上依赖于这些中心的外围地带）发挥其作用，由此造成了中心与外围之间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这在资本主义所在的整个五个世纪里都是如此，在其无远弗届的规律的框架之内，在全部可见的或者想象的时空里也全都如此。就此而言，无论什么都无法与朝贡时期各关键性中心区域之间持久的相对均衡（持续了2000年）相比。这种质的区别致使我们无法谈论古代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事实上，不同于现代世界里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地区间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三个关键性的区域当然相互之间（并与其他区域）有着某种关系。需要证明的则是这种相互依存原本必不可少。它们的发展趋势虽然彼此平行，但这并不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仅仅反映了支配着全人类社会（由此确定了其特性的状态）的那些规律所具有的普遍性。可能的相伴崛起和过往状况的特性则远非显而易见。

皮雷纳（1947年）已经指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汉朝的衰亡相伴出现，这个观点后来又为弗兰克所采用。但罗马衰亡之后是拜占庭、萨珊和贵霜帝国的崛起，而在汉朝衰落之后，正好从公元600年（西方的野蛮主义高度发展之际）起，则是唐朝的兴起以及此前300年开始的笈多王朝的崛起，后者的衰落又同伊斯兰教的兴起同时发生（这纯属巧合）。对于如何识别兴衰循环的普遍规律，我们并无线索可循。从本书的角度而言，甚至“衰亡”这个说法本身都具有误导性；它是某个地区国家组织形式的衰落，至于生产力，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衰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反而是个相反

的现象，那就是这些长期并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从罗马到拜占庭、萨珊、伊斯兰教再到奥斯曼和萨法维，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王朝，从汉朝到明朝和清朝，质变仅是少量的，但在相同的组织（朝贡）基础之上，数量上的进步则颇为巨大。这并不排斥以下事实，即在考察各个地方的发展时，我们可以对任何特定的政治崛起（或衰落）加以解释，不过由于某种特殊的联系——外部关系偶尔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崛起（或衰落）可能仍然是相对的。它们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也同样不具有可比性，由于价值规律——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普遍发挥其作用，其所及范围是真正全球的。在欧洲新的现代性短期内即实现了成形（从意大利各城市的崛起到文艺复兴，用了300年到400年的时间），这并非重复了一个一般性的现象，这个现象将所有文明的诞生（埃及、苏美尔、哈拉帕和商朝）和帝国的建立（阿契美尼德、亚历山大、罗马、拜占庭、萨珊、倭马亚、阿拔斯、奥斯曼、萨法维、孔雀、笈多、莫卧儿、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以及成吉思汗帝国）全部涵盖于其中。

我提出了对于这个事实的一个解释（参见《阶级与国家》），那就是质变首先发生在朝贡体系的一个外围地带（欧洲），而非某个中心区域（中东、中国或印度），然后又在另一个外围地带（日本）再次发生。我的这个解释所依据的是外围地带的灵活性与中心区域的僵化所形成的鲜明对照，也就是说，我的解释同时还符合社会演化规律的一般性质这样一个逻辑背景（即“非均衡发展”，这是总体上相同的演化的一般形式）。我认为这个解释相比各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更加令人满意（参见《欧洲中心论》）。我还觉得它优于皮雷纳的理论，我曾指出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它是开放的代名词，尤其指海洋领域的开放）与封建主义（它是封闭的代名词，尤其指内陆

领域的封闭) 的永恒对立之上。由于皮雷纳的理论同弗兰克的理论所依据的都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特定性质的否定, 所以前者与后者同属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变体: 它将欧洲的奇迹归因于这个地区在海洋领域的开放。

当然, 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形有其历史 (并非魔术般地一蹴而就, 比如说在 1493 年), 给其他地区随后的演化也带来了特定的影响。意大利各城市的快速发展当然促成了这种成形, 但它本身也是阿拉伯 - 伊斯兰地区朝贡性商业扩张的结果。不过, 正是由于意大利的这种扩张是在一个外围地区 (封建制的欧洲) 进行的, 所以它点燃了燎原之火, 加快了社会演化的速度, 从而在欧洲创造出了一个本质上优于此前的发达社会的制度。我 (在《阶级与国家》中) 对这个假说给出了一个详尽的解释, 这个解释确立了国家的贫弱与一个自治区域的建立之间的联系, 这个自治的地区为一个新的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空间, 其后国家与这个中产阶级形成联盟, 其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新的、绝对的、重商的国家, 从而在打破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欧洲的这种 (资本主义的而非封建主义的) 新定型的总体后果显而易见: 它阻碍了世界上其他社会的演化, 在新的全球体系中, 这些社会逐渐遭到了边缘化。不仅如此, 欧洲定型为资本主义还导致了它对阿拉伯 - 伊斯兰地区明确的敌意。在此处, 我们可以重温我此前针对伊斯兰世界在旧体系当中的具体地位所提出的观点。为了建立对自己有利的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之间的直接联系, 欧洲必须打破伊斯兰世界所享有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垄断性的媒介地位。早先十字军东征所进行的尝试过后, 紧接着就是欧洲与中国之间联系的确立, 这由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和平开启, 这种敌意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其表现形式是对待穆斯林特别神经过敏的态度, 而且这也招致了对方类似的回应。欧洲人跨海远航正是为了

最终绕开这个无可回避的媒介区。与皮雷纳的看法相反，这种选择并非某种地理决定论的结果。

第四，针对这 2000 年所做的评论并不适用于此前的时代：一方面，此前时代的那些为人所知的文明社会——更不必说野蛮人了——其组织形式有时不同于其后的朝贡时代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也不相同。当然，随着时间继续前推，我们关于过去的科学知识甚至更加微乎其微。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对与“前朝贡时代”有关的两条思路进行区分（即两类历史哲学之别）。皮雷纳的理论——它在这个基本点上同弗兰克所捍卫的那些观点相类似——并不承认公元前 300 年左右出现了任何质变，不论是在当代肇始前后还是从罗马帝国终结时开始（按当前教科书的说法，那时是古代的开始），均无质变的发生，正如它并不承认出现过任何质变将现代与古代区别开来。事实上，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在皮雷纳看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共同点都是开放的、面向海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封闭的、固守于内陆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之间的对立。不仅如此，类似于弗兰克，皮雷纳强调的是所有时代都存在着的各个社会之间的交流关系，无论这些社会之间距离的远近（比如说苏美尔、印度文明、埃及、克里特、腓尼基和希腊之间的交流）。类似于弗兰克，皮雷纳的理论建立在线性的历史哲学之上：进步是数量上的、持续不断的，并无任何质变发生；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它是“积累的顶点”。另一方面，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了文明的三个阶段，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我并不进入马克思学说的领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即这个理论是否真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还是它只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理解。无论如何，这个理论指出了上文所列的所有社会都是封建社会：对欧洲来说，从罗

马帝国终结时起；对拜占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来说，从其形成之日即起；对印度来说，自孔雀王朝开国之时起；对中国而言，则起始于汉代。另一方面，依据这个理论，它们此前必须经历一个奴隶制阶段，其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存在以希腊和罗马为典型。在我看来，人们以此类推，提出奴隶制阶段也存在于中国（从商朝到汉朝）、印度（印度河和雅利安文明）和中东（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按照这个理论的说法，其他地方存在的奴隶制，以及由于早先的公社形态的解体而后来在非洲的某些地方出现的奴隶制，证明了经历奴隶制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要求。

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参见《阶级与国家》）。我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有以下判断：（1）公社形态之后所继起的阶级社会的一般形式是朝贡社会；（2）封建制这种形态并非通例，它只是朝贡形态的外围形式；（3）各种条件决定了每个朝贡社会的具体形式（种姓、欧洲意义上封建时代的庄园、受制于国家官僚体系的村落，等等）；（4）奴隶制并非一个普遍的要求——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当中，大多数并没有经历奴隶制（埃及、印度和中国）；它很少经历任何重大的发展，除非是它与商业经济相连，因而身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显著不同的时代（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和美洲直至19世纪的奴隶制）。那么是不是说，在上文所列的朝贡社会瓦解之前的那些时期与前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其他时期没有区别？特别是埃及提供了一个朝贡社会的例子，它几乎同奴隶制没有丝毫关系，后者的历史开始于希腊时代定型之前3000年。在亚述、巴比伦和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伊朗，很有可能还有孔雀王朝时代之前的印度和汉朝之前的中国，有时实行的是奴隶制，但这种做法并不构成剥削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最后一点，根据我的理论，在形成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一种超越了血亲意识形态和此前的共同体阶段所特有的国家宗教、

因而建立在普遍的价值观之上的宗教——之前，一个朝贡社会并不定型为其完全的形式。在这方面，袄教、佛教和儒教宣告了朝贡社会的定型。而在此之前，我宁愿谈论的是“孕育”甚或“从公社形态向朝贡形态的长期过渡”。这种过渡在中国可能相对简单而迅速，但在印度，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破坏了印度文明，其过渡因此也就比较复杂。在中东地区，种族和发展轨迹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我们必须将这个地区视为一个体系。在这个背景下，我将早熟的埃及置于朝贡社会之中，希腊的奴隶制则具有独特的商业属性，我也因此特别看重希腊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性，它揭开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革命的序幕，这些革命后来又接过了将这个地区统一起来的使命。

距离今天相当遥远的这些时代里的这样一些社会，其交流关系是否紧密到令我们可以谈论“体系”的地步？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文明的社会，即那些在向朝贡形态过渡中先行一步的社会，依然是世界上各个社会所构成的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即使在它们平行发展之时，它们的发展轨迹也并不说明这些社会确实组成了一个体系，而只是证明了一般演化法则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 Amin, Samir (1978) *The Arab Nation*, London, Zed Books.
Amin, Samir (1980) *Class and N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in Samir (2011a) *Eurocentrism*, Oxford, Pambazuka Press.
Amin Samir (2011b) *Global History: A View from the South*, Oxford, Pambazuka Press.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Frank, A. G.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nsour, Fawzy (1990) *L'impasse due mond arabe*, Paris, L'Harmattan.

Morishima, Michio (1987) *Capitalisme et Confucianisme*, Paris, Flammarion.

Pirenne, Jacques (1947)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Albin Michel.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ynbee, Arnold (1947)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三章

衰落：马穆鲁克国、复兴运动的失策和 政治性伊斯兰教派

第一个地区的衰落肇始于基督纪元（公元）的第一个世纪——因而是在这个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很久的事情。以这一衰落为背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伊斯兰教首次壮观实现的非凡“重生”：希吉拉纪元的前三个世纪？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重生是古典希腊精神最后的辉煌（或者说绝唱）。不要忘了，这次的重生与这个地区的枢纽功能密不可分，这个功能在这一时代依然重要，同时由于哈里发的统一还得以强化。但应强调的是：这个地区在此时期并非是“均质化”的，这是因为这里有着多种语言，基督徒也还生活在这里，他们的人数仍然众多。这一点为当代的阿拉伯意识形态分子所忽略。

阿拉伯人的征服这件事本身的意义不明。伊朗人因此对伊斯兰教的“开放”和阿拉伯人的“征服”进行了区分。他们赞美前者并以超越了后者而感到自豪。在埃及，多数阿拉伯的史学家选择视而不见的科普特战争触发了灌溉农业的崩溃。而既不痛恨阿拉伯人也不憎恶伊斯兰教的史学家已经证明：叙利亚和北非两地的沙漠化阶段与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的入侵有关。

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止哈里发的辉煌重生，它延伸至马格里布并远及安达卢西亚。除了将古希腊的传统传给正在马格里布形成的阿拉伯人之外，大马士革还以我在我的《欧洲中心论》一书中所分析的科技和哲学方面的巨大进步，令哈里发得以丰富自我。巴格达则使得在古希腊的伊斯兰教基础之上嫁接来自伊朗及更远的印度的知识成为可能，但随着这个地区失去了文化多样性这一源头活水，这场绝唱便逐渐谢幕了。

当时被阿拉伯写作者们称为法兰克战争的十字军东征加速了这种衰落，而在萨拉丁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际，事实证明它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它导致了这个地区全面封闭，眼睁睁地看着欧洲人取得了他们首次成功（1250~1500年）：发现了前往中国的新通道（向北的俄国通道以及后来的海上通道）。这个地区维持住了自己的枢纽地位，尽管它已经不再是必经之路。奥斯曼的征服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统一在了一起，不过是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但它来得太迟，已经无法促成第二次重生。它在时间上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开始盛行重商主义相重合，新生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了大西洋两岸。

即使事后看来衰落不可避免，它却并非是个连续的过程。在奥斯曼征服之前和之后，马穆鲁克人的埃及做到了再次与印度和中国开展兴旺的贸易并从中获利。但无论这个时期出现了怎样的起起伏伏，衰落的大趋势仍在继续。18世纪结束之时，拿破仑·波拿巴轻松打败了埃及，这证明非常严重的衰落已经出现。不过，这也激发了一场新的辉煌的狂飙突进，其领导者是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们，直至伊斯梅尔总督。我们今天会称那个时期的埃及为“新兴”国家。奥斯曼帝国在大不列颠的支持下（就像绞索支持着即将被绞死的人一样）对此做出了暴烈的反应，残酷终结了这场狂飙突进，进而为英国人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正是这轮衰落，再加上欧洲的资本主义因为工业革命而得以加速发展，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化：早期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奥斯曼帝国的半殖民，然后则是 19 世纪末英国人对埃及和苏丹的殖民，法国人对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殖民，以及后来在 1920 年对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的殖民。

本章不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并不复述这段历史。以下的这些思考完全与阿拉伯世界对其自身的衰落所做出的反应有关。首先，我研究了马穆鲁克国的创立问题，这个国家在奥斯曼政权时期一直存在，其变体还以“独裁国家”的形式延伸到了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然后，我考察了 19 世纪的阿拉伯 -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我看来，这只是一场失策的运动（它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挑战这个现实）。最后，这一失策的后果是大获成功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及其在政治上的变体得以定型。

马穆鲁克国

在奥斯曼的征服之前，由萨拉丁在战胜东征的十字军之后所创立的马穆鲁克国一直存在，控制着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的地区，因而它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主要部分。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个复杂的体系，把军阀个人化的权力（相对结构化的、集中的，抑或是分散的）、商人和宗教分子结合了起来。我强调这些人都是男人，因为女性显然不被允许承担任何职责。这个组织的这三个部分并非简单并置在一起，它们实际上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权力现实。

马穆鲁克人是战士，他们的合法性源于伊斯兰教的某个概念，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伊斯兰世界（为和平的治理所统治的社会）和

超伊斯兰世界（追求吉哈德即“圣战”之地）之间的区别。并非偶然的是，政治治理这个军事概念由征服者突厥人和奥斯曼人编造出来，他们称自己为“加兹”，即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同样并非偶然的是，马穆鲁克的体系从萨拉丁时代开始建立，而萨拉丁则是此前一直被东征的十字军所占领的那片土地上的解放者。在提到萨拉丁的名字时，民粹主义的国家和当代的民族主义者们总是满怀敬重与钦佩之情，却从不考虑或暗示肇始于他的这个体系所带来的浩劫。十字军东征结束之际，阿拉伯世界（那时变成了突厥-阿拉伯世界）开始了军事上的封建化和自我孤立的过程，这说明其衰落终结了早前几个哈里发世纪里的灿烂文明，而欧洲此时正在开始抛弃封建主义，并且在着手创造现代性并进而征服全世界。

宗教分子以伊斯兰教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而作为对他们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补偿，马穆鲁克人让这些人垄断了对宗教教条的解释，对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和以社会道德文明为名所推行的法律的解释。宗教被降至仅拥有纯粹传统的社会功能，即对仪式的尊重是它唯一重要的考虑，由此而绝对受制于军阀的独裁权力。

经济生活因此要看军事政治当局的心情。只要有可能，农民就会为这个统治阶级的反复无常所左右，私人产权时时受到威胁（相关的原则被伊斯兰教的核心文本绝对神圣化）。贸易收益同样遭到不遗余力的榨取。

马穆鲁克的统治阶级自然追求扩大其独裁权。马穆鲁克人在形式上听命于苏丹-哈里发，但借助马穆鲁克当时与首都（伊斯坦布尔）之间距离的遥远，他们在自己所控制的领土范围内将个人的权力发挥到了最大。在这片有着悠久的国家集权传统的土地上，比如说其中的埃及，曾经有过反复的努力，对他们这个军事集团从整体上施加约

束。通过大规模屠杀马穆鲁克人，穆罕默德·阿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央集权政权，这并非偶然的现象，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再次确立了处于他个人统治之下的军事和地产贵族独裁。突尼斯的大公们试图在相对有限的规模上做同样的事情。阿尔及尔的总督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成功。奥斯曼的苏丹接着这样做了，由此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库尔德和亚美尼亚各省以及历史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各省整合在了一起，置于一个以此方式进行了“现代化”的政权之下。

只是现代化吗？抑或只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独裁政权？开明的专制？抑或只是专制？波动和变异处于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并没有催生任何东西，令自己能够实现超越。

当然，马穆鲁克这个典型的独裁模式不得不面对无数各异的现实，这些现实总是定义了它真正的权力边界。在加筑了工事的山上避难的农民村落（卡拜尔人、马龙尼人、德鲁兹人、阿拉维人等）、几乎无处不在的苏菲教派的兄弟会以及各个部族，这些都令统治阶层不得不与宗教团体达成妥协并对其持容忍的态度。在摩洛哥，马格曾与布莱德西巴之间的对立属于类似的性质。

复兴运动的失策

现代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要这样做，他们就有权进行创新，并无必要尊重传统。宣布这样一个原则意味着与统治着所有前现代社会——其中当然包括封建的和基督教的欧洲——的那个根本原则决裂。这个原则要求彻底抛弃权力合法化的那种主导形式——在家庭里，在组织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社会中，以及在国家当中。而这样的国家此前一直

以通常由宗教术语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它暗含着国家与宗教分离和激进世俗化之意，这是采用现代政治形式的前提条件。

这个宣言催生了现代性。这不是再生，只是出生。欧洲人自己称这个历史时刻为“文艺复兴”，但这个说法是有误导性的。它源于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构建，按其所说，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知道了现代性原则，但在中世纪（在旧现代性和新现代性之间），它被宗教蒙昧主义所埋葬。这是神化了古代的认识，这种认识进而奠定了欧洲中心论，欧洲据此宣称继承过去是“对源头的回归”（因此是文艺“复兴”），而实际上，它是与自己的历史决裂。

现代性并非碰巧与资本主义同时诞生。在社会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新的生产体系的特征是企业的自由、市场的进入以及宣布私有财产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神圣的”）。经济生活已经从政治权力的托管之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托管关系则是前现代性政权的特征所在，由此，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自主领域在发展，受制于自己的法则。资本主义以一个逆向的过程取代了传统的财富决定论，这个新的过程使财富成了权力之源。

阿拉伯 - 伊斯兰复兴运动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内部社会进程的产物，是针对当时的欧洲所特有的矛盾，以发明资本主义来找到的解决办法。然而，阿拉伯人通过模仿所称的他们自己的文艺复兴——19世纪的复兴运动——却并非如此。它是针对外部冲击所做出的反应。现代性给欧洲带来了强大和胜利，这在阿拉伯世界造成了双重的影响：既让阿拉伯人为之吸引（对其充满崇敬之情），又让他们心生厌恶（他们看到了征服者的傲慢自大）。阿拉伯的文艺复兴是从字面上理解“文艺复兴”这个词的

意思。他们以为，如果他们也“回归”自己的本源，就像欧洲人已经做的那样（这是欧洲人自己的说法），那么即使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低谷，他们也终将会再次强大起来。这场复兴运动并不知晓令欧洲强大的现代性的本质何在。

这里不是在探讨这场复兴运动的不同层面和各个阶段。我仅简要指出复兴运动并没有实现同传统的必要决裂，而这是现代性的本质所在。复兴运动没有意识到世俗主义的涵义，换言之，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能够确保政治发挥自由创新——就此而言，也即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作用。复兴运动认为，能以清除了蒙昧主义倾向的宗教阐释取代世俗主义。不管怎么说，时至今日，阿拉伯社会仍然无法足够理解这一点，即世俗化并非西方世界的一个“具体的”特点，而是现代性的一项要求。复兴运动也不理解民主的涵义，它应被理解为有权同传统决裂。正因如此，它依然是独裁国家的那些概念的奴隶；它希望并祈祷出现“公正的”暴君——即使他们并不是“开明的”，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重大。复兴运动并不明白现代性还将激发女性对自身自由的渴望，因而行使创新权并同传统决裂。最后，复兴运动认为现代性仅仅就是其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技术进步。这种一厢情愿的过于简化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它的推行者们并不清楚这场运动当中所存在的矛盾，有些清醒的思想家是知道现代性所带来的真正挑战的，比如说卡赛姆·阿明对女性解放重要性的认识，阿里·阿布德尔·拉泽克对世俗主义的强调，还有凯瓦基比对民主所带来的挑战的理解。不过，这些突破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恰恰相反，阿拉伯社会的反应是拒绝走向这些思想所揭示的道路。因此，复兴运动并非阿拉伯世界现代性诞生之兆；相反，它是其流产的标志。

纪尔伯·阿胥喀在其皇皇巨著《阿拉伯人与大屠杀》当中分析

了拉希德·里达的文字，后者是复兴运动这个链条上最后的一环。里达写作于20世纪20年代，其文字从一开始就激励着穆斯林兄弟会。他所提议的伊斯兰教被定义为“向着本源的回归”，却严重缺乏任何严肃的思考。它是一种实用的保守主义的伊斯兰教，它所肯定的是社群主义和仪式。瓦哈比主义也对哪怕只是丝毫迹象的批判性思维表达了仇恨，它所满足的只是过时的游牧社会的需要，而里达和穆斯林兄弟会对瓦哈比主义的支持则昭示着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的到来。

现代性的局限性和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约之下运行的现代性因此是矛盾的，其所承诺的远远超出了其能实现的，因此它带了无法满足的期望。这一断裂发生于16~18世纪的欧洲，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无论在其诞生之地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当代人因而面临着此种现代性的种种矛盾，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唯一所知的现代性，但它仅仅是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在摧毁着人类，他们沦为了提供劳动力的商品。此外，资本积累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大多数人而言——对那些身处这个体系外围的人而言——这抹杀了现代性所承诺的满足其需要的可能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现代性是相当可憎的，因此它遭到了激烈的抵制。但抵制是消极的行为。由于缺乏可替代的方案，反抗显得无力，人们最终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要求，而他们原本宣称要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加以抵制。主要的幻觉建立在对前现代的过去的怀旧之上，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和外围都能找到持此种怀旧心态者。在体系的中心，怀旧表现为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们并无具有重大意义的梦想、保守主义的呼吁以及以某种方式弱化各种思想

解放要求的危险性，从而导致现代性沦落为一种无法连贯的拼凑之物，将过去受到操控的残渣与当前的要求混为一谈。但在外围区域，对过去的怀念则是激烈并且合理的反抗的结果，由于这种反抗很显然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挑战本质为何并不知晓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已经变得神经过敏且力不从心。

此种怀旧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通常采取宗教激进主义的宗教基调，这确实实际上掩盖了一个常规的保守性选择，即种族的基调，它被装扮成具有特定的美德、超越了其他形式的社会现实，比如说阶级。所有这些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附着于一个文化主义的论点之上，宗教和种族主义借助于此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些超越历史的特性，它们定义了无形的身份。虽然并无科学的依据，但这样的一种态度仍然能够动员起大众，后者遭到了边缘化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造成的破坏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这种态度也是实施操纵的有效手段，而如此的操控对这样一个战略形成了支持，这个战略就是实行事实上的压制，令人们臣服于居于主导地位的合力的独裁统治，而这是一股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在地方上的和附属的传送带当中的合力。政治性的伊斯兰运动是以这种方式操控外围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在拉美和非洲，基督教新教机构的蒙昧主义“教派”大量涌现，其目的在于遏制解放神学并操纵上述失落者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保守的官方教会的反抗。

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教有其历史，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族和宗教一样，而在其历史当中，对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及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适应，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不论是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体系，还是当代的这场宣称是伊斯兰教取向的运动，都对这个历史现实予以了否认。事实上，这两者有着相同的文化主义偏见，据此偏见，各个民族及其宗教不同的发展轨

迹当中所特有的“特性”是不可剥夺的，无法衡量并超越了历史。当代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以一个颠倒过来的欧洲中心论来反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

独裁国家的永恒化

阿拉伯世界里权力行使方式方面的创新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上面所说的这些可以说已属过去？独裁国家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管理方式依然岿然不动。但它们深陷危机，这令它们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越来越无法应付现代性的挑战。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的出现、政治冲突中的困惑，还有就是社会斗争的重新爆发。

阿拉伯世界里并无一个民主国家。有的只是独裁国家。这当然是一个仓促的判断，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使我们以后将试图发现其中的缺陷，通过政治和社会斗争，启动对此现实的变化。

这种普遍的独裁当然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应于独裁的每种常见形式，我们不难说出其耳熟能详的名称。阿拉伯民族的处境取决于其领导人的心情，事实证明这些人从其本质上来说或是暗杀者的将军，或是以对他人实施酷刑见长的低级警官，或是永久修建了黑暗地牢的国王，或是身处部落金字塔顶的首领，抑或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有时情况会稍好一点，这时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是个真正开明的专制君主，或者是个好说话的王位继承者，因此也就相对宽容。虽然黎巴嫩这个国家看上去是个例外，因为它定期举行选举，总统实际上也是每4年更换一次，但是它具有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共同特点。举例而言，如果说“民众对这些选举不乏一定兴趣”是真的，这也只是

因为换来换去的政治当局非常相像，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是独裁的，但其合法性并非总是遭到各自社会的否认。按照哈桑·沙拉比 1991 年的说法，国家的权力始终等同于个人的权力，而不是等同于法律的权力，后者是现代国家的本质所在。对这种韦伯式的描述性分析值得加以限定，这是因为这种个人的（或者说个人化的）权力，只有在宣称尊重了传统（尤其是尊重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教法）并且被视为如此的前提之下，才是合法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这是沙拉比在独裁体制与社会价值体系的“父权”性质之间所确立的关系。此处对“父权”一词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人们对通俗化了的常用语“男性至上主义”所赋予的意义（针对社会中的女性坚持实行边缘化）。这里所说的父权是一个体系，它在所有的层面上都维护服从的义务：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压制最为微不足道的批评，神圣化家庭体系中的层级（当然是使妇女和儿童处于从属地位），与此同时，在商业领域使员工从属于雇主，在公共服务部门使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绝对禁止进行宗教解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观察——这在我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与我从我提出的现代性的定义当中以及我从现代性构成的挑战当中所得出的结论相互衔接。

独裁政权从传统那里获得其合法性，这超越了非现代性的那些原则。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是传统的国家君主制或宗教君主制，比如说在摩洛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摩洛哥的政党质疑这种君主制的口号：上帝、国家和国王），或者是过时的部落君主制，比如说在阿拉伯半岛，还或者是屹立不倒的马穆鲁克国。

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尚的话语体系所力图做到的，是以一种宣称针

对社会“管理”是“理性的”因而是“共识性的”语言，取代对于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分析。后现代主义因此并不使用社会斗争这一清晰的语言，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关于社会“运动”的话语体系。这种词语上的替换绝非是中性的，因为它假设社会内部已经达成了和解，而且它所说的这些运动为它引发了一场势不可当的运动，言下之意是这将带来至善至美的未来。社团的被称为去中心化运动的爆炸式发展——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各种各样的所谓非政府组织——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这种质变。

伴随着资本对其反对者残暴独裁的大规模卷土重来，这套话语体系兴盛一时，而资本的反对者们则暂时遭到了削弱，但这套话语体系正在渐渐失去其信誉，虽然它曾经一度借此获益颇丰。这种有利于资本一方的不平衡远没能构建和平的共识，而是促使人们回归社会斗争，这是权力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引导社会运动实现更多公正和民主以及取得更大效果的前提条件。这些斗争并非发生于政治经济真空之中。至少部分而言，它们在发展中所针对的是当代的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这双重的权力。换言之，它们在发展中所针对的是管理型国家的那些做法以及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后者构成了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以及为此服务的国家手里的备选项。

偏离了方向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

复兴运动的失策所导致的致命后果是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的出现。

致命的错误在于认同伊斯兰教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出现是文化上和政治上落后的人民站起来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除了其类似于返祖现象的蒙昧主义的语言，这些人无法理解任何其他语言。不幸的是，这种错误不仅由居于主导地位的简单化思维的媒体所广泛传播，而且

还为伪科学的欧洲中心论话语体系和笨拙的东方主义所同声附和。此种观点建立在充满偏见的假设之上，以为只有西方才能发明现代性，由此令穆斯林囿于无法改变的传统当中，使其无法理解必要的改变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正如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有其历史。这是一部对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充满了各种不同阐释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及宗教之间相互转化和彼此适应的历史。然而，这部历史的这个现实不仅为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体系所否认，也不为当代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各种运动所接受。事实上，这两者有着相同的文化偏见，它们认为赋予其各自民族和宗教的不同发展路径的那些“具体的”特征是无形的、无限的、超越了历史的。对于西方世界的欧洲中心论，当代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所仅仅反对的是一个倒置了的欧洲中心论。

宣称是伊斯兰教的运动出现，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猛烈的反抗，其所针对的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的使命并未完成、遭到了阻截并具有欺骗性的现代性。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绝对合法的、针对对于所涉及的民族什么都给予不了的体系的反抗。

作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选择而提出的伊斯兰教话语体系（历史社会主义的现代体验显然被吸收了进去），就其本质而言是政治性的，毫无神学属性可言。经常被强加到伊斯兰教头上的“宗教激进主义”属性与这套话语体系根本没有对应关系，不仅如此，除了几个当代伊斯兰教知识分子被西方舆论称为而不是自称为“宗教激进分子”之外，这个属性同伊斯兰教甚至连间接的关系都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伊斯兰教与每一种解放神学都是死对头。政治性的伊斯兰教鼓吹服从而非解放。只有苏丹的马哈茂德·塔哈在其

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中尝试过强调解放这一元素。塔哈被喀土穆当局判处死刑并遭到处决，他不被任何激进的或者温和的伊斯兰教团体所承认，任何认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只是愿意与这场运动进行对话的知识分子也未曾替他辩护。

在其对《可兰经》的阐释中，马哈茂德·塔哈对涉及麦加的章节和涉及麦地那的章节进行了区分。前者证明了主所传讯息中对解放的渴望，以及全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被镌刻在主的形象当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断接近这个理想而努力奋斗。而后者则对应于一时之需，对应于在阿拉伯半岛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进行的组织。

这种解释让穆斯林社会得以针对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来认识伊斯兰教教法的演变。塔哈的解放神学（在阿拉伯语中称“fiqh”）所反对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那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这种解释赋予伊斯兰教教法一种确定的、超越历史的特性，麦地那所实行的伊斯兰教教法便是如此（参见笔者2005年的文章）。

这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们对神学并无兴趣，他们从不提及与神学有关的经典文本。因此，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教似乎只是宗教的传统的和社会的版本，仅仅局限于对仪式的正式的、整体性的尊重。这样的伊斯兰教会确定一个人因为传承关系所归属的社区，就像种族那样，而非由于此人有着强烈而密切的个人信念。这完全是个维护集体认同的问题，别无其他。这就是“政治性伊斯兰教”这个词语更为准确地描述了阿拉伯国家里的这场运动的原因所在。

现代的政治性伊斯兰教由东方主义者所发明出来，服务于英国在印度的政权，之后为巴基斯坦的毛杜迪所全盘照搬。它的主要内容是“证明”不允许穆斯林生活在一种本身非伊斯兰的状态当中——对印度被分而治之的前景无动于衷，因为伊斯兰教不会对政教分离这样的

一种可能性视而不见。这些东方主义者没有看到的是，13世纪的英国人原本不会想到他们没有基督教也能活下来。

毛杜迪因而搬来了这套理论，规定权力仅仅来自主，从而否定了公民有权制定法律这个观念，国家仅仅受托执行已经一劳永逸地制定好了的法律（伊斯兰教教法）。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此前已经写过类似的东西，对发明了现代民主和个人解放的那场革命进行了指责。

政治性伊斯兰教否认争取解放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它不赞同民主这个原则本身——社会以其在立法上的自由开创其自身未来的权利。舒拉原则（伊斯兰政治协商制度）并非如政治性伊斯兰教所宣称的那样是伊斯兰教的民主形式，因为它被针对创新的禁令所束缚，而如果需要，它只接受对于传统所进行的创新阐释。舒拉只是所有前现代和前民主社会中多种协商形式当中的一种。当然，对文本进行的阐释有时是在新的需要推动之下出现的真正变革的载体。不过，不变的事实在于：受制于其自身的原则——否定人民有权与过去决裂，文本阐释导致争取社会变革和民主的现代斗争陷入僵局。因此，严格说来，将伊斯兰教的党派与现代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相提并论的说法并不成立，因为不论激进还是温和，这些伊斯兰教党派全都以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为名，固守于同一些反现代性的原则，尽管美国的媒体和外交界不断暗示这两类政党可以相提并论，其目的在于为它们对可能是伊斯兰教的政权进行支持提供合法性。基督教民主是现代性的一个元素，它赞同创造性民主这个本质性的概念，认为这是世俗主义这个概念必要的方面。政治性伊斯兰教则拒绝现代性，它宣布这个事实，却不能理解它的重大意义。

因此，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伊斯兰教根本不配被称作“现代的”，热衷于与其对话者在这方面所提出的支持性观点迂腐不堪：从其宣传分子使用卡式磁带到指出这些代理人是从“受过教育的”阶

层——比如说工程师——当中招募的。此外，这场运动的话语体系所反映的完全是瓦哈比教派的伊斯兰教，而这个教派拒绝接受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的碰撞在当时的时代所产生的任何成果，与此同时，它只是转向了伊本·太米叶的那些并无想象力的文字，而此人则是中世纪里最为反动的神学家。尽管他的一些使者称他的阐释是对“本源的回归”，但它们实际上只是指向了200年前流行一时的观念，那是发展已被延误了几个世纪的社会之中的观念。

不幸的是，往往有人会说，当代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是针对世俗主义遭到所谓滥用而做出反应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除了在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外，现代的伊斯兰社会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世俗化的社会，更不要说它们对任何无神论的积极进取的力量所进行的大胆创新充满恐惧了。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半现代国家仅仅是降服了宗教分子（就像过去的时代里经常发生的那样），把一些概念强加给他们，其目的完全在于使它们自己的政治选择合法化而已。世俗化想法的苗头只是存在于某些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圈子当中。这些世俗化的想法并没有对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执着于民族主义的事业之时，国家有时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由此造成了与华夫脱党1919年以来所采取的那些政策之间的脱节，这点可由事态甚至早在纳赛尔时代即开启的令人不安的演变来证明。而之所以迷失了方向，原因可能相当显而易见：既然这些政权拒绝了民主，它们就在所谓的均质化社会中找到了替代品，而其危害显然波及了当代西方世界本身的正在衰落的民主。

政治性伊斯兰教意图完善事态的演变——事态在这些国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它还力图恢复明显保守性的神权秩序，而这是一种

与马穆鲁克式的政治权力有关的秩序。这样的一种军事种姓制度曾经一直统治到了两个世纪以前，它将其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这是通过假装除了伊斯兰教教法以外其他什么法律都不知道来做到的），它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利润，它还同意在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扮演附庸的角色——出于对“现实主义”的考虑；无论何人，只要他们看到了这个地区后民族主义政权以及作为其孪生兄弟的新的所谓伊斯兰政权的衰落，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那种曾经存在过的军事种姓制度。

从这个根本的角度来看，政治性伊斯兰教所谓激进的运动与那些想要显得温和的运动之间并无区别，因为这两者的目标并无二致。

伊朗本身的例子并非立于这个普遍的规律之外，虽然出现了导致它取得成功的各种混乱的情况：伊斯兰运动的迅猛发展与针对国王的斗争同时发生，而国王从社会角度而言是反动的，从政治上来说又是亲美的。首先，神权统治阶级极其怪异的行为由于其反帝立场而得到了弥补，它从这种立场中获得了某种合法性，这呼应了它在伊朗国土之外极高的受欢迎程度。不过，这个政权逐渐显露出它无力应对创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戴着头巾的宗教分子从“戴帽子的人”（伊朗人对军人和技术官僚的称呼）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实行独裁统治，这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机器出现了重大的退化。曾经自豪地宣称“做得跟韩国一样好”的伊朗现在已经沦落到“第四世界”国家之列。统治阶层的右翼分子对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是导致其被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而取代其的则是自称的改革者，这些人的社会规划当然能够缓和神权独裁者的暴政，但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有放弃写入了宪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权力垄断的基础，因此，在逐步引诱之下，他们抛弃了反帝的立场，把自己融入了外围地带的资本主义这个庸常的买办世界之中。伊

朗的这个政治性伊斯兰教体系已然走入了死胡同。伊朗人民现在所陷入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有朝一日可能会令他们抛弃那些宪法原则本身，而正是这些原则将宗教分子集体置于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所有制度之上。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政治性伊斯兰教实际上不过是对于买办资本主义这种附庸地位的一种适应。其所谓的温和形式因此很可能是最大的危险，威胁到涉及其中的那些民族，这是因为“激进者”的暴力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使国家不稳定，从而令新的买办阶级得以掌权。三驾马车国家以其亲美外交不断支持找到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案”，这是完全符合其心愿的，即强加一种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秩序，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服务。

全球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治性的伊斯兰教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并无冲突；相反，它们彼此补充。正在为当前的时尚所普及的美国“社群主义”意识形态令良知和社会斗争黯然失色，而且导致它们被对此视而不见的所谓集体身份认同所取代。这种意识形态因此在资本主导战略中受到了完美的操纵，因为它将斗争从真实的社会矛盾领域转移到了想象当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据说是文化的、超越了历史的、绝对的，而政治性伊斯兰教恰恰就是一种社群主义。

在选择支持政治性伊斯兰教的时候，7国集团，尤其是其中的美国，是知道它们在做什么的。它们在阿富汗已经这么干过了：它们把伊斯兰分子描述为“自由斗士”(!)，在同“可怕的”共产主义独裁进行斗争，而后者实际上是种开明的、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专制，并且敢于为女孩开办学校。它们在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那些地方还在继续这么干着。它们知道，政治性伊斯兰教这支力量——对它们而言——有着这样的好处，那就是令相关各国的人民感到无助，由此不费吹灰之力确保它们的买办统治。

由于其固有的玩世不恭，美国的统治阶层知道如何对政治性伊斯

兰教进行反复利用。只要帝国主义者觉得实施残酷干预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对受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启发而出现的“偏离了方向的”政权——比如说塔利班，它实际上并非偏离了方向，而是有它自己的行事逻辑——加以利用。成了政治性伊斯兰教首要受害者的那些民族被称作“野蛮的”，这有可能会助长恐惧伊斯兰的情绪，进而推动人们接受“全球性的种族隔离”这样一种观念——这是日益两极化的资本主义扩张符合逻辑的而且必然的结果。

使用了伊斯兰教这个标签却被7国集团所断然谴责的唯一政治运动，是那些参与了反帝斗争的政治运动，它们——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地方层面以反帝作为其目标。它们受到7国集团的谴责绝非偶然。

参考文献

- Achcar, Gilbert (2010) *The Arabs and the Holocaust: The Arab - Israeli War of Narratives*, London, Saki Books.
- Amin, Samir (2005) "Vers une théologie islamique de la liberation", *La Pensée*, no. 342.
- Amin, Samir (2011) *Eurocentrism* (2nd edn), Oxford, Pambazuka Press.
- Sharaby, Hashem (1991) *Al Naqd Al Hadani*, Beirut, Markaz Dinasat al Wihda al Arabiya.

第四章

跃进：万隆时代与阿拉伯的 大众民族主义

现代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达到成熟，而这时的阿拉伯世界却从世界体系之巅跌入谷底。之后它变成了我所指的意义上的外围地带：完全融入了世界体系之中，却屈从于这个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些中心地带所提出的再生产要求，并对自身做出相应的调整。

为融入这种现代性并跃升为其活跃的参与者，受到各方尊重，同其他国家地位平等，为此而付出了认真努力的唯有 19 世纪前 2/3 时间里的埃及（从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到赫迪夫·伊斯梅尔政府）。除了英国咄咄逼人的敌意，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缺乏一个能够指导这场运动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其替代物则是领导者的开明独裁，它未能成功实现对马穆鲁克国的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们最终被动接受了其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附庸角色。埃及变成了为英国提供棉花的农场，由此为随后的殖民统治铺平了道路。“民族主义的”反对派没有能将自身从对过去的怀旧（这体现为复兴运动）当中解放出来，也没有破除对奥斯曼主义是其保护者的幻觉。政治生活由这个羸弱的政治阶级（民族民主党）和另一个愿意作为附庸的政治阶级（萨阿德·扎霍尔领导的乌玛党，它是华夫

脱党右翼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君主立宪党派的前身)所分享。

殖民统治的经济史所强调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些常规的标准。外围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农民大规模流离失所、工人受到极度剥削、自然资源遭到窃取——从记录中被系统清除。对变为棉花种植农场的埃及和改成葡萄园的阿尔及利亚的赞美，是这种罔顾事实的实例。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这些地方的人民最终起而反抗。这些起义——二战之后万隆时代风起云涌的反抗——将成为本章的主题。

在开始的时候，“阿拉伯国家的觉醒”（我们现在能对其做出如此的描述）是亚非两洲所有民族觉醒的组成部分，在二战之后新的均势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下，这些民族主动塑造现代的世界。阿拉伯世界在万隆时代居于显著的位置，这导致人们对其产生了过高的期望。

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说明“万隆蓝图”到底是什么。它的含义并不清楚，因为它从未发展到必要的程度，以至于认识到有必要与资本主义的那些根本原则彻底决裂，这对仅仅反对帝国主义是种超越。我还将证明纳赛尔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潜力是有限的。在其他著作当中，针对更为激进的实践，如在布迈丁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温和的”布尔吉巴主义者统治下的突尼斯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统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我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强调指出了它们对社会和意识形态传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加以抵制。在本章中，我将说明这场运动如何带来了可观的进步，同时也导致三个国家——也门、伊拉克和苏丹——它们曾是激进的阿拉伯世界的灯塔——以及阿富汗这个属于大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惨遭挫败。实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和伊朗有得有失，对此我曾其他地方进行过论述，这也说明了它们存在着类似的矛盾之处。正是所有这些“失败”为进一步迷失方向和助长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幻觉埋下了伏笔。

因此，本章以我认为应该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的那个问题作为结束，这就是民主问题。但此处重要的是不落人民幻觉的陷阱之中，这是因为这个概念由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个意识形态所提出，在帝国主义的攻势中得以推广。与此相反，我强调指出，阿拉伯各民族需要参与到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明之中，这是面对挑战的唯一反应。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在其他地方，这个客观需要是否有强势推出的真正机会。

万隆与斗争的首次全球化（1955～1980年）

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前几天，在二战结束时的波茨坦，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当中的统治阶级——美国——公开宣布了其霸权野心。由于它垄断了核权力，所以说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以美国当时的军事优势为基础。让欧洲和美国占领之下的日本唯其马首是瞻，这对美国来说不难做到。因此，虽然苏联在击溃纳粹这头怪兽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它遭到了孤立。然而美国要实施其战略，最大的阻碍事实上是亚非各族人民所成功掀起的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万隆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通过对这些斗争的支持，苏联和中国因此得以摆脱孤立，从而为建设一个多极体系（而非居于主导地位的冷战话语体系本想让人们相信的那种两极体系）铺平了道路，赋予南方各国人民应有的地位。

在1955年的万隆，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宣布，他们渴望重建以承认各国权利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而这些权利此前一直受到了压制。这种“发展权”是当时全球化的基础，在通过谈判达成的凌驾于帝国主义之上的多极框架之中行使，帝国主义则被迫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在开始之时，万隆的成功——而非其失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如此认

为——是南方人民在教育、医疗以及建设现代国家等领域的巨大跃进，因为它往往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并最终标志着这些国家跨入了工业时代。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评价那个时代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成就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民主方面的欠缺，因为各国的民粹主义政权是在“向它们的人民施舍”，但从不允许他们组织起来。

万隆体系与另外两个属于战后典型状态的体系密切相连，那就是苏联的制度以及西方社会民主制中的福利国家制度。各个体系之间当然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尽管轻易就被限制在可以管理的程度以内，仅限于局部性的武装冲突），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相互补充（每个体系的发展为其他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斗争的全球化是有意义的，另外，在全球所有地方，在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当中，斗争都在发生，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开启了这种演进的第一步。

这三个体系的发展潜力同时遭到了削弱，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反过来证明了这些斗争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为确保各自社会的稳定管理所达成的历史性妥协。苏联制度的垮台带来了社会民主制的解体，后一种制度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完全货真价实的社会进步——此前则是被强行推动的，因为这是抵御共产主义挑战的唯一办法。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的欧洲所引发的反响。

始于万隆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依靠南方人民的胜利得以实现。这些进步确实助长了一种幻觉，即南方国家正在“迎头赶上”，而实际上，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按照外围地区的发展要求进行了调整，但它对自己也进行了重构，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支配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与受支配国家之间那种旧的对比关系，也即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对比关系，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对

比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帝国主义中心的五大新垄断”（即对新技术、自然资源、资金流向、通信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优势的集中之上。

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一样，使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体系外围地带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它具有两极分化效应，这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以资产阶级潜力的根本性不平等为标志，资本主义得以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和外围发展。换言之，外围地带的资产阶级是否必然被迫屈从于这种不平等发展的各种要求？它是否因此就必然是买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条件下是否必然就是死路一条？抑或资产阶级有腾挪的空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要具体指明）可以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实现本国自主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而能够逐渐迎头赶上？这些限制在多大程度上会令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幻觉？

今天又怎样了？

1981年，万隆这一页终于在坎昆翻了过去，在这一年里，里根总统开始了其攻势，要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确立我所称的“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集体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主导权。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掉头，苏联则于1991年垮台，这些当然都是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向另一个时代转型的开始，而其形势现在依然并不明朗。

战后时期一开始，苏联就实行了日丹诺夫主义，以此对强加于它的孤立做出反应，这个主义以其自己的方式针对美国的立场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它将全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帝

国主义国家阵营。南方人民风起云涌般的反抗行为没有被考虑进来。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观点被斯大林本人强力确定了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正如在欧洲一样，所有地方的资产阶级都已经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意味着民族解放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指导，事实上即由共产党来指导，正如此前毛泽东在其1952年发表^①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宣称的那样，也正如此前的越战和东南亚的游击战所证实的那样。

事态随后稳定了下来，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演变。有迹象显示日丹诺夫主义正在遭到替代。万隆时代因而实行的是国家民粹主义的蓝图，它们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但它们依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

现在这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但南方统治阶级的“再度买办化”比20年前看起来的还要脆弱。而我们所提出的还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将南方国家和南方人民从死胡同中拉出来？新兴国家里的统治阶级公开促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之上的可再生项目——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即使他们是反霸权的，他们也要避免“反帝”这种表述。昨天提出的问题今天还要再问一遍：在这些人作为积极的伙伴知道如何应对，而且拒绝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进行单边调整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道路会允许他们迎头赶上吗？如果对这些项目的机会和矛盾展开分析，结果会显示这样的希望建立在多重幻觉之上。

激进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世界

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三个独特的阶段。

^① 原著如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应在1940年，此处似作者误写。——译者注

从1955年到1975年，纳赛尔统领的埃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还有布迈丁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是舞台上的主角，它们身处不结盟运动及其在非洲扩散的第一线。非洲解放运动的第一次会议1957年在开罗召开，这次会议促成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形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蓝图——不结盟运动的绝唱——1974年在阿尔及尔拟定。这些都并非偶然。

不过，虽然“阿拉伯革命”（我称之为国家民粹主义）积极的社会效应在短期内即烟消云散，但石油所带来的利润却取而代之，给人们造成一种轻轻松松即可实现现代化的幻觉。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懂的双关语（al fawra mahal al thawra，喷涌——意指石油——而不是革命）总结了这种追求的转变。与此同时，战略决策的重心从开罗移至利雅得。而这发生在人们开始意识到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之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实施后来成为对全球进行军事控制的计划，以此确保其出于自身利益而独家获得这种不可再生的能源。从1990年起，美国的武装干预变成了现实，这完全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阿拉伯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当时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阿拉伯各政权深陷于石油幻觉所催生的“开放”之中，失去了此前曾经一直享有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政治真空之中，政治性伊斯兰教填补了空白，自此占据了舞台的中央。“老的在死去，新的无法出生；在这样的断层期，各种病态现象应运而生。”（引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葛兰西）

这是一个巨大的逆转，如此急剧的失败，其原因值得认真研究。我认为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与复兴运动（始于19世纪的“复兴”）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有关，它们是马穆鲁克政权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得以继续的根源所在。另一个因素则源于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即三驾马车这种新型的集体帝国主义和美国的领导地位。

一个实例：纳赛尔主义的局限性

1956年英、法、比三国的侵略行动失败之后，1957年是埃及重大变化的一年。此前主导着埃及工业和现代经济部门的三国资本遭到了扣押。接下来做什么？由自由军官组成的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他们当中一些人希望实现“埃及化”，即无论是否给予真正的补偿，都将这笔财产变为埃及的私人资本，而在实际上，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尤其是与埃及集团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勾结而非彼此竞争。另一些人则想要对其实行国有化，从而形成一个公共部门，由于其体量庞大，它能着手计划经济的加速发展。纳赛尔倾向于第二个选择，在对第一个选择做出了一些正式的让步之后，即同意埃及的私人资本在多个边缘性领域参与这个新的国有部门，第二个选择得以敲定。

但如何管理这些国有企业及谋划其发展？危险在于这些责任会被交到政治掮客——其中主要是官员——的手上，这些人形式上隶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如此一来，非但管理无效，控制权也被分散了。最终，一家国有控股公司（名为 Mouassassa Iqtisadia）于1957年组建，由它来挑选国有企业的管理者。

由于我曾在这个机构中任职，所以我曾密切关注这个新的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及其董事会的讨论和决策。因此，对于这个“新的阶级”如何构成；这些绅士们（他们之中鲜有女性）当中许多人的私人利益如何影响了太多的决策；工人代表们（纳赛尔主义的一项创新，从理论上来说非常好）如何被边缘化、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或者被收买，我有第一手的体会。

此外，埃及的国家官僚机构一直目光短浅，受到各种矛盾冲突的掣肘。较高贵的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在其他那些比较平庸的人

当中，则存在个人之间和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总的来说有四个决策中心——上面提到的国有控股公司，还有计划部、中央银行所依托的财政部以及工业银行，那里的争议超出了如何指导这个国家实现发展的范畴。国有控股公司不可能对公共部门开展日常性的管理，因此有必要对其发展进行谋划。但这难道不是新的计划部所应承担的任务吗？它不承担此项任务。它的技术性官僚所受的是增长模型方面的训练。我原则上当然并不反对使用模型。它们对于检验部门性和区域性政策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很有必要。但必须是在计划目标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已经被决定下来之后再去建立模型，而不是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技术官僚们往往认为，模型可以具有超政治、超社会的合理性，能使他们做出各种选择，因此他们就能逃脱政治责任。还有一个事实则是国有控股公司控制之下的公共部门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才能得到发展。这里我们所遇到的障碍是财政部与工业银行之间的观点相左。

财政部是一个与埃及本身同样古老的机构，它的习惯几乎不可能改变。财政一直在为农业灌溉提供融资，自19世纪起，它还投入资金修建铁路。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几乎导致许多大地主破产的危机，在这之后，财政部从各家银行手中接管了这些人所欠下的土地承包信贷。最后，自二战以来，农业信贷（向小块土地持有者提供的贷款）还有分散各处的一定数量的融资办事处，对补偿资金进行着管理，这是一笔为减少通胀所造成的危害而特别设立的资金。在所有这些领域，要改变财政部的老习惯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领域由不同的部门所管理，而这些部门之间并无交流，这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许多荒唐的现象。不仅如此，财政部从来都不曾想到要为工业部门提供融资，而事有凑巧，后者也从来没有要求这样去做。它满足于通过保护性关税和发放公开招标来保障自己的赢利，而这强化了企业的垄断地位。

中央银行的职能随即被此前刚刚国有化的国民银行所取代，后者极度保守，这是它的本性。它的责任是确保货币稳定，这一点它做得很好，但这是它仅有的职责。剩下的只有工业银行，它由政府创办，原则上受新成立的工业部（独立于财政部）控制。工业部是最后的决策者，这里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腐败行为、不是非常称职、迂腐而固执己见，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帮派”（在埃及语中为 shilal，那些知道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是怎么进行管理的人都熟知这个词）掌控了一切。正是他们“计划”着现实，而事实上则是一片混乱，与“计划”这个概念本身背道而行。

我之所以在此复述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原因在于我注意到研究这个时期的那些书籍没有提到它们。相反，这些书籍对纳赛尔时代的计划进行了抽象而笼统的阐述，似乎针对计划的那些公开声明和文本已经得到了合理实施。似乎计划的“失败”源于其理论原则！我的著述《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以哈桑·利亚德的笔名随后（于1963年）发表，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都是我在那个时期所收集的资料。

悲剧性挫折之后的革命性进步

这个部分考察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和地方反动势力之间的勾结；革命力量的理论错误和实践缺陷；还有就是民主问题——什么样的民主能够“为人民服务”？

巨大挫折之后取得进步的例子不胜枚举。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当中满是这样的事例。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中三次伟大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几个其他国家（海地和墨西哥）的历史。其他地方（古巴和越南）也有出现类似挫折的可能性。不那么耀眼却真实的进步是万隆时代（1955~1980年）亚非各国人民历史

的标志。这些地方随后全都遭遇了挫折，买办阶级的特权重新确立，为帝国主义的独裁服务。

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和苏丹

20 世纪的后半期见证了世界上所有社会前所未有的转型。但亚非各国摆脱了黑暗的殖民统治才是最为深刻的转型，因为它们被迫对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逻辑质疑。1492 年的那一页被翻了过去，而未来所面临的全球化则不同于 500 年前开启的那场由西方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

尽管如此，万隆时代波涛汹涌的大潮还是退去了。在我最近的著述《南方的觉醒》当中，对于这个时期所取得的进步和后来出现倒退的原因，尤其亚非两个大洲上最为激进的那些经历，进行了一些分析。我推荐读者们阅读这本书。

我想提出四个近期的案例以供讨论，它们分别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南也门。非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读者对它们知之甚少。读者们可以另外阅读一些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著作，以此作为对于此处的概述的补充。从宗教和种族的角度而言，这四个社会相比较其他社会不那么均质化。但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均质化往往是现代化的结果。这并不表示——且远非如此——一国之中的各个成分之间存在自然而然的敌意，无论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敌意，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敌意（存在于伊拉克），操波斯语者与操土耳其语者之间的敌意（存在于阿富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敌意（存在于苏丹），还是遭受“封建”割据者彼此之间的敌意（存在于南也门）。

尽管如此，此种异质化看来似乎有利于这种革命性的反应，因为

它使得地方势力相对弱势，那些陈旧的“独立的”势力如是，由于现代化而屈从于帝国主义力量保护的那些势力也是如此。在危机来临的时刻，这种弱势导致基于此种异质性而划分的各个阵营之间彼此分道扬镳，而与现有势力展开斗争的人民则普遍渴望统一，对这种革命性的力量可以加以利用。

站在帝国主义全球利益的角度，这四个国家很重要，很难放弃对它们的控制：阿富汗曾是与苏联进行对抗的前沿阵地，现在又是帝国主义正试图针对俄罗斯而建立的中亚基地的前线；伊拉克的地下蕴藏着部分世界上最优质的石油；南也门控制着红海的入口（石油运输线路）；控制苏丹则出于控制埃及的考虑（对昨天的英国而言），这个国家石油和铀矿的储量也很大（对当今而言）。

在这四个国家里，人数处于劣势的“现代”社会与显得传统的人民大众之间存在对立，前者因此尤其为激进的方案所吸引，推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在下层人民的支持之下，实现“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共产主义政党取得的可观成功

在阿富汗，可被称为“封建的”君主掌管着（几乎无法做到）几块边界模糊不清的区域，这些区域受各自地方上的主人所统治。这个国家曾经长期试图抵抗英国侵略，后者的考虑是切断俄国人前往印度洋的通道，这之后是阻止苏联人在突厥斯坦的活动，这段长期抵抗入侵的历史令阿富汗无法获得迎接社会转型挑战所需的均质性和力量。毫不奇怪的是，由于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深谙失败的原因所在，所以他们几乎一致深信（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应对这个挑战。

伊拉克的“逊尼派”王室由英国人引入，除了放弃真正的独

立，它无力维持自己的存在。伊拉克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得以赢得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民心，受到所有知识阶层的欢迎，当然尤其是学生，但也包括城市新兴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专业人士、军官等）。

在南也门，英国人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从而强化了服从于它的伪封建的割据。它对地方势力分而治之，划分了多个领地（由族长或自称族长者统领）、苏丹国和酋长国（仅剩一个小镇和三个村庄），对亚丁港则保留了直接的殖民管理。共产主义运动（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统一了起来）没费吹灰之力，即将现代社会的所有部门（码头工人、学生、城市中产阶级）号召在“废除英国人建立的制度，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苏丹的共产主义政党成功赢得了这个国家现代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工会（始于铁路工人工会），虽然在社会中有明显的人数劣势，但它们代表着一股重要的力量，这并非由于其自身强大，而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组织中捍卫了工人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大众的民主权利，从而为全体人民发挥了作用；这个地区通过发展灌溉农业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农民，他们已经被更加直接地纳入了资本主义之中；与男权压迫进行着斗争的女权组织；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学生；党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专业人员；甚至还有不少军队里的军官。

这四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成功取得了可观的革命性进步：在阿富汗和也门，它们战胜了政府势力，而在伊拉克和苏丹，它们也离此不远。

阿富汗的共产党（事实上是旗帜党和人民党两个政党合二为一）并非通过莫斯科所策划的军事政变（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政变的模式）而掌权，虽然很不幸的是西方舆论普遍如此认为。它从王室手中夺取了其日渐衰落的权力，而“侵入”王宫的那几个共产党

员军官并没有建立独裁政权，而是为共产党行使权力铺平了道路。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与此并无关系；它对王室在国际政治中所持的中立立场感到相当高兴。但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预见到了美国的（军事）入侵不可避免，面对着这样的威胁，它觉得有必要获得苏联的支持。另一部分则觉得这种支持不会增强本国成功抵御帝国主义的能力，反而还会有让这件事变得复杂化的风险。

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共和国时期，阿富汗经历了其当代史上最好的时刻。这是一个日渐现代化的开明专制政权，既向男童也向女童开放教育，对愚民政策也持有敌意，因此它得到了社会的决定性支持。它所开展的“农业改革”主要是一系列旨在削弱部落首领残暴权力的措施。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至少是默默的支持——保证了这场起步很好的变化取得成功的极大可能性。西方媒体和政治性伊斯兰教所进行的宣传将这次的变化抹黑为“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集权主义”，这为阿富汗人民所否认。事实上，与阿塔图尔克时代的阿塔图尔克政权一样，这个政权并非不受欢迎。

这个政权的推动者自称隶属于共产党两大组成部分（人民党和旗帜党）的共产主义者，这根本不会让人吃惊。英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一些阿富汗的邻国实行帝国主义管理，由此造成了持久的社会灾难，而与阿富汗相邻的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实行的模式所带来的却是巨大的进步（尽管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尽管这个体系有很多独裁的做法）。两相比较，令这个地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爱国者明白，帝国主义对他们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设置了重重障碍。阿富汗共产党的某些派系邀请苏联帮助其剪除另外一些派系，这个做法当然造成了消极影响，因为它阻碍了这项大众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事业。

南也门的共产党（正式的称呼是“社会主义党”）由五个共产主

义团体所组成，它们的来源各异，但它们意识到必须联合在一起（同时保持各自的身份）。英国决定让自己的部分殖民地（亚丁、各酋长国和停战海岸）获得虚假的独立，所以它制订了一份计划，以保证权力“和平”移交给封建实体（酋长国等），而后者的权力在殖民统治期间已经得到了加强。

伦敦的计划在海湾地区沿岸得到了完美执行，由此产生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也门的社会主义党拒绝参与这个把戏，它成功地将社会当中所有最为活跃的因素动员在自己的旗帜周围：真正的独立、废除自称是“传统的”政治压迫制度以及社会公正。它的激进政策取得了效果：它所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进入了亚丁，然后是这个国家所有执行行政中心职能的城镇。它甚至挫败了受纳赛尔和北也门政权支持的敌对势力。之后的进步同样无可置疑，尤其是解放了妇女和击溃了蒙昧，为以现代的、民主的方式阐释宗教和建立世俗的国家铺平了道路。它受到了广泛欢迎，这也完全毋庸置疑。

伊拉克王室 1958 年的倒台同样不是“军事政变”的结果。一群军官（包括共产主义者，但也有进步的民族主义者）的干预只是为人民大众浩大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共产党则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与其他阿拉伯和库尔德组织进行了合作，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缺席了这场斗争。执掌这个政权的卡塞姆因此受到的是这样一个政治联盟的支持，这个政治联盟吸纳了共产党、进步的库尔德人和民族主义者（独立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后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一直存在而且颇为激烈。以致在某个时刻，在身为共产党员或其同情者的部分军官的支持之下，共产党觉得能让天平倒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但它没能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当地的反动势力（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纳赛尔主义者和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的

各种干预。

苏丹共产党在“现代”公民社会（工人、来自杰济拉的农民、学生、女性、专家和军队）中的力量非常强大，这是阿保德将军（在英国的支持下）的独裁统治被推翻的原因所在，它不是被“军事反政变”所推翻的，而是被规模庞大的民众运动（军官们进而拒绝镇压他们）所推翻的。这之后是长期的斗争，传统的蒙昧主义的政党委身于殖民权力（安萨尔和阿希加），在穆斯林兄弟会以及纳赛尔的埃及和利比亚的卡扎菲的外交人员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下，它们在斗争中被动员了起来。这个反动的蒙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团（在反帝方面被认为无所作为）而不是这个国家最为民主的力量得到了西方舆论的支持。

这个反动集团的“胜利”始终有限而且脆弱，而共产党则每次都成功站了起来并击退其对手。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并没有试图发动军事政变（这本会致其性命）。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外交人员、穆斯林兄弟会、美国及英国所组成的反动联盟的支持下，一场军事政变把尼迈里将军送上了台。正是他们（共产党军官及其同情者、进步的民族主义者）毫不费力就孤立（并逮捕）了尼迈里。此次成功之后，共产党的地位得以巩固，回归民主的平民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出现。但第三次军事反政变（这次是在外国势力以及卡扎菲的直接干预之下）毁掉了这样的民主前景。而自那以来……

上述四个国家革命性进步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原因当然具有特殊性，但其他一些原因则或多或少是共同的。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英国以及作为其帮凶的欧洲盟国故意破坏这些进步，它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暴力，其中包括军事干预，这些军事干预或者付诸实施（在阿富汗以及后来在伊拉克就是如此），或者表现为实实在在的威胁。

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将所有可能的和可想象的蒙昧

力量动员了起来，为其提供资金和军事装备。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不得不说的是，他们还得益于埃及和利比亚国家民族主义政权的善意中立（有时则是共谋）。

第二个原因源于实在难以将“中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结合到支持革命性进步的民主集团之中。在当权者残暴措施（禁止各种组织活动、大规模的逮捕和酷刑）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等方面非常系统地采用了各种手段，阻止共产党接触广大的人民群众。

至于第三个原因，则在于各种政党以及它们对于“综述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分析存在“理论上的”弱点。

俄国革命在东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的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列，苏联1990年^①垮台之前，它们在口头上始终忠于这个阵营。苏联的垮台令它们措手不及，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这个制度的本质及其问题。在它们看来，苏联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胜利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欢迎的新阶段。它们对苏联社会严重的危机视而不见，而这些危机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它们随后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幸的选择仅仅是个错误而已，如果说不是背叛的话。

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对苏联共产党的马列属性深信不疑，所以它们总是在口头上附和着苏联外交界所捍卫的那些立场，而苏联的外交界本身也对这些战略性国家的事态发展十分留意。我说“口头上”是因为这些政党——它们的许多干部和领导——实际上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判断，对莫斯科强加的干预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比如说，莫斯科曾要求这些政党就地解散并加入当权的民族主义政党（纳赛尔派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称它们所走的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所有这些因素，再结合其他一些原因，就解释了挫折为何出现。

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说其“无用”已经是最给面子的了——被帝国主义势力加以利用，它们以此发动了中东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如果没有这些干预，阿富汗的进步力量本有可能遏制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由所有那些被西方媒体称为“自由斗士”的蒙昧分子所构成的势力。

南也门的共产党 1991 年接受与北也门的统一，这对它来说真是自杀行为。如何解释这个难以置信的决定？也门当然成了一个国家，其人民也真正渴望打破由于英国对其南部海岸实行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南北分立。但南北也门之间的关系与东西德之间的关系并不类似。它完全是反了过来的东西德之间的关系。甚至在“革命”赶跑了伊玛目并以受到卡扎菲的胡言乱语（在进步性的成就方面，他的权力与这套话语的信誉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启发的民粹主义取而代之之后，北方（落后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南方也没有吸引力。这可由以下事实证明：“统一”刚一宣布，南方人民即起而反抗，他们认为自己“被自己政党的领导人蒙骗了”。为了强制推行统一，野蛮的军事镇压成了必要的手段。这只是部分的解释，另外的原因则在于共产党的有些（但非全部）领导人在苏联垮台后感到绝望，他们想要投奔那些他们觉得最终必然获胜的阵营。他们当中有些人害怕（在这点上他们没有错）西方会对他们的国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可能会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实施军事干预。

伊拉克的权力关系不会得到逆转，除非由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实行血腥独裁，再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进行专制统治，并得到穆斯林兄弟会、海湾地区那些独裁的亲帝国主义的政权甚至是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无条件的支持。纳赛尔难道不是英国 1961 年编造的、随后又得到了埃及支持的科威特独立之“父”吗？萨达姆·侯赛因掌

权的道路随即得以开启。

在苏丹，推翻尼迈里反革命政权的努力遭遇了失败，这为结合了军方独裁与“伊斯兰分子”独裁的政权上台开辟了道路。然而尽管这类政权极其残暴，社会中的“现代”部分还是形成了一个抵抗阵线（但自那以来其被动超过了主动），不过它为西方的“民主之友”所忽略。南方无休无止的战争、国家的分裂（东部各省、西部的达尔富尔）是苏丹人民为其革命性进步遭到扼杀所付出的代价。西方大国出于诸如“人道”等原因进行了干预，但这并不能弥补它们在深度参与对苏丹民主的扼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更不用说这些干预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石油和铀矿）动机了。

黎巴嫩遭到侵略

2006年7月11日，以色列悍然入侵黎巴嫩，这是华盛顿针对这个地区所制订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计划已然在实施之中：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伊拉克和阿富汗已被占领并遭摧毁，而在侵入黎巴嫩之后，叙利亚和伊朗也已经受到了公开的威胁。但这项计划的失败同样显而易见：黎巴嫩人民起而保护他们的士兵，这显示了他们的团结，也由此揭露了特拉维夫、华盛顿和欧洲的企图。南黎巴嫩民众的武装抵抗既然已经证明十分有效，美国和欧洲现在只好全力以赴推动裁军，好让以色列在新一轮的侵略中轻易即可获胜。

伊朗受到威胁

在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的阵营里，在“外国观察家”的口中，“伊斯兰革命”被反复提及。但它是否会迎来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

将会扩散至整个地区乃至整个的“伊斯兰世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为乌玛（它的意思是“国家”，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的成立再次做好了心理准备？抑或它只是个例外，尤其局限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阐释与伊朗民族主义的表达这两者之间的结合？

对于在这个背景下什么让我们感兴趣，我在此仅仅提出两点看法。第一点是伊朗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政权由于其性质（这个政权所遵循的原则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措施并无矛盾之处），并不会反对这个国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第二点是伊朗这个国家本身是个“强国”，也就是说，其主要构成部分，其民众阶层和统治阶级（即使并非全部）并不接受自己的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伊朗现实的这两个层面之间确实存在冲突，但第二点考虑了德黑兰外交政策的倾向性，这证明了它有抵抗外国对其发号施令的意愿。

确实，正是伊朗的民族主义——它非常强大，在我看来，它也绝对积极——解释了其科学、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原因，而且各届政权都在从事现代化建设。伊朗是南方国家中少有的一个可能会有全国性资产阶级计划的国家。这个计划长期而言是否可能成功（我认为是可能的）则不是我们此处所讨论的话题。

正是因为伊朗具有关键性的地位以及它有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到尊重的合作伙伴，美国才决定通过一场新的“预防性战争”来摧毁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冲突围绕着伊朗正在开发的核能力展开。这个国家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有权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帝国主义大国及其以色列玩偶有什么权力夸耀它们已经垄断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能够相信“民主国家”永远不会像“流氓国家”那样使用核力量这样的话吗？我们知道，这些“民主的”国家制造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那些屠杀，其中包括对犹太人的屠杀，而美国也

已经使用过核弹，而且它直到今天还在拒绝绝对及普遍禁止使用核武器。不幸的是，在华盛顿计划侵犯伊朗这件事上，欧洲各国现在与美国结成了联盟。

让我就新的进步的推动者（主要是在拉美）发表一些有用的看法。

我认为，尽管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代议制民主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推动了一些政府的建立，它们致力于进步性的社会变革，但历史表明这个过程将很快以陷入僵局告终。

我们有必要超越万隆时代的那个模式。在那个时候，各个政权从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脱颖而出，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拥有合法性且广受欢迎。总的来说，它们是“民粹主义”的政权，这点可以从国家（往往与其具有领袖魅力的英雄人物混为一谈）和政党（某些政党的顶层是人为捏造出来的，而且尽管各个政党是解放斗争中大众动员的产物，但它们的行为从来都不是非常民主的）的各种做法与“人民”（各个经过确认的民众阶层，“人民”是对它们所形成的联盟的一种含义模糊的替代说法）之间的关系当中看出。维持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提及。它由零打碎敲之物拼凑而成，结合了很大程度上属于编造出来的而且基本以“进步的”面目呈现出来的过去（所通过的形式是宣称古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是民主的，还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宗教阐释），以及创建国家的那些民族主义者们所捏造的神话，还有出于技术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不加鉴别的实用主义。万隆时代各个政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始终极其模糊，难以将其与民粹主义的、进行再分配的国家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这样的身份区分开来。我们是否应该指出拉美各国最近的进步当中存在着许多与此相同的特点，而由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没有机会了解万隆的教训，所以他们面临着重

复其局限性的危险？

针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认识。我很谨慎地不将“社会主义建设”仅仅等同于一项甚至是尽可能最大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功。我称这样的事业是民族的、大众的、民主的，为向社会主义的漫长、世俗过渡开启了道路（但也仅限于此）。我避免使用“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这个简单的说法，而是倾向于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

对“民主”的反思应当集中在从这些悲剧性的历史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上。

民主化是个过程，不能将其仅仅等同于一个静态的、明确的公式，比如说人们通常所倡导的当代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多党制、选举和人权）。它关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不完全只是管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它涉及人与人在家庭之中、在工作场所的所有关系，以及它们与经济、行政和政治决策者的关系。这些关系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性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当代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民主意味着将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它还涉及以法定权利的形式承认和明确个人的权利，从制度上保障这些权利受到真正的尊重。从所有形式的压迫当中获得个人自由和人类解放与人民行使权力密不可分。如果一个社会不将个人的权利与工人的以及人民的集体组织的权利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进步的社会。

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把“民主”与“市场自由”（也就是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这两者彼此不可分割：没有市场就没有民主，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表述，是一种庸俗的、消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述，言下之意是民主这个概念仅仅等同于被肢解了的美国模式的那种民主。

历史证明这个观点并不成立。民主的进步确实来自民众的斗争，它与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事实上，对于作为世界体系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而言，其历史同样表明，甚至这种遭到肢解的民主也是例外而非一般性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代议制民主的进步始终都是民众斗争的结果，受到了权力持有者（所有者）尽可能长时间的抵制。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层面——这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真正空间——来看，把（遭到肢解的）民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就更加显得没有充分的道理可言。在那些被纳入了真正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带，为了资本积累得以进行，民主从来都没有——或者几乎从来都没有——被列入议事清单的可行事项当中，甚至也不在希望实行的事项之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说中心地带民主的进步虽然的确是民众阶层斗争的结果，但它至少为这些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所极大推动。马克思曾指望普选会带来积极的效果：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历史让他的希望落空，原因在于实行普选的是这样的一些社会，它们由于推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给它们带来了真正的优势，因此已经变得腐败不堪。

为实现社会主义和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大众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和斗争，这是真正在民主领域取得突破的源头，它开启了将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演进——超越资本主义、其意识形态以及其代议制和程序性民主的有限做法——开始得很早，始于法国大革命。在其后的革命中，在巴黎公社、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若干场革命（墨西哥、古巴和越南的革命）当中，它表现得更加成熟和激进。

俄国在革命后实行了伟大的改革，为可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改革和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这个国家后来偏离了正

轨。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提出了“大众民主”（与东欧的“大众民主”毫无关系）原则、推动了真正的社会和民主进步的中国革命，开创了朝着民主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新阶段。

废除私人土地所有权和保障人人平等获得土地使用权是个重大的进步。实行人民公社，集体管理农业生产、小型相关工业和公共部门（学校、诊所等），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逐渐实现社会生活所有这些方面的民主化管理。

中国的民主过程存在其局限性和矛盾之处，后来又遭到了放弃，这背后的原因众多，刘春（2006年）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其中包括不利于三个必要（国家独立、生产力发展以及推动平等和社会主义这些价值观的形成）的推进，从而显现长期过渡的那些客观矛盾，也包括——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对于个人的正式法律保障的缺乏以及权力制度化的不精确。“群众路线”推动民众阶层发出他们的呼吁、赋予他们这样做的手段，也防止党脱离群众成为自诩的先锋队，“教导”人民什么是真理而自己垄断了真理，没有必要向人民“学习”——所有这些都源自民主事业的根本逻辑。这种原则与来自运动之外的论调完全相反。不过，群众路线不能替代权利和组织机构的制度化。

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是民主之敌。“市场决定一切，议会（在有议会的地方）什么都决定不了。”人民因此面临着被（半种族、半宗教的）身份幻觉所吸引的风险，这就其本质而言是反民主的，人民因而深陷于困局之中。

在此处我所提到的国家里，共产党的本质远非“反民主”（西方的宣传反复称其为“极权”），相反，它构成了各自社会中最民主的力量，虽然它们的民主实践有其局限性。

苏丹是个悲剧性的例子，体现了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多党制的、

选举式的民主与另一方面亟须服务于社会进步的真正民主之间的矛盾。在苏丹这个依恋自由选举的国家的当代史上，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在人民的支持之下）有几次（在军事和伊斯兰教独裁建立起来之前）受到了经过（正当）选举上台的议会的挑战，议会则为传统政党所把持，这些政党既是民主（在必要时）也是社会进步（始终如此）之敌。

那么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像阿富汗那样由党实行“开明专制”？有些人会说这是自相矛盾：专制总是反民主的，而启蒙运动则始终是民主的。这是教条式的简单化思维，在“民主的长期完善和深化”、在有必要不断发明新型（包括制度方面的形式）民主从而超越西方形式的代议制和选举式民主的检验面前站不住脚。

那么有什么其他办法吗？一党制？还是由各种力量——它们真正自治（并非“传声筒”）但也致力于参与真正共同实现长期过渡战略——组成一个阵线？此处所讨论的这几个国家的政党从来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别的地方也很普遍的官僚作风这个意义上（它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还是在系统形成其他办法的意义上。这个弱点源自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综述性的阐释。

“民主”——什么样的民主？

大西洋联盟的神来之笔是选择“民主”这个战场展开其攻势，而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让苏联解体以及再次征服东欧各国。这个决定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做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建立的过程中逐步成形，随后1975年在赫尔辛基最终确定了下来。雅克·安德里尼（2005年）在其书名颇具暗示性（《陷阱：赫尔辛基与共产主义的垮台》）的著作中表明，苏联人曾指望就解散北约和

实现真正的和解达成协议，但他们完全被西方的对手耍了。称这是神来之笔的原因在于民主问题是个真正的问题，而且苏维埃政权至少可以说确实并不民主，无论我们怎样定义民主这个概念及其实践。与之相反，大西洋联盟各国则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主的”，虽然它们的政治实践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与屈从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这两个体系相比较，后者显然胜出。

民主这套话语体系逐渐取代了苏联人及其盟友所持有的话语体系，那就是“和平共处”，后者与“尊重”各自的政治实践以及“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有关。

共处这套话语体系曾经有过强劲的风头。事实上，对东西双方的强权大国来说，这个战略都是不错的选择，或者在某些场合下可能不是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这个战略将东西方各国所各自宣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它避开了涉及这两套制度各自确切实质的所有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它既回避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回避了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探讨。联合国（在东西方两个世界里的某些大国的默许之下）以“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或者调皮地称之为“受到管理的经济”）代替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在某些时刻，这两种描述让有些人得以强调“两个体系的殊途同归”——本身由现代技术所要求的殊途同归（这个论调——也是错误的——建立在对历史的机械的、一元论的认识之上）——并赋予共处在推动这种“自然而然的”殊途同归方面以应有的地位。不过，冷战时期的情况则相反，那时所强调的是（与市场经济相连的）“民主”模式与（受到管理的经济所产生的）“极权主义”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

决定将战斗围绕着“民主”展开让某些人得以谈论两个制度之

间的“不可调和”，这给身处东方和南方的国家指出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屈膝投降，回归资本主义（“市场”），然后这会——自然而然——产生民主化的条件。情况并非如此（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而言），或者仅在极端怪诞的形式上如此（对东欧零散的种族政权而言），不过持有这种论调者对此根本不关心。

大西洋联盟各国推行“民主”这套话语体系实际上是近期的事情。北约完美地适应了萨拉查、土耳其的那些将军们和希腊的那些上校们。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国家的外交官还为拉美、非洲和亚洲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独裁者们提供了支持（而且往往是把他们扶上了独裁者之位）。

刚开始采用“民主”这套新的话语体系的时候，那些人显然不愿多谈。大西洋联盟中许多大佬级的政治领导人物认为这套话语体系很不方便，会掣肘他们所钟爱的实用政治。美国要有卡特这个总统（而不是今天的奥巴马）才能理解民主这套道德说教的用处。法国要有密特朗才能打破高卢人拒绝冷战所强加的、美国所鼓吹的“脱离”欧洲的传统。苏联要有戈尔巴乔夫才看不到支持这套话语体系除了注定带来灾难之外将会一无所得。

“民主”这套新的话语体系因此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它看上去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欧洲的“左派”在舆论上对它表示支持。不仅是选举意义上的左派（社会党），从其源头来说是更为激进的左派，即各国共产党脱胎于此的左派，其舆论也支持这套话语体系。伴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到来，共识之路得以开启，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帝国主义三驾马车国家里的统治阶级从这场胜利当中有所领悟，因而决定继续采取集中火力猛攻“民主问题”的战略。中国没有因为对外开放而受到指责，但该国是由共产党一党执政，在这点上它备

受责难。古巴的社会进步令人瞩目，在整个拉美地区独一无二，对此无人加以注意，但对它的一党制却有着无尽的斥责。对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采用的也是同一套话语体系。

这个战略的目的真是想要看到民主大获全胜吗？只有天真到家的人才这么以为。实际上它唯一的目的是把市场经济强加到不服管教的国家的头上，迫使它们对外开放并融入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体系当中，而它事实上是个帝国主义的体系，在它的压制之下，这些国家沦为任凭摆布的外围地带。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将成为受害国民主进步的阻碍，而绝不会是在“民主问题”上取得进展。

对于至少在开始时实行了实际存在着的那些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而言，如果它们让社会力量的辩证法自行其是，从而开启这样一种前景，即为达到“隧道的终点”而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各种局限性（由于至少部分支持向自由主义经济开放其市场，所以发生了更进一步的畸变），那么即使不是马上，就中期而言它们在民主问题上取得进步的可能性原本也会大很多。

此外，“民主”这个话题所针对的只是不愿向自由主义全球化开放市场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即使它们以极其专制的方式管理其事务，受到关注的程度也不会太高。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但也还有（亲大西洋联盟的）格鲁吉亚和其他许多国家。大西洋联盟所提出的民主公式往最好里说也很难超越多党选举这样的表面文章，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完全不相干，但它几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退步，这是实际存在着资本主义（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处于支配性地位所要求以及所产生出来的社会退步。这个公式令民主的声誉大打折扣，困惑不解的人们因此放弃了民主，转而投入了落后的宗教幻觉和种族幻觉的怀抱。正因如此，就更有必要强化对激进左派的批判（我强调的是激进的左派，以此将它与困惑不解的、不了解情况的

左派区别开来)，这样的一种批判将社会的民主化（而不仅仅是政治管理方面的民主化实践）与社会进步（从社会主义的视角而言）联系起来而非割裂开来。在这种批判当中，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两者不可分割。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但没有社会主义的视角也同样不会有民主的进步。

参考文献

- Amin, Samir (writing as Hassan Riad) (1963)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Edit de Minuit.
- Amin, Samir (2008) *L'Éveil du Sud*, Paris, Le Temps des Cerises.
- Andréani, Jacques (2005) *Le Piège, Helsinki et la chute du communisme*, Paris, Odèle Jacob.
- Canfora, Luciano (2006) *La Démocratie, histoire d'une idéologie*, Paris, Seuil.
- Lin Chun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第五章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事业迷失于 “再度买办化”

阿拉伯世界的迷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再度买办化”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攻势再加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跃进可以预见的失去其后劲的结果。

当代的中东在新的世界体系中不再扮演“枢纽”的角色，甚至不再扮演其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之前的殖民体系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个地区（阿拉伯及其以外的地方）所被赋予的主要角色是石油的重要供应者。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它为中产阶级进行消费提供市场，而最主要的则是它进口（毫无用处的）武器（尤其是海湾国家，它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武器装备）。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海湾国家对其财政盈余如何进行投资：这个受美国控制的金融市场对垄断资本开展资本运作颇为有用。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毕竟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使这个地方成为华盛顿计划当中从军事上控制全球的首要战略基地。

我在此处将分析这个军事计划的部署情况，以其无足轻重的补充规划即“欧洲—地中海”计划作为结束。然后我将描述当权的买办阶级（或者扯起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大旗，意在当权的买办阶级者）

以及一直以来对其进行挑战的“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反应”。这些反应当然完全无效，这点可以从它们在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团结问题上的失败当中看出来。在这之后，我将更为具体地分析现在正处于舞台正前方的那些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些冲突，还有就是显然正在加强的社会斗争。

我所特意选取的例子——埃及的农业问题和农民运动——说明了这种分析方法优于世界银行常规经济分析所得出的并不明显的结论以及随后所引发的骚乱。关于未来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我的结论得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支持，这些批判分析包括一份标注日期为2010年6月、题为《摩洛哥有经济战略吗？》的文件。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这场斗争会被政治性伊斯兰教所“窃取”吗，还是它能做到将自己从这种受世界体系的主脑们所操控的逆潮流而动的幻觉当中解放出来？这场斗争是否会成功围绕着一个积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蓝图展开——这个蓝图指示的是一条真正的替代之路，令阿拉伯人民可以投入“南方的觉醒”的第二个阶段？

这些问题显然绝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世界。南方的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形势下，没有一个阿拉伯或大中东地区的国家能够实现“崛起”。不过，如果这场社会斗争继续不受政治性伊斯兰教的控制，而是与更具决定性的民主斗争紧紧相连，那么崛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事情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们最终的成功随后会为“崛起”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至少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们的两个大邻国土耳其和伊朗）是无可争议的候选国家。

美国部署军事项目

中东，现在再加上其向高加索和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延伸，在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中，尤其对于美国的霸权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它的石油财富、它处于旧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现在是世界体系的“软肋”。

获取相对便宜的石油对居于主导地位的三驾马车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而确保获得石油的最好办法当然是确保对这个地区的政治控制。但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它处于旧世界的中心，同巴黎、北京、新加坡和约翰内斯堡的距离相等。二战之后，这个位于苏联南翼的地区因此在军事围困苏联这个大国的战略中受宠。苏联这个对手虽然后来垮台了，但这个地区并未因此失去其重要性：由于在这里保持了其存在，美国既可以迫使欧洲对其效忠——因为后者对能源供给有依赖，又能以在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作为威胁讹诈俄国、中国和印度。控制这个地区因而会将门罗主义延伸至旧世界，而门罗主义则是美国霸权事业的目标所在。1945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力图确保针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我们应该回忆得起：它曾试图通过1955年的巴格达协定（这个协定将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它遭到了阿拉伯所有其他国家的反对，因此并不是非常成功；伊朗的国王倒台后，这个协定无疾而终）把这个地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联合起来，还有就是1979年伊朗国王的垮台，他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民族主义民粹事业与美国的霸权目标产生了正面冲突。苏联人很快便明白了支持这项事业会有助于挫败华盛顿的入侵计划。

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这首先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民粹事业耗尽了它带来实实在在改变的潜力，民族主义的力量已经沦落为没有任何治国方针的独裁。这为华盛顿所钟爱的盟友，即海湾地区的政治性伊斯兰教和蒙昧的专制政权开辟了道路。这个地区已经变成全球体系的中心，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令外国的干预（包括军事干预）成为可能，这是因为现有的这些政权在它们自己的人民那里没有了合法性，因此它们不再能够控制——或者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美国与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忠实的盟友密切合作，在中东进行运作。后一个盟友实际上是个真正无条件的盟友，而前一个则曾经如此，但现在则不再那么确定。欧洲与这个地区保持着距离，它接受了美国一家护卫着三驾马车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至关重要的利益——换言之，石油供应——这个事实。

美国如何能够相信它能实现对于这个地区的控制？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华盛顿着手促成“中东共同市场”这样一个奇怪的项目，由海湾国家为此提供资本，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为以色列保留的则是技术控制和那些不得不做的穿针引线的事情。这个计划得到了海湾国家和埃及的接受，但遭到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拒绝。因此，为了推行这个计划，就有必要摧毁这三个政权，而针对伊拉克现在已经做到了。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支持这项计划。华盛顿出于宣传目的推出的那一整套话语体系所谈论的是“民主”。实际上美国只是力图以蒙昧的、“伊斯兰教的”专制政权取代过时的、破烂不堪的民粹主义专制政权（因为要尊重这些“社区”的文化特殊性就有必要这样做）。政治性伊斯兰教现在被描绘为“温和的”（也就是说，它能有效控制局势，足以防止“恐怖主义”的发生，如果这个“恐怖主义”针对的是美国，当然，也仅仅是如果这个“恐怖主

义”针对的是美国)，与其重新结盟是华盛顿所选择的主要路线，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路线。而与沙特阿拉伯这个陈腐的专制政权之间的联盟也将会被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维护。

这项侵略性部署已经导致身处斗争前线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朗）数量上的减少，令它们处于被摧毁的国家（前三个国家）或者受到摧毁威胁的国家（后两个国家）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地位。

远在美国利用两个事件——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以及后来的“9·11”事件，后者被小布什虚伪地加以利用，他像戈培尔一样满嘴谎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作为借口之前，其武力外交就完全以摧毁伊拉克为目的。原因很简单，伊拉克的地下埋藏着很大一部分地球上最好的石油。此外，伊拉克此前已经成功培养了大量的科技干部，由于他们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能够支撑起充满凝聚力的国家大业。这个“危险”必须要通过一场“预防性战争”加以消除，美国认为它有权在自己决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这样的战争，对国际法则完全无须顾及。

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显而易见。但有无数严肃的问题需要加以审视：（1）华盛顿的计划为什么如此轻易便显得如此成功？（2）伊拉克这个国家如今形成了什么样的新局势？（3）伊拉克人民的各个成分面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样的反应？（4）民主进步的伊拉克、阿拉伯和国际力量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萨达姆·侯赛因被打败是可以预见的。伊拉克人民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敌人，其主要优势在于能通过空中轰炸实施种族灭绝，同时又不会受到惩罚（再加上有核力量可以随时动用），伊拉克人民因此只有一个有效的反击手段：在其受侵的领土之上展开抵抗。但萨达姆政权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伊拉克国内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政党（从共

产党开始)，包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而毁掉了其人民所能获得的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吃惊的不是“伊拉克人民”不加抵抗就让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某些行为（比如说他们在表面上参加入侵者所组织的选举）——这些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接受了失败（华盛顿的算计正基于此），恰恰相反，各地的抵抗每天都在加强（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严重的缺陷），这使美国无法建起一个能够确保显得“有序”的傀儡政权。华盛顿的计划已经显示出了失败的迹象。

尽管如此，这种新的局势仍然是由外国的军事占领所造成的。伊拉克这个国家受到了真正的威胁，而原因恰恰在于华盛顿的这项计划无法做到由一个看来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出面，实现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及对其石油资源的窃取）。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对这个国家分而治之。将它分裂成至少三个“国家”（库尔德人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国家）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华盛顿同以色列共同盘算的目标所在（档案材料将来会告诉我们这一点）。事实在于“内战的威胁”是华盛顿为使其继续占领伊拉克合法化而打出的一张牌。因为永久占领伊拉克过去是并且现在依然是美国的目的：这是华盛顿确保自己控制石油的唯一办法。我们当然无法相信华盛顿对其意图所发表的任何“声明”，比如说“一旦秩序恢复，我们就将撤出这个国家”。我们还记得，英国始终都说它1882年后对埃及的占领是“临时性的”（但一直持续到了1956年）。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最恶劣的犯罪手段，一天天毁掉这个国家，毁掉它的学校、它的工厂、它的科学设施。

伊拉克人民面对这个挑战的反应似乎——至少目前看来——与形势的这种极端严峻性并不相称。这还是往好里说。为什么会这样？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说法：伊拉克是个“人为拼

凑的”国家，萨达姆的“逊尼派”政权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压迫性统治是内战不可避免的原因所在（只有延长外国占领的时间才能避免这场内战）。因此要加以抵抗的是逊尼派铁三角中少数亲萨达姆的伊斯兰强硬分子。由于有大量的事实指向这个说法的反面，要上当并不容易。

正如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掌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变得独裁起来，由它掌管的国家仅仅是半反帝的，也就是说，根据情况，它们双方（伊拉克掌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主导着这个地区的美帝）可以达成妥协。这项交易助长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的狂妄自大，他觉得华盛顿有意让他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首要盟友。在1980~1989年间的那场针对伊朗的荒唐的、如同犯罪般的战争中，华盛顿曾给予巴格达支持（包括向它提供化学武器），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伊拉克落入了为它挖好的陷阱之中：美国对萨达姆吞并科威特（它实际上曾是伊拉克的一个省，后来英帝国主义者将其分割了出去，其目的是把它变成英国的石油殖民地）先是放行，然后又对其实施了长达十年的制裁，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令这个国家变得一穷二白，从而便于美军对这个真空地带进行充满荣耀的征服。

我们可以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各届政权，即使是在萨达姆“指导”下衰落的最后阶段，提出很多指责，但并不是它们搅动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冲突，也并非是他们迫害了基督徒。那么谁要为这两个穆斯林派别之间的血腥冲突以及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承担责任？有一天我们肯定会知道美国中情局（毫无疑问还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是如何组织了许多这样的大屠杀的。不过，话说回来，萨达姆政权及其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做法所造成的政治荒漠，也“鼓励”了各类追权逐利者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们往往受到占领者的保护，后者有时可能天真到甚至相信自己“对这些人可以加以利

用”。这些追权逐利者，不管他们是（逊尼派或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所谓的（准部落里的）显贵，还是从美国“进口”过来的极其腐败的“商人”，在这个国家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即使是宗教领袖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受到追随者们的尊重，但他们并不拥有可以为伊拉克人民所接受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萨达姆所造成的真空，我们甚至从来都不会听说他们的名字。在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所制造出来的这种新的“政治世界”里，真正广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甚至是民主的政治力量，是否能够重拾旧山河？

库尔德问题是个真正的问题，在伊朗和土耳其如此，在伊拉克也是如此。但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即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大国一直极其虚伪，惯用双重的标准。在伊拉克和伊朗，对库尔德人吁求的压制从未达到像在安卡拉那样实施长久的警察、军队、政治和道德暴力的程度。伊朗和伊拉克也从来没有否认库尔德人的存在本身。但土耳其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原谅，而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媒体反复提醒着我们，北约是由民主国家组成的组织，这些年里涌现了杰出的民主人士萨拉查，他统治期间的葡萄牙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更不用说北约对希腊的上校们和土耳其的将军们所实行的民主同样无条件支持了。围绕着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创建的伊拉克人民阵线在其动荡历史中的最好时刻，只要在当权时认真负责，就总是做到了与库尔德人的主要政党求同存异，而且后者也始终是它们的盟友。萨达姆政权“反什叶派”和“反库尔德”的倾向当然也是真的：这可由他1990年入侵科威特失败后其军队轰炸巴士拉和针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为证。这是对华盛顿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所实施的阴谋诡计做出的“反应”，这种外交令魔法师的学徒们对局势大加利用。尽管如此，这仍然是犯罪的行为，最主要的也是个愚蠢的行为，因为华盛顿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对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我们还能指望他

做出什么好事呢？

不过，尽管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有其“弱点”，尽管他们没有挫败华盛顿的军事计划，却已经挫败了其政治计划。恰恰是这点让欧盟中主张大西洋两岸联手的那些国家感到不安，它们是美国忠实的盟国。这些副手们担心失败，因为这会使南方人民更有力量，从而迫使帝国主义三驾马车全球化的跨国资本尊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

外国占领军越早离开这个国家，欧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力量给予伊拉克人民的支持就会越强大，这些受难的人民拥有美好未来的机会也就更大。外国占领持续的时间越长——当一切不可避免地结束时——未来就会越黯淡。

“大中东”这个地区如今是帝国主义魁首与全世界人民之间冲突的中心地带。挫败华盛顿集团的这项计划是世界上任何地区实现进步的前提条件。如果做不到这点，各个地区的进步就将依然极其脆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低估世界上如欧洲、拉美等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这仅仅意味着这些地方的斗争必须彼此结合起来，形成一场全球性的斗争，从而在华盛顿选择的发动其首次犯罪攻击的这个地区将它打败。

美国主导全球的计划——门罗主义向全球的延伸——是个唯我独尊的计划。出于这个原因，我在苏联刚刚垮台之际即称它为“混乱的帝国”。但美国将遭到不愿屈服的国家不断增强的抵抗运动的致命迎击。这样美国就将被迫像最大的“流氓国家”那样行事，以永远的战争（已经在中东开始了，但目标不止于此，将会延伸至俄罗斯和亚洲）取代国际法，沿着法西斯主义的陡坡迅速下滑（《爱国法案》已经授予针对外国人的监察权，这在正常的民主制中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恐怖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某些以不同程度组织起来的个人所选择的一种行事方式，它在历史上并非新的现象。它为某些以其自己的方式阐释“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所合法化。但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点，即这个选择总是针对无法受到支持的状况所做出的反应，而且它的根源往往在于社会角色的无力感，其幻灭感产生于其他方式的社会干预——无论是“革命”、实行民粹主义还是进行选举——遭遇了失败。

因此，更加重要的是评判资本主义过去尤其是在各殖民地所系统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惩罚性远征”和“殖民大屠杀”在这段历史上比比皆是。今天，美国正在系统推行，而它的欧洲和日本盟友则赞同它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生动反映了华盛顿虚伪而残忍的选择，与它的化学轰炸相比，萨达姆·侯赛因类似的罪行不过是小儿科而已。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美国最高当局为其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受到绞死的惩罚？如今这些罪行每天都在被美军所占领的伊拉克发生，一如在关塔那摩发生的那样——古巴政府称关塔那摩是“绝无仅有的热带古拉格”。如今，在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以及南黎巴嫩，以色列正在使用各种在其他地方遭到禁用的武器（延时炸弹和碎裂炸弹），但这没有让西方舆论感到应有的不安。今天的美国无疑是头号流氓国家。

欧洲 - 地中海伙伴关系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且源自共同的希腊祖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由此发源，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在历史上保持着复杂的关系。不过，

我们知道，“发达的”欧洲与“欠发达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北方与南方的分立直至很晚的时候才确立起来，那时资本主义的扩张因其对南方部分的殖民而得以强化，而这种殖民也只是最近才结束了（英国1954年才离开埃及，1956年的时候它甚至还试图重返那里，法国也是直到1962年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二战之后，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以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为主导的逻辑当中。北约实际上视阿拉伯世界为其对手，而苏联则支持阿拉伯世界自主发展的努力。从这个地区退出后，欧洲让美国在此单干，从一旁支持美国的是它的忠实盟国，如土耳其、以色列及海湾各国，这样就保证了欧洲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

苏联这个对手消失是否会为欧盟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真正的合作开启新的前景？1995年，欧洲在巴塞罗那主动提议构建“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那时人们有那么一刻会去这样想。今天这项进程不仅陷入了停滞，而且已经垮掉。原因在于这个项目本身的设计建立在不可接受且难以置信的原则之上，因此即使这个项目的一些推动者是好心好意的合作者，它也无法得到实施。

欧洲伙伴不仅涵盖了地中海周边的欧洲各国，还包括欧盟的所有国家。这（有权考虑分享共同的利益以及思考共同的未来）是欧洲人的权利，无人可以对此提出异议。这是所有欧洲国家无可争议的权利，即使说这些国家的人们同样有权对如今状况下的这项欧洲计划提出批评（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

另一个伙伴则很奇怪；它由地中海南岸和东岸的所有沿岸国家所组成。不过，这些沿岸国家中的大多数恰巧是阿拉伯国家，它们属于一个独特的世界：阿拉伯世界。无论是或不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这个世界都是存在着的，因此应该承认这个阿拉伯世界可能拥有共同的

倾向和利益，对于自身如何融入当代世界也有共同的认识。把地中海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从非地中海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中分出来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我们所需要的因而是欧洲与阿拉伯之间的协议——换言之，是所有欧洲国家与所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议，无论这些阿拉伯国家是否位于地中海沿岸。地中海这个概念只有令所有沿岸国家一同解决涉及这片共同海域的问题，比如说污染领域的问题，才会有意义。只有不局限于狭窄的议题，人们才能构想欧洲与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这小片地方之间关系的未来。

另一方面，巴塞罗那会议（1995年）的时代同时也是马德里和奥斯陆会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之间某种形式的和平在美国牵头下正在推进。欧洲人以此实施的战略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战略的补充，其目的在于主导上述和平的内容。这类和平所设想的基础事先就应该被看成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等同于在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上建立班图斯坦——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容了。

欧洲-地中海计划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地理背景下构想出来的。它的内容是利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把将以色列融入这个地区的意图强加给阿拉伯各国。作为欧洲与阿拉伯各国合作的前提条件，它还推出了阿拉伯各国本身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这就好像欧洲在种族隔离时代迫使非洲各国调整其与南非的外交关系，以此作为欧洲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和开展合作的条件一样。以色列是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它一直都在实行系统的种族清洗政策。容忍以色列已然不可接受，更不用说支持它了。以色列应该受到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抵制。

巴勒斯坦当前正在发生的悲剧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干预，伴以有效的手段对以色列实施严肃的制裁，直至其承认巴勒斯坦是个国家。欧洲在科索沃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干预，而它所捍卫的却并

不如巴勒斯坦事业那么重要，对于以色列政府被托付给一个真正的战犯——这个人公开宣称他反对马德里和奥斯陆的协定，欧洲也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的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欧洲只是被动接受了华盛顿此前做出的决定。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欧洲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要同美国保持距离，这显然难以做到。这也证明了政治意义上的欧洲并不存在。

欧洲所谓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提议还包含经济成分，欧洲的机构对此宣称，在赋予它们的提议以实质性内容方面付出了“新的努力”，这些提议因而可以纳入“共同发展”和“伙伴关系”的框架之中，所以它们不是在提供“援助”，这是一个已经贬值的词语。

对这些提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根本不是如此。所有的这些提议都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排他性逻辑（公开市场、为外国投资创造“有利的”条件，放松管制和取消保护等），这正是美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计出来的那套逻辑。不仅如此，屈从于这些机构所设定的这套规则，包括所谓的结构性调整计划，被规定为实行欧洲的这些提议的前提条件。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欧洲真正的立场与美国并无不同。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欧洲的这些提议目前都服务于两大主导性目的：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美国的霸权。这两个层面彼此相关。接受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排他性逻辑就意味着同意优先考虑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的利益。无论如何，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的利益同北美的并无本质不同。当然，它们之间存在冲突，但这是同类商人之间常见的商业冲突，能在任何国家的跨国公司间发生。不能在此基础上就以为欧洲相对于美国是独立自主的。

欧洲这个伙伴还设置了其他条件。尊重人权作为伙伴协议一个理论上的条件的提法是否可取？当然，即使由并不打算实施其条款的政

府所签署，一项协议仍然能够成为一个杠杆，为制度的受害者所利用。不过，这个工具依旧效果有限，因为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基本上是各国人民的事情，必须在所涉及的国家内部展开。国际主义在这方面十分有用，但变化主要通过内部斗争并动员起社会中的民主力量才能实现。外部实体所能做的事情恰恰是支持而非打击人民的斗争。

不过，大国（在这件事上是欧洲）是否打算以民主的名义对这种干预加以利用，这依然令人起疑。“双重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并且显而易见，这说明利用民主这块招牌是绝对虚伪的：它被用来针对需要加以削弱的对手，但如果对面是盟友的话，它就被弃之一旁了。此外，当前的主导概念用时尚的术语来说是“善治”，也就是可以接受的治理这个概念。呜呼！这可是个很差的概念，它将民主局限于多党制、正式的选举和对个人若干基本权利的尊重，而不承认社会、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也不承认一个人在本国之内和之外的工作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和自由迁徙权。这些权利构成了一个整体，由各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共同组成。如果不伴随其他权利，那么政治方面的权利就变成了可以被操纵而且也确实是在被操纵着的工具，因此而有害于民主这项事业，因为这损害了民主在人民自身内的信誉。

欧洲认为伊斯兰教政府很有可能在整个地区建立起来。它所考虑的因而是让当权的政治性伊斯兰教依然温和，也就是说，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欧洲相信，伊斯兰教政府（比如说穆斯林兄弟会）能够控制好自已的疆界，从而把它们的人口圈在自己的疆界以内，减少移民者的数量。此外，温和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这个选项还被认为能够将伊斯兰教与民主结合起来，以土耳其模式为其范本。这个设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大家可以接受伊斯兰教是温和的这个

说法（我们会称其为“温顺的”伊斯兰教），是因为它在经济方面完全按照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要求行事。不过，它将不得不把民主（如果存在的话）从社会进步中剥离出来，因此它无力维持屈从于这种安排的社会稳定。

我们能否设想这样一个地中海联盟计划，它建立在真正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让地中海北岸和南岸的国家能就疆界问题以及各类创新型合作进行协商，从而有助于重建地中海文明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一页肯定早就翻过去了，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南北两岸差距的扩大，还因为北岸国家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对南岸的国家进行殖民征服。无论如何，抛弃原来的计划而赞成欧盟所强推的地中海联盟计划，这已经给任何专门针对地中海的方案画上了句号。

欧盟和美国为一方，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为另一方，双方的博弈对中东事务可能产生影响，在针对这个地区展开讨论时，这一点也应该考虑进去。

印度已经正式拒绝在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巴以和平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并表明，其作用限于支持任何和平的解决方案，但它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说明，只是将找到解决方案的责任留给了欧洲和阿拉伯各国。而俄罗斯认为自己应该有所作为，这对于正在寻求之中的和平解决方案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基于此精神，俄罗斯正在邀请欧洲（它视自己为欧洲的一部分）确定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不受美国立场的影响。俄罗斯希望看到欧盟与其大西洋对岸的盟友保持距离，不过是否真能实现，仍有待我们的观察。

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广泛的南北关系的一个具体部分。当前南北关系的特点是三驾马车帝国主义（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寡头资本正在发动攻势，美国也在计划以武力控制整个

地球（为它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小老弟北约和日本）。这种关系因此以冲突的加剧而非减少为标志。结构性调整项目、外债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整个南方国家人民大众社会状况的恶化，尤其是农业社会的系统解体造就了2亿多“移民工人”（跨国移民的压力），如果把所涉及国家的国内移民（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计算在内，则人数超过了5亿。

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受影响民众做出了直接的反应，但从中并不一定能够找到人道的解决办法。在北方富裕的国家里，当局和媒体正在系统鼓动唯我独尊的心态，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对于“捍卫”的优先考虑，这样的话人们就能确保帝国主义国家所享有的优势（尤其是排他性获取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这样的意图伴随着以掩盖暴力为目的的言论和行动，所以我们不断听到“人道主义”的干预、捍卫“人权”和“善治”、向贫穷宣战之类的说法。欧洲为阿拉伯国家所制订的计划全都属于这个类型。而南方各国的民众，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对此的反应则仍然大多局限于逆潮流而动的幻觉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组织起各国人民所必需的国际主义当然难以应对这个挑战。不过，国际主义向前发展的空间确实存在。西方人民所听到的建议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我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另一个问题回击，比如说“对于破坏性的市场体系和幻觉般的个人主义的异化作用又有什么可说的”？皮球现在落在了欧洲左派的场内。针对欧洲帝国主义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殖民事业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干预计划，如果欧洲的左派能与其保持距离，那么欧洲各国人民当然能够帮助阿拉伯世界从逆潮流而动的幻觉这样一条死胡同中脱身而出。

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的殖民扩张并非阿拉伯世界想象的产物，相反，它构成了真正的挑战。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拒绝承认任何已定国界的国家（因此它无权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与 19 世纪的美国一样，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为扩张自己的殖民地而征服新的领土，也有权像对待印第安人一样，捕杀或剿灭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 200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民。以色列是唯一公开宣称不受联合国决议约束的国家。

1967 年的战争是以色列从 1965 年起即与美国一同谋划的，它要达成几个目的：着手推动这个地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权的衰落，打破它们与苏联之间的联盟，迫使它们重新给自己定位、走上美国的道路，以及为犹太人的殖民开辟新的土地。在 1967 年所征服的领土上，以色列建立了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启发的种族隔离制度。诺曼·芬克尔斯坦（2000 年）的分析指出，只要被人指责实行的是种族主义——这是绝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犹太复国主义就会一如既往的反过来指责这些批评者反犹太人，还有就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期间遭受大屠杀的同情心，对批评者进行系统性的讹诈。为实行其计划，以色列需要阿拉伯世界在所有层面上都尽可能的羸弱。

正是在这方面，居于全球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两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一方面，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继续推进这一背后的逻辑总是导致而且仍将造成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地区——在此处是阿拉伯地区——的“发展”都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阿拉伯世界会妨碍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窃取这里的石油资源，而要维持与资本积累相伴而生的浪费，石油则是必需品。三驾马车国家的政治

当局不想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和强大，因为现在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大多数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资本的忠实奴仆。

西方大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因此建立在由共同利益构成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个联盟既不是欧洲人深感愧疚的产物——他们要对过去的反犹浪潮和纳粹罪行负责，也不是犹太游说集团在利用此种情感方面技能高超的结果。如果西方大国觉得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话，它们会很快找到克服上述“情结”并婉拒犹太游说集团的办法。我对此毫不怀疑，因为我不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天真地以为多数民主国家的政府当局会被迫接受公共舆论——人人都知道公共舆论是人为编造的。因此，如果针对以色列采取了包括封锁在内的措施（即使是温和的），就像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古巴采取的类似措施一样，以色列连几天都撑不过去。所以说，如果西方大国想要这么做，那么让以色列不胡来，从而为真正的和平创造条件并不困难。但它们并不想这么做。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与资本主义的普遍扩张之间这种实质上的互补关系——这是两者狼狈为奸的基础——阿拉伯的公共舆论现在还没有做好理解的准备。在这件事上，阿拉伯的公共舆论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视野狭隘的受害者，目前它还没有能力批判这种思想的根基，更不用说超越这种思想了。

1967年战败之后，萨达特宣称，由于美国在牌局中持有“百分之九十的牌”（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有必要跟苏联决裂并加入西方阵营，而且这样做可以诱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不至于胡来。除了萨达特所独有的这种“战略观”——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其站不住脚——之外，阿拉伯的公共舆论依然完全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不用说指出其真正的矛盾和弱点了。不是有人反复断言“西方人最终会意识到他们的实际利益在于同2

亿阿拉伯人——他们的紧邻——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在于为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牺牲这种关系”吗？这种思维认为所涉及的这些西方人（也就是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想要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发达的阿拉伯世界；它还揭示了一些人缺乏这样的一种认知，即西方人实际上想要让阿拉伯世界羸弱不堪，他们认为支持以色列并非权宜之计。

对于美国通过马德里和奥斯陆的两项协议（1993年）所推出的所谓“永久和平”计划，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外的阿拉伯各国政府选择了同意，这除了带来其所产生的后果，即为以色列推行其扩张计划大开绿灯，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结果。阿里埃勒·沙龙如今公开拒绝执行《奥斯陆协议》，这显示了此前很久就应该理解的事情：这个协定与永久和平毫无关系，它的目的只是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开启新的阶段。

以色列以及支持其计划的西方强权国家将永恒的战争状态强加给了这个地区，反过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动机，推动着阿拉伯国家专制政权的永久化。因此，可能出现的民主进步受到了阻碍，这削弱了阿拉伯世界的复兴机遇，因而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及美国的霸权战略在此部署铺平了道路。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因为美以之间的联盟符合这两个伙伴国的利益。

阿拉伯世界为实现民主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因而并不取决于所谓的、名不副实的和平协定。相反，这场斗争的有效开展取决于揭露这些计划的真实目的，从而让它们的信誉扫地。我觉得有必要理清论证的思路，这让我得出了上述我个人的结论。

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区发动的暴动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它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这类斗争当中主要的一场斗争。它只是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对不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式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渴望。

只有当以色列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深刻的实质性变革（以致迫使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放弃其系统性削弱外围地区人民——在这里是阿拉伯人民——地位的战略），这场斗争才会结束。当然，这也不会很快实现。

以色列当局正在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推行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扩张计划，因此它只承认犹太人的权利（我强调犹太人是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非犹太人，无论是个体而言还是总体而言的非犹太人，并没有被赋予相同的权利），这符合了种族隔离国家的定义。为此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强行征用土地供新定居者使用、掠夺水资源以及危及巴勒斯坦人任何形式的基本经济生活。

开始的时候，这套制度给人的印象是它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似乎已经接受了名流显要们以及资产阶级商贾们在被占领土上对其日常生活的胁迫式管理。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1982年）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被赶出了这个地区，在其流放地突尼斯，巴解组织似乎不再能够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吞并。

巴勒斯坦人民在以占区发动的首场暴动出现于1987年12月。这显然是场“自发的”暴动，是工人阶级尤其是被困于难民营里的那些最为不幸的社会阶层的一场起义。通过组织起系统性的公民拒绝行动，这场暴动对以色列当局进行了抵制。以色列回应以殖民者的残暴表明了其实质，但它无法重建其警力，也无力扶持起着缓冲作用的懦弱的巴勒斯坦中产阶级。这场起义的诉求是流放在外的政治势力大规模返回、建立新型的地方组织以及中产阶级对长期解放斗争的支持。这是一场年轻人的起义，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被纳入巴解组织正式

的组织网络之中。巴解组织的四个组成部分（法塔赫，它效忠于其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阵线，简称 DFLP；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简称 PFLP——和共产党）立即加入了这场起义，因而赢得了这些年轻人当中不少人的认可。由于此前几年的懈怠，所以虽然 1980 年东山再起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起了几次行动，但穆斯林兄弟会在这场暴动中并无建树，让位给了 1988 年成立的哈马斯，后者开展了新形式的斗争。

尽管首轮在这场起义在经历了两年时间的不断扩大后似乎失去了后劲——原因在于以色列武装力量和当局的暴力镇压（它们向巴勒斯坦儿童开火，针对巴勒斯坦工人关闭了“军事分界线”，导致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等等），这却为美国主持的“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的最终结果是马德里会议（1991 年）以及随后的所谓《奥斯陆协议》（1993 年），这让巴解组织得以重返被占领土并变身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1994 年）。

《奥斯陆协议》的设想是将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变成一个或多个班图斯坦，最后纳入以色列的领土之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身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者们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想象力，他们完全复制了种族主义的南非的整个种族隔离制度。以色列不管怎么说都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忠实朋友，两者对人类有着相同的、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会建立一个虚假的国家，就像班图斯坦那样，实际上，它只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下命令的传声筒。

重回巴勒斯坦后，巴解组织变身而成的权力机构力图在被占领土上建立秩序，却不无某些并不鲜明的立场。权力机构把协调暴动的年轻人大都吸纳进了其新的组织结构当中。它通过 1996 年的选举获得了合法性，巴勒斯坦人大规模参与了这次选举（80% 的选民参加了

投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阿拉法特担任权力机构的主席。一方面，巴勒斯坦所有的政治派别（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阵线、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共产党和哈马斯）全都表现得政治上相当的成熟，它们拒绝在竞选期间抹黑对手，而是将选民的选择交给了那些在斗争中既忠实又有效的个人，无论他们倾向于哪个政党。不过，由于以色列控制了领土上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且被占领土上的经济无法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权力机构不得不对严峻的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海湾各国几乎完全停止了向权力机构提供经济援助，其借口是1990年入侵科威特期间巴勒斯坦对伊拉克表示了同情。欧洲方面虽然做出了令人愉快的承诺，但每次提供的资金却少之又少，甚至还同意由以色列来控制这些金融交易。为应付这种局面，权力机构剿灭了不可靠的当地资产阶级，实现了对商业交易（事实上）的垄断，由此力图获得资源，维持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机器的生存。

在这个当口，我会避免针对权力机构进行肤浅的是非判断，因为在我看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是答应履行以色列、美国和欧洲所赋予它的功能——“管理这个班图斯坦”，还是站在拒绝臣服的巴勒斯坦人民这边？

按照这个班图斯坦计划的死忠者们的说法，人员冗余的警察力量（警察人数5万左右，甚至更多）据说没有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那就是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无论如何，相较这支力量有时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以色列武装力量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尤其是这些警察人员拒绝镇压自己的人民，我们可以认为巴勒斯坦的警察力量没有做过过分的事情。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金融和商业垄断为分赃提供了有利的机会，这也推动了一个新贵阶层的形成，这些人完全依赖权力机构的代表们

攫取不义之财。唉！巴勒斯坦的那些领导人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他们的行为不像模范的斗士——管理着公共财产却不为个人谋取丁点私利——但话说回来，没有了这些垄断，权力机构还能活下来吗？

恰恰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反对这个班图斯坦计划，所以以色列决定废除《奥斯陆协议》——虽然协议的条款由它自己确定；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用军事武力完全代替这项协议。沙龙这个战犯 1998 年在清真寺广场进行挑衅行为（但得到了当时的工党的支持，为他提供了坦克），以及这同一个罪犯当选以色列政府首脑（还有内阁中西蒙·佩雷斯这样的鸽派的通力合作）是当前正在开展的第二轮暴动的根源。

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着屈从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制度的前景，这第二轮的暴动是否会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

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民现在有了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有着实实在在的特色。其基础并非“一党制”模式；它看来统一而且单一化，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它由保持了各自个性、愿景、意识形态、死党甚至主顾的成员所组成，但这些人能同意一起进行斗争。一群处于不断变动当中的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这场运动提供了运作的手段。当然，这个群体是个真正的大熔炉，其中的某些非政府组织可能只是起着掩护投机性腐败或者掩护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进行渗透的作用。但正是这同一个令人难以看清其面目的群体在由于敌人的军事入侵而变得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保证了人们的日常生存。这些组织除了供给并分发生活必需品，还帮助学校和医院运转起来。这种积极的作用难道应该被弃如敝屣吗？

泛阿拉伯主义既是现实，也是一个积极的现象。鉴于全球化在其推进中所带来的对文化的破坏以及其他各种影响，如果说法语的社区、说葡萄牙语的社区和拉丁美洲重视家庭的精神是合法抵制的构架

(在我看来，它们确实如此)，那么又凭什么对泛非主义或者泛阿拉伯主义不屑一顾呢？占据着从大西洋延伸到阿拉伯湾的这片土地并且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尽管各地之间略有差异）的各族人民，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为什么就应该没有意义、就应该不让人感兴趣？

不过，要说“只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它遭到了违背其意志的分裂，这样的说法要建立一个应该避免的假设之上。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民族问题依然远比“阿拉伯民族主义”（qawmi，与之相反的是qutri，后者涉及阿拉伯各国国界以内的架构）这个意识形态的隐含之意复杂得多。阿拉伯各族人民的民族现实可以被比喻为一层叠一层的金字塔。泛阿拉伯层面（qawmi）是现实。但当地层面（qutri）同样也是现实。事实上，历史上的叙利亚（包括当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的领土）的疆界划分确实是近期的事情（1919年），是人为的，而且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这与肥沃的新月地带（历史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情况一样，但要说埃及、摩洛哥和也门也是近期人为分割的结果，那就荒唐可笑了。无论是古老的国度还是新建的国家，“当地的国家”（qutri）这个说法以对它们各自特点的兴趣和真正认知为基础。

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民粹民族主义必然以各国的这些现实为其基础进行部署。它们想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发展战略——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进步转型以及确立其相对于帝国主义的独立自主——只能是像过去那样：在各自的国家当中（qutri）设计并实施。

泛阿拉伯这个层面本可用来实施一些补充性的战略，这些战略的目的在于强化每个伙伴以自我为中心的构架，而非另外拿一些构架来取代这些构架。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民粹民族主义的代表们并无有效设计这种补充战略的能力，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挑战的真正本

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往少里说，也是非常不够的。这导致了服务于他们的那些“技术官僚”所能想到的仅仅只有“共同市场”，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战略，是绝对不适合的。

在政治层面，民粹主义和独裁国家这两者所共同具有的局限性招致了这些失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阿拉伯一体化推动者的面目出现，但它既无法摆脱魔咒，也无法超越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经历之间的类比，它们的统一由两方之一（普鲁士和皮尔蒙特）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征服形成，对此的拙劣模仿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20世纪体系边缘地带的状况跟19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

民粹主义当局官方的泛阿拉伯主义曾经一度在泛阿拉伯运动的推动下显得左倾，这是一场由年轻的革命者们发起的运动，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和格瓦拉的思想，推动了巴勒斯坦的那些激进政党（纳耶夫·哈瓦特迈赫的民主阵线和乔治·哈巴什的人民阵线）的形成，发动了南也门的人民革命和佐法尔战争。大多数的分析总是太具意识形态色彩（执着于指出其错误和“离经叛道”），与这些分析相比，萨纳拉哈·易卜拉欣在其长篇小说《瓦尔达》中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见解洞察了这场运动的逐渐消亡，其对社会、集体和个人自由（尤其是针对女性的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认为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在现代阿拉伯史上的这个时期过于受欢迎——可以有效替代人民大众所存惰性的幻觉。这个阿拉伯版的“游击中心”理论（foquism，切·格瓦拉的革命战争理论）像原来的拉美版本一样逐渐销声匿迹了。

官方的泛阿拉伯主义带来了各类组织的繁荣发展，这些组织在整个阿拉伯实体当中进行运作。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每个职业都认同于一个有时颇为活跃的泛阿拉伯组织（阿拉伯的律师、阿拉伯的工程师、阿拉伯的医生、阿拉伯的作家等），正如至少在理论上有个行业工会

联盟一样（阿拉伯工人工会）。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阿拉伯各国间的移民（向产油国的移民）不断增加，这当然有助于增强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但这是在去政治化的大气候中进行的，主导当时环境的是海湾国家极其反动的做法。其意义因此相当的不明确。资本回流的意义也同样的不明确，其主要的获益者是伊斯兰教商人们。

独裁的泛阿拉伯主义已经死去。要完全相信这点，只要参加（我就曾参加过）几场它的（葬礼）“仪式”即可，这样的“仪式”每年举行，一大群“往昔的领导人”——他们打着领带，平均年龄现在超过了 70 岁，而且不向女性和年轻一些的人开放——聚在一起，他们对民粹主义时代仍然只有怀旧之情。它对伊斯兰教潮流的影响当然不是为其赋予了新的生命。相反，它使其稀释于新的微醺的幻觉之中，那就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幻觉。

历史上的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阿拉伯世界不再有其自己的宏图大业，无论在当地的国家层面还是在整个的泛阿拉伯实体层面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外人（美国和欧洲）为它想出的事业似乎是强加在了阿拉伯世界的头上。

尽管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可能并不认为他们同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国家”，他们却仍然觉得自己属于同一个文化社区，这就是现实，而且这样的现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变得非常强烈。有人可能曾经希望这种共同的情感会带来阿拉伯各国之间认真的合作，甚至会促成它们着手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统一（邦联制、联邦制、单一制）。这尚未发生。

阿盟的全称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国家间组织，它按照联合国的思路设计，其成员国保留各自的全部主权，即并不向超国家机构让渡自己甚至仅仅部分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联盟类似于非

盟和美洲国家组织而非欧盟。

这个联盟的创设也必须被视为对泛阿拉伯主义的一种索然乏味的替代。基于联合国大家庭的模式，它创建了一系列专门的阿拉伯国家间组织。它们的成绩单依然并不出众：大量的研究、报告和项目，有些质量不错，但鲜见具体的成就。

这个地区因此采取了其他办法推动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泛阿拉伯主义节节胜利，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当时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直至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凭借着动员起强大的政治力量，各方为实现这样的统一——即使在开始时仅仅是部分的统一——付出了努力，其中埃及与叙利亚的统一——这两个国家共同加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7~1961年）——将整个事态推向了高潮。这种形式的阿拉伯统一的失败当然给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战略敲响了丧钟，而且它导致了与它们紧邻的国家政府之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沙特阿拉伯与也门之间、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敌意甚至是冲突的加深。

与此同时，自1973年以来，石油热似乎取代了泛阿拉伯民粹主义这一激进的政治渴望。伴随着这轮热潮的是大规模的内部移民潮，人们大量离开穷国（突尼斯、埃及、苏丹、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前往富裕的国家（利比亚和海湾国家）。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海湾各国感到受到了这种“入侵”的威胁，它们的反应是逐渐以亚洲的劳工移民——他们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取代了阿拉伯的移民。石油热还为可观的转移支付提供了资金。但这些转移支付远非被视为一体化事业的条件，而是总体而言浪费在了统治阶级的私人消费和受助国的公共消费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因为海湾国家那些极度保守的势力是自由主义全球

化和美国霸权所提要求的传声筒，它们从未想过要对其发起挑战。

它们同时表示效忠政治性伊斯兰教，对它的主导潮流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使得石油热效应的形象完全负面，这是因为政治性伊斯兰教拒绝对阿拉伯统一感兴趣，以对“伊斯兰国家”的呼吁将其取而代之。这里有个阿拉伯语的双关语，很遗憾，这无法翻译：“热潮”（al fawra）已经取代了“革命”（al thawra）的位置。石油热还用于某些零散的私人投资。但这也完全符合强化寄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人眼中的未来只有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区域化或者说阿拉伯一体化并没有取得任何名副其实的进展。

阿拉伯世界在世界体系中仅仅拥有从属的地位。其可观的石油出口并不能真正代替有效的工业化，既无法满足内需，也不能带来影响世界市场的能力。跟在其他地方一样，比如说加蓬，在阿拉伯世界，比如说海湾国家，既有大量边缘化的穷人，也有一些边缘化的富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塑造世界体系当中的积极参与者。虽然这个地区所供应的石油对西方消费者至关重要，但他们依然是被动的棋子，只得单方面被迫适应这一切。

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历史时期。由其他人抢占先机，提出建议并强加给他们的阿拉伯伙伴，这就毫不奇怪了。正因如此，视中东为其禁裔（自从不复存在的苏联退出这里以来，欧洲只是被美国邀请来支持它在这个地区的存在的）及对外政策优先地区的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和土耳其一起（再加上海湾各国政权无条件的支持）炮制了中东共同市场这样一项“宏图伟业”。

在欧洲方面，它们提出了它们所称的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建议，而它的逻辑则并无二致。不过，尽管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但它加剧了马格里布与马西利格两地之间的割裂。由于马格里布各国与欧盟签署了合作协议，它们已经比马西利格各国更深地融入了欧洲的生产

体系（它们向欧盟提供由工资很低的分包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美国口中所说的“共患难”的结果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劳动分工：美国取得中东及其石油资源，而欧洲得到马格里布及其外来移民。

逆流而动所陷入的死胡同

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如今有着如此的形象：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都为伊斯兰教所占领的社会。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似乎难以想象能够出现另外的一番景象。外部“观察人士”（政治和媒体的代表们）大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性，甚至民主本身，正在顺应着几乎无处不在的伊斯兰教，这导致世俗化实际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大群蓄须的男人身体前倾虔诚祈祷，一队队女人脸蒙面纱，这样的画面让人们以为这些人有多么虔诚，但这是个相当武断的结论。为取得这样的效果而正在施加的社会压力很少被人提及：女人们并没有自己选择披上面纱，她们是被人强制这么做的，这其中还涉及暴力。而且如果这群人不参加祈祷，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有时是他们的性命。西方“文化主义的”友人们呼吁尊重信仰的多样性，但他们对于为了方便掌权者传递这样的形象而做过些什么却往往并无调查。世界上确实有那种“疯狂信仰上帝的人”。不过他们从比例上来说是不是超过了参加复活节游行的众多西班牙天主教徒？是不是超过了聆听远程传道的无数美国人？

事实上，这个地区并非一直在传递着自己的这种形象。国家之间的差异不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地区，从摩洛哥延伸到阿富汗，涵盖了所有的阿拉伯人（阿拉伯半岛的除外）、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和原苏联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世俗主义发

展的潜力远不能忽略不计。而其余的临近民族，即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的情况就不同了。

这一大块区域上的政治传统受到了现代激进潮流的强烈影响：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比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更大。这里的统治阶级所实行的主要政治转型模式就受到了这些激进潮流的启迪，在某些方面，这些模式可以被称为“开明的专制”。

穆罕默德·阿里和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时期的埃及当属这种情况。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和伊朗的现代化也运用了类似的方法。此后的民族主义民粹运动同属“现代”政治事业。这个模式有无数的变种（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但运动的方向则是一致的。那些看似极端的例子，即阿富汗和南也门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实际上也并无不同。所有这些政权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因此也获得了民众普遍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们所实行的并非真正的民主，但它们仍然为在这个方向上可能取得若干进步开辟了道路。有些国家，比如说1920~1950年的埃及，在温和的反帝中间派（华夫脱党）的支持下，曾试图实行选举式民主，但这遭到了居于主导地位帝国主义势力（英国）及其在当地的同党（王室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阻击。世俗主义——当然，其实施应当非常温和——并不为人民所“拒绝”。相反，民众普遍认为神职人员才是蒙昧主义者，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确实如此。

现代的体验——从开明的专制到激进的民族主义民粹运动——其出现并非偶然。它由强大的政治运动所推动，盛行于中产阶级当中，这些人由此表达了他们全力投入现代全球化并享有自己全部权利的愿望。我们可以称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事业，它的特点是现代化

和世俗化，有演进成民主制度的潜在可能。但这正是它与居于主导地位帝国主义利益发生冲突的原因所在，帝国主义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打击，而为了这样做，它还系统地动员起了日渐衰落的蒙昧主义势力。

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广为人知。它差不多由英国和埃及王室于20世纪20年代在埃及创立，其目的在于对民主和世俗的华夫脱党形成阻挠。纳赛尔死后，在中情局和萨达特的组织下，它从自己在沙特阿拉伯的避难地强力回归埃及，这也同样广为人知。塔利班的历史也为人们所熟知，它在巴基斯坦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为的是打击给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开办了学校的“共产党人”。人们甚至知道，为了削弱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的世俗和民主潮流，以色列人在开始时是支持哈马斯的。

沙特阿拉伯地底下的大片油田被发现之时，其社会无疑甚至还从未开始摆脱传统。帝国主义与落伍于时代的沙特统治阶级之间立即形成了联盟，这对双方都是合算的交易，也为瓦哈比教派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注入了新的生命。至于英国，它得以打破印度的统一，说服那些穆斯林的领袖们建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它从诞生伊始即被政治性伊斯兰教所牢牢控制。有趣的是，那个按其说法这自有道理的“理论”——它被认为由毛杜迪首创——在开始时完全由英国的东方主义者所草拟，以服务于他们的女王。但如果没有美国长期以来的强大支持，政治性伊斯兰教本来很难越过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边界。

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美国创立了“伊斯兰会议”，从1957年以来立即得到了沙特和巴基斯坦的推动，美国以此占据先机，打破了1955年万隆会议后所建立起来的亚非各国联合阵线。这是政治性伊斯兰教向这个地区渗透所凭借的手段。从上述事实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治性伊斯兰教并没有因为这些国

家的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为他们所自发承认。系统宣扬政治性伊斯兰教的是帝国主义，当然还有反动的蒙昧主义势力和卑躬屈膝的买办阶级。左派无疑也有自己的责任，他们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而也就无法应对这个挑战。

蒙昧主义势力发起了攻势，这吞噬了政治性伊斯兰教，而强调现代性与真实性之间的错误对比则是这场攻势当中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说它是个错误的对比，是因为受到批判的现代性的内涵没有得到澄清（它是宣告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一种原则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粗鄙宣言？），而真实性则只是求助于对过去的赞美，所以我们听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穆斯林斋月期间的布道上鼓吹真实性而反对现代性。蒙博托在扎伊尔也有类似的讲法。他们两人同属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令人作呕的政治人物，他们将新富者最粗鄙的消费主义与“反西方的”话语体系结合在了一起。蒙昧主义的这一攻势，在后现代主义的鼓动之下，与新自由主义及其向帝国主义的延伸结合得密不可分。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迷失：以埃及为例

脱节的经济

当代埃及经济中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使得在今天已经严重到了几乎无法谈论“国民生产体系”的地步。

而在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期间（1880~1950年），这样的一个体系完全可以说是存在着的，它以单一的棉花种植为基础，在其之上则是贪腐横行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以及一些轻工业，它们与棉花出口一同扩张。管理这个体系的是由大农场主与外国资本所组成的霸权性的社会联盟，这个体系的成长也以少数人的消费为基础。农业既提供了主

要的出口产品，又满足了基本的粮食需求，而低价的粮食也使支付低工资成了可能。国家除了严格维护秩序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这是一种外围地带的资本主义，它无疑有其依赖性，却完全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

纳赛尔统治时期所实行的国家民粹主义建议以一种不同的、基于工业化的内在逻辑取而代之。农业的作用随即被视为要为工业贡献资金，而由此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停滞则由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缩小（这是农业改革的目标）加以弥补。维持农业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能力，甚至不惜因此损害棉花出口的增长，由制造业产品对此损害加以补偿，这样的一个目标符合整个规划的逻辑。国家在转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进行社会投资（用于现代化和工业化所必需的教育和医疗），干预收入的再分配（控制价格和发放补贴），对经济实行计划（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此提供了便利）。

在不短的时间里，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之战（第二次中东战争）到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这个模式的运转并不成功。它的迅速消亡——穆罕默德·杜依达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艾尔伊曼当时对此即有很好的认识——有其自身缺陷方面的原因，但也是帝国主义及其在这个地区的工具以色列所实施的侵略性战略的结果。

20世纪70~90年代，持续30年的“自由主义”是60年代模式解体的结果，但没有出现任何具有真正内在逻辑的模式取而代之。埃及的经济现在由一系列“活动”组成，它们彼此之间并无联系。它们各不相同的再生产逻辑更多是彼此冲突而不是相互补充的，而国家则“游离在外”，将自己的职能拱手相让给了市场，据称它有确保长期稳定增长的神秘功能。各种扭曲的现象随即出现并逐渐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这表明这个体系已经脱节。

举例而言，整体的增长日益依靠以牺牲物质基础（农业和工业

生产)为代价的第三产业来保障。纳赛尔主义的这个规划还提出了强化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以此实现国民生产体系相对于世界经济的独立,从而增强其在进入世界经济的条件方面的谈判能力。但这个主张被放弃了,受宠的则是被视为彼此无关的公司立即赢利(与私有化通常相伴的一个观点)。这两个系列的扭曲进而造成了商业性资产负债表中的赤字不断增加。与常规经济学站不住脚的说法相反,不受控制的“开放”和自由主义并不会带来对外贸易的“自发”平衡。相反,它们加剧了贸易关系中弱势一方的长期赤字,引发货币的不断贬值,进而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窃取资源大开方便之门。

埃及2000年的进口额增至486亿埃及镑,而出口额却没有超过162亿埃及镑。埃及经济不再仅仅是依附性的外围资本主义经济(以前一直是):它已经变得极度脆弱。埃及这艘大船正在没有任何指南针的情况下航行。它的船长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想知道洋流正在把船带向何方。事实上,这艘船的航向完全取决于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全球“行情”,对此埃及经济只得被迫日复一日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举例而言,商业赤字仅由随机的资金来源——侨民的汇款、旅游收入、借入的外援——加以弥补,所以完全仰仗于本国以外的决策中心。埃及加入了石油生产国俱乐部,这减少了进口(埃及国内的石油消费依靠自己生产),因而当然减少了其对外赤字,在石油产品出口方面也有出超。这个有限而且可能是短暂的好处为一股政治势力的建立大开方便之门,这股势力所遵循的是永远危机四伏的逻辑。

处于困境中的农业

农业一直是埃及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埃及人口的一半仍然生活在农村(大多数人仍是农民)。不过,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的贡献率已经从 1960 年的 33% 逐渐降至 2000 年的 17%。此外，2000 年的农业劳动力仅占就业劳动力的 29%，而 1960 年的这一数字则是 49%。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里有大量失业人口或者就业不足情况，其人数的增加无可置疑，其比重的提高也令人震惊。对过去 30 年实行自由主义期间农产品“价值”的增加必须加以质疑。官方数据显示其在 1982 年到 1997 年的 15 年间每年为 2.9%，高于人口增长率（2%）。但这一增长几乎完全是因为直至 1970 年由传统的生产（棉花和谷物）转向了更为有利可图的投机（蔬菜和水果、畜产品）。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埃及粮食自主性的严重丧失。20 世纪 90 年代埃及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超过 50% 的小麦、85% 的玉米、57% 的植物油、67% 的食糖、75% 的鱼类和 80% 的红肉的消费。不过，2000 年的稻米生产确实实现了 3.62 亿埃及镑的出口盈余。

至于粮食作物的生产，在 20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毋庸置疑有下滑的趋势。进口粮食产品以弥补这种不断扩大的不足终结了农业以前所扮演的角色：工业发展进口所需的主要偿付手段。2000 年的粮食进口额为 91 亿埃及镑，而出口额则减至 13 亿埃及镑（其中棉花出口额仅有 6.73 亿埃及镑，而以前它却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逆差因此占了埃及全部商业贸易逆差的 1/3。

缩减粮食赤字不只是项政治要求，因为这会降低这个国家面临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政治操纵之时以及三驾马车国家集体帝国主义的经济战略（通过世贸组织以及欧美各国的农业出口政策，这些经济战略继续以南方国家向其粮食出口“开放”为目标）冲击之时的脆弱性。它还变成了埃及追求工业发展的一项基本条件，这是因为由于日益增长的粮食依赖，农业贸易陷入了赤字之中，因此偿付此种工业化所需进口的能力已经减弱。

农民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纳赛尔时代的农业改革当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些影响颇为有限。改革实现了大土地主的地产向中等规模农户的转移，却忽视了无地的农民和绝大多数的小地产农户（他们拥有的地产不足半公顷）。这些改革达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摧毁大地产阶级的力量，这个阶级是埃及资产阶级上层的中坚，强化中等地产和富农阶层的实力，以此换取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支持。改革还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果，基本农业生产实现了有限但是真实的增长（因此也为埃及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粮食自主）。这些积极的效果转而强化了中层农民之间的分化，得益者是其中的较为富裕者，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现代化的装备（信贷和设备）。

合作社建了起来，农民们被迫加入（合作社负责信贷和营销，而私人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则得以允许）。它们有着不同的目的：从农业当中吸纳工业所需的资金（通过价格控制），还可能是减弱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后一点上的效果是可疑的。合作社本质上虽带有官僚机构性质，但与工会一样，国家权力机构不得不承认其成立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得不与它一起商定它的各种政策条款，所以它在这个政权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权力中心。

改革中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针对农业用地的租金设立了最高限额。这事实上遏制了通胀并导致了土地所有者土地出租租金的减少，受益者则是土地的使用者。至于农村里的无产者（无地农民）和贫农，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因规定了农村最低工资而发生的生活条件的有限改善。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这场农业改革逐渐受到了怀疑，而由于两极分化的死灰复燃，这个趋势在社会层面不断加强。官方数据显

示贫农（拥有的地产不足半公顷者）的比重从1960年的26%增至2000年的58%。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无地的农民，按照定义，他们被排除在农业用地持有量的记录之外。无地农民的准确数字无论是多少，当今埃及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2/3左右——无疑是无产者和贫农，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拥有土地。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中等阶层的农民（拥有半公顷至5公顷土地者）2000年耕种着50%的农业土地，而1960年的数字则是60%。而且虽然他们所占农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降低——这是由于穷人数量的增加，但是他们的户数和所耕种土地的数量（比如说所拥有的土地的总面积）几乎没有变化。

富农和农业资本家（包括农商综合体所管理的企业）——他们各自拥有的土地超过了5公顷——现在控制着全部农业土地的1/3以上。

每个社会阶层在农业产值中占比方面的信息很难得到，而且由于缺乏可信的收入申报，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也难以保证。不过，有迹象表明，相比土地占有，农业生产和收入的分布更加不平均，因而从自由化措施中获得好处的几乎全部是富农。这些富农中的绝大多数拥有5公顷以上的土地，虽然有些富农的土地更少，但这些土地被更加精耕细作，其地理位置特殊而优越，这些也得益于近期的发展。中等阶层的农民愤怒地指出：少数富农是国家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下所实施政策的唯一受益者。

一边是急于攫取更多土地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勃勃野心，另一边则是极为悲惨的贫农境况，中等阶层的农民害怕自己落入后者，虽然他们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遇明显改善的那些农民当中的主要部分。1971年以来，在埃及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推行了自由化政策，但它拒绝了“休克疗法”，因为它很清楚，在埃及这样的条件

下，这样做肯定会引起激烈的反对。

过去 30 年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值得我们在此进行一番回顾。

1971 年：萨达特总统颁布法令，对农业改革的“受害者”予以补偿。这样做的目的是从道德上打击改革的原则，为重新推行农业资本主义做好合法性方面的准备工作。

1975 年：一项法律授权以自由商定的地租签署佃农分成合同（此前在纳赛尔时代遭到了取缔，当时实行的是佃农制，地租法定调节）。

1976 年：合作社遭到解散，农业信贷的责任转给了银行。

1978 年和 1980 年：提高了法定调节的佃农地租上限。

1981 年：个人、家庭和公司最多允许持有的农业土地分别增至 1000 公顷、1500 公顷和 5000 公顷。

1992 年：一项法律彻底废除了国家对地租上限的干预，地租可以根据“市场行情”上涨。

正是这最后一项规定引发了中等阶层农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重新兴起。

埃及曾有过重大的农民运动，它们形成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以棉花和王室为其特征的旧体系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正在遭到削弱。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土地归于耕种者”的口号在乡村广为流传，一场首次将无地的农民与中等阶层的农民结合在一起的运动由此开启，这导致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血腥事件（如比黑尔塔姆、考佛耐格姆事件）。

1952 年的改革因此发生得非常及时，它防止了内战的爆发。但正如我所指出的，这场改革虽然满足了中等阶层农民的要求，却让贫农自生自灭。贫农对此反应激烈，他们要求实行激进的改革，这点可以从卡姆什希村所爆发的暴力冲突中看出来，这也是个有名的血腥事

件。当权者当时的镇压非常严厉，共产党人 1955 ~ 1956 年因而不再支持这个政权，这令激进改革丧失了一切的机会。

自那以来重新兴起的是中等阶层农民的运动：农村里的无产者和贫农几乎全无参与。此外，不得不说的是，这场中等阶层农民的运动对自由化措施的反应非常之慢，比如说，对 1992 年的那项法律的反应就很慢，此项法律首次视农产品和土地为“普通商品”。它近期的要求也相当温和，采纳的是驻扎在开罗的美国专家以及世贸组织的那套话语体系。它只是呼吁政府“修订”法律，仅此而已。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国家机关（包括司法体系在内）颇具技巧性，只是“逐步”实施新的法律，以此避免冲突。因此，原则上应该加以修订的 160 万份租赁合同当中，只有少量得到了相关机关的审核。政府还呼吁土地所有者们的要求不要太高，提醒他们诉诸个人暴力这个“古老的”传统已经“过时”。另一个原因则是 1973 年起向产油国的大规模移民。从埃及流向这些国家的移民数以百万计，而且由于是轮流移民，所以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从中受益，尤其是农村里的家庭，因为这些移民中的 2/3 是来自农村的中等阶层农民和贫农。

中等阶层的农民因而不仅能支付得起生活条件比如说住房的现代化，也能做得到农业耕地的现代化。各地的水泵都实现了机械化，机器取代了动物耕地，水车也几乎消失。他们的经济活动还有所扩展，涉及新的、非农业的农村企业，尤其是在交通和贸易领域。但这些从程度和效率上跟中国的“农村非农企业”根本没法相比。这些中等阶层农民当中比较幸运的那些人则进入了富农阶层。至于贫农和农村无产者，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从移民当中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们可以做点小生意，比如说买辆出租车或货车，或者用在国外工作时省下的钱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从大规模的移民当中，他们还得到了这样的好处：在生产周期中的某些时候，季节性的临时工变得非常稀缺，季节

性工作的工资相应有很大提高。大规模的移民无疑起到了推迟集体斗争的作用，在农村里如此，在城镇里也是这样，同时它还淡化了工会的血性。但看来这场移民潮正在结束。

组织化的政党显然以自己的方式对农民运动的重新兴起做出了反应。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在从北到南的所有行政区和次级行政区里，到处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聚集抗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他们的人数尤其众多，对此两个左翼政党（全国进步工会党和纳赛尔党）公开并正式予以了支持。但这些政党并未对他们进行“组织”，也不敢尝试为他们提供一个框架，以此实现统一的全国性的代表。它们极度紧张，因此它们鼓吹克制并平息了抗议者们的骚动。伊斯兰教各政党很奇怪与此保持了距离。在议会里，在它们的媒体上，它们都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表示无条件的支持，认为这些政策是对伊斯兰教的“正确阐释”，同时它们还始终表达着它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它们的信誉因此大大受损。而中等阶层的农民虽然依然虔诚信仰宗教（但远远比不上穷人），但他们信仰的却是其保守的、非政治化的阐释（私人产权“神圣”）。

这场农民运动本身因而非常分化，这令各左翼政党得以以其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出于此目的它们建立了没有什么力量的协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提出了若干温和的建议，它们可归为三类。

（1）修改租赁合同方面的法律，重新恢复地租的法定上限。这甚至不属于最低程度的“农业改革”，只是不让外国农商综合体公司拥有地权的立法。

（2）支持重建独立于政治权力、由其成员实行自由民主管理的合作社。这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消弭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投入品的价格、产品的销售和信贷等方面）。

（3）重新明确国家的各项义务，尤其是它在埃及的一项传统责

任，即决定在农地上允许种植何种庄稼。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粮食自主性。

这些建议短期内有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取信于民的，也能让埃及的农业变得比较高效，因而它顺应了中等阶层农民的呼声，也赢得了整个国家对这些吁求的同情。不过，它忽视了包括贫农和无地农民在内的所有农民应该享有同等地权的原则，这是埃及的共产主义者们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所提要求的一项主要内容。因此，当前的这些以农民运动的名义提出的建议仍然把穷人排除在外，而他们占了农村里农民人口的 2/3。不过，长期而言，这个国家核心问题的解决、有效战略的提出，全都有赖于满足中等阶层合法的要求，这一阶层的人民身处无所制约的自由主义的威胁之下。埃及的可耕地相比它的农业人口严重不足，在这点上，只有三个国家（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跟埃及一样。虽然有些地方存在着人多地少的不利条件，但整个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的却只有这四个国家。

依据所有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无地农民全都可以平等耕种土地的原则，中国和越南已经推行了激进的革命。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所以虽然其操作方式可能非常官僚化，但是这两个国家均得以维护自己的粮食自主。中国以 6% 的耕地相当不错地养活了世界上 22% 的人口。越南也是类似的情况：它以稀少的土地体面地养活了自己的人民。这两个国家都做到了尽量维护平等，这在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与其有效并加速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密切相连。耕地权平等原则本身乃至其有效实施，确实最终受到了过去 20 年里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威胁。但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孟加拉国和埃及当局从未实行过耕地权平等原则，埃及甚至在纳赛尔主义的激进政策处于其顶峰时期也是如此。摒弃这个原则除了造

成了令人震惊的社会不公之外，还导致整个社会、国家及其经济极度脆弱。因此，有史以来，投入全球化自由主义原则的怀抱已经给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至于埃及，由于粮食依赖的深化、社会不公的加剧和经济体系的脱节，它已经深陷这样的原则当中而不能自拔。

居于主导地位的常规话语体系声称，埃及和孟加拉国农业发展的失败及其整体的贫困由其“自然”条件和人口因素所造成，而以上的比较让这套说法不攻自破。

政治冲突与社会斗争

这个地区当前的政治冲突发生于三股力量之间，这三股力量分别是企图重回过去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但它实际上只是国家民粹主义时代那些官僚机构腐化堕落的后继），要求推行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力量以及正在试图以与自由主义经济管理相容的“民主”要求崛起的力量。这三个“倾向”所表达的是与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沆瀣一气的买办阶级的利益。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正在利用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冲突为自己获取排他性的利益。对关心人民大众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左派人士来说，这些力量全都不可接受。通过与其中的某股力量结盟而试图介入冲突（选择现政权而避开政治性伊斯兰教这个最差的选择，或者相反，尝试与后者结盟以推翻这个政权）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左派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必须支持普通民众的斗争，这是他们天然应该从事的事业：捍卫人民大众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捍卫民主以及捍卫国家政权，这三者被视为彼此不可分割。

快速浏览一下当今的全球局势，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什么都没有改变：马穆鲁克势力依然存在。与过去之间的首个惊人相似之处在于阿

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方行使着该国最高的权力；在有些地方，军队受到了约束，被严格置于一个受到尊重的层级制度当中（埃及），而在别的地方，它被许许多多的将军们纳为自己的私产，这些人彼此之间不断明争暗斗（阿尔及利亚）。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军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样是坚定的稳定维护者。无论如何，即使军方受到了政治性伊斯兰教的部分影响，而且它绝非不受种族或宗教多元化可以加以鼓动的离心力量的干扰，它也仍然是横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大众民族主义时代的唯一继承者，这个事实依然没有改变。因而它保留下来了尚未彻底消失的民族主义传统。因为没人把闹剧般的选举当回事，对此漠不关心的工人阶级更是如此，一个总统和平接替另一个总统，或者是通过“政变”上台，在苏丹、帕夏和马穆鲁克人统治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总是受到同僚暗杀的威胁。

毫无疑问，在摩洛哥、沙特和海湾地区的各酋长国，最高权力的转移由王室负责，而它本身又同摩洛哥和瓦哈比型的宗教机构打成一片。

与马穆鲁克的独裁之间第二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商业世界与权力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实话实说，这是因为真正的“私人部门”并不存在，没有多少自主经营的资本家对自己企业的产权感到放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鼓吹的“开放经济（*infatih*）”让某些人大发其财，埃及语为这些新冒出来的百万富翁们生造了个词。它区分了“私人（*khas*）”部门，换言之，正常和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ficdani*）”部门，也就是说，通过与权力相勾结而存在的企业。私人部门由中等规模的企业所组成，它们在经济形势和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夹缝中挣扎存活。而个人部门的营业额连年增长，但与此同时却充斥着收入分配不公的丑闻。一个亿万富豪所经营的一家有名的

埃及企业就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这家企业以不正当的手段拿下了国家的所有合同，然后再将它们分包出去，根本不把禁止这种做法的法律放在眼里。因此，阿拉伯世界所谓的私人经济在过去的 20 年里所攫取的利润大多是权力寻租的租金。

第三个相似之处在于对传统的、保守的宗教合法性加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马穆鲁克 - 买办阶级的权力越是由于屈服于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利益而受到了削弱，它就越越是急切地投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怀抱，同时也越是发力弥补因为臣服于帝国主义而造成的国家合法性的丧失。这令其所谓的宗教话语体系变得强硬起来，由此与敌对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了竞争。几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和马穆鲁克的先祖们唯唯诺诺于帝国主义的命令之时，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当然，读者们会指出上述现象并非阿拉伯世界所独有。印尼就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的军方和商界相互勾结的独裁，还有它在宗教问题上的言辞激烈。我们是否因此就应该要在其中看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以前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和当今的菲律宾在若干基本的方面也与此有类似之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视这种宗教的、文化的、保守的、军方和商界相互勾结的独裁模式（马穆鲁克 - 买办阶级的或者说持租者的独裁模式）为“欠发展”的产物，不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时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是理解为资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全球扩张的另一面。资本的这种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不是现代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实现民主的可能性），而是现代化的反面，也就是独裁和贫穷的现代化。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要与全球体系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势力展开斗争，而非跟在其后亦步亦趋。

无论如何，100 年前，甚至 50 年前，人们都无法想象马穆鲁克式的独裁会在当代的阿拉伯世界卷土重来。相反，这一页似乎已经永

远翻了过去。

在第一个阶段，阿拉伯世界——至少是其位于埃及和叙利亚的中心地区——看来已经启动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过程。19世纪的穆罕默德·阿里和随后的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似乎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1919年的埃及革命是这个过程的首次强烈表达。这场革命的诉求最为接近于阿拉伯世界历史上已知的世俗主义，它的口号是“宗教归于上帝，祖国属于大家”，它所选择的旗帜上既有新月也有十字架，这些都并非偶然。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坦志麦特改革也开启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为阿拉伯各省所继承，帝国衰落之后，它们还在继续推动这场革命。宪法、民法、“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议会选举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在缺陷和不足，但这个社会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裹足不前，这很容易解释，相对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地的反动爪牙，当地的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社会危机其实也在加剧，阿拉伯世界徒劳无功的现代化的首个时期由此最终结束。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众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得了成功，阿尔及利亚在进行革命，这些让人们觉得，通过实施更加坚定的反帝政策（在苏联的支持下）以及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社会危机似乎可以得到根除。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原因在此不做分析，其中包括这个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制约，以及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逆转。

前现代独裁国家此时重新浮出水面，而整个社会与一个世纪前甚至半个世纪前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可比性。

当今的社会危机与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前相比要严重得多。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总体而言比以前“更穷”。相反，真实平均收入方面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也并不是说社会中的财富分配比以前更不平均。

这个领域的关键变化是过去 50 年里埃及中产阶级的扩大：从占这个国家上层人口的 5% 扩大到占 15%，从占有所有社会构成阶层的 10% 扩大到占 30%。无论如何，已经发生的现代化也是贫穷的现代化。

危机的深度对应于阿拉伯世界城市化的程度，它成了其关键指标。阿拉伯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不过，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并非农业和工业共同发生革命的结果，它或多或少类似于成就了资本主义的西方或苏联世界的人口转移，或者当代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人口转移。它实际上是既没有发生农业革命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结果。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惨状仅仅是转移到了城市当中，对此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无力吸纳。这场危机所表现于其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同 100 年前或 50 年前的阿拉伯世界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随着大众民族主义时期的结束，信誉扫地的一党制让位于多党制的井喷式出现，世界上的媒体赶紧称此为民主发展的肇始，而这样的民主发展自然且显然受到了时尚人士设想中的市场开放的推动。

此处的悖论是多党制的井喷却又伴随着朝着马穆鲁克式独裁的巨大倒退。

纳赛尔政权有意地对埃及的政治实行了国有化（将政治实际上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它以残暴的镇压压制了活跃的政治力量和公共舆论分裂而成的两个极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一端，另一端则是共产主义者。这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伊斯兰教在纳赛尔时代不得不逐渐进行填补，而从 1970 年起则以暴力的手段介入。纳赛尔对爱兹哈尔实行了现代化，这提高了宗教机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确实为其所渗透，而中产阶级则是伴随着教育和就业的改善破土而出的民粹主义的关键受益者。爱兹哈尔显然受到了驯化，它没有表露出任何让这个政权感到不安的迹象；那时它的宗教裁

决在为“社会主义”进行声辩。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有时想着要在这个政权面前表现自己，但它反对纳赛尔政权对自己的压制，尽管对它的压制始终摇摆不定，这是因为许多的自由军官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穆斯林兄弟会被正式解散，但通过各种“宗教组织”，其存在仍然受到了容忍，而这些组织也愈发渗透到了国家机器当中，尤其是教育、法律和媒体部门。

1970年纳赛尔死后，萨达特决定向右转，这时在海湾国家石油和金钱的支持下，在美国外交的公开支持之下，为把政治性伊斯兰教突兀置于聚光灯下的舞台已然备好。代价则是纳赛尔在1967年战败后所启动的“开放”政策，这为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铺平了道路，随后就是打破与苏联的联盟，最终则是前往耶路撒冷之旅（1977年）以及这之后的《奥斯陆协议》（1993年）。

尽管如此，让法律批准实行受到控制的多党制（1979年）仍然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个制度开始时仅限于三个“论坛”，即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同盟的左翼、中间派和右翼。未做改变的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令其凌驾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上。新批准的且受到控制的民主（“选举”必须保证总统在军方的认可下永远大权在握）是与美国协商而定的，美国对总统予以了首肯（根据1991年埃及政府与国际开发总署之间达成的协定），这让华盛顿得以向埃及政府颁发了一张民主证书。

对于这些出于政治考虑而出现的“政党”，人们因而无法寄予许多的幻想。全国民主同盟并不比它所继承的社会主义同盟更具存在感。后者甚至并不享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典范（苏联、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合法性，它只是对它们的一个可笑模仿。在因为大权独揽而导致境遇恶化之前，这些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了真正的革命。相反，埃及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群没有什

么信仰的机会主义者，只是便于开明的专制者加以利用罢了。埃及的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在1965年自行解散，许多好战分子对此有些不舍，但其解散并没有带来这个制度的任何可观改进，因为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这个（对它的）“威胁”具体化。

新出现的政党当中，全国进步工会党试图动员起纳赛尔派的左翼，它还是埃及共产党的继承者，但它因为纳赛尔派的背叛而遭受了打击。陈旧的纳赛尔派对过去充满怀旧之情，对新挑战的本质却无力理解，所以他们仅仅满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高谈阔论，他们因而启动了与伊斯兰分子的和解过程，后者也很喜欢只是高谈阔论。尽管如此，全国进步工会党将仍然是重燃名副其实的政治辩论的希望之所在，但前提是它能成功恢复它一直以来尽力压抑的好斗传统。

艾迪尔·哈桑所组织的工党（他本人于2001年去世，继任者是他的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动用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但心中更加不安，而其领导人则表现得好像他是穆斯林兄弟会那些传统的领导者们的敌手。

截至目前，埃及各政党的政治民主并没有超越有限的竞选活动。这些政党放弃了任何形式的行动——这也为政府所正式禁止——而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所以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它们具有取代现有统治者的潜力。它们没有形成可信的替代性方案，只是不时对政府的行为批评批评而已。

这样的政治真空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政治迷失，这助长了马穆鲁克式独裁传统的重新巩固。此种迷失最为令人不安的表现出人意料地出现于1999年的议会选举期间：一小撮所谓的“独立”候选人大大利用这种状况为他们所提供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是反对派，甚至都懒得把自己伪装成反对派，而是为那么一类企业家——从国家那里获得资

金（马穆鲁克体系的典型特征）——代言的候选人，他们往往竭力形成一个游说集团，强大到足以趁着大多数民众漠不关心之时“赢得”选举。埃及人民马上称他们是“鲍尔塔古伊（baltagui）”，这个词准确地说明了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粗野的乐队领唱”，另外它还有各种言下之意。自由派的“学者们”，其中就有美国人，对此欢欣鼓舞，称这标志着“一个由企业家所组成的资产阶级的诞生”，他们很可能可以误导无知的外部舆论，却骗不了埃及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显得能够替代真正的权力——军方的权力——的唯一力量就只有穆斯林兄弟会了。不过，除了性质相同的独裁权外，宗教机构在其中取代了军方的位置，穆斯林兄弟会并无任何政纲。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各个基督教民主政党并无相似之处，尽管人们有时想让它们显得如此。至于其他的方面——追随着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地方上着眼于赚钱的买办阶级——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华盛顿的外交实际上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必要时是个替代性的解决办法的原因之所在。

纳赛尔所实行的是开明独裁的有计划的统治。这个政权的社会经济事业是真实的，其实施也是坚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虽然以警察的力量为其后盾行使独裁统治，却不得不兼顾而且确实也兼顾了各种社会力量，它们表现为工会、学生运动、专业组织、农村合作社、媒体和知识分子。纳赛尔给这些机构取了个名字——权力中心，而他使用这样的政治语言则证明他承认了这些权力中心的重要性。

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曾有 2.5 万个工会委员会（它们现在还在），它们被整合成了 23 个工会，形成了单一的工会联合会（埃及工人总工会）。这个团体聚集了 300 万~400 万真正的会员（由于埃及只有 1500 万~1700 万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实际的会员数很可能少

于这个数字，但其人数仍然可观，因为这个数字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工作于现代企业中的受薪雇员）。纳赛尔政权赋予了工会真正的权力，不是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权力（这种权力只是表面文章），而是管理劳动力（职位等）和生活状况（住房、消费合作社等）的权力。工人阶级放弃了“阶级斗争”，由此所获得的补偿是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不过，尽管这个政权通过向全国层面的管理层委派忠诚的代理人而取得了对工会的有效控制，好斗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于基层当中（在2.5万个地方工会委员会中）。这解释了到目前为止为政治性伊斯兰教鼓与呼的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多大影响力。

如今的状况如何？首先，1970年以来受到公开鼓励的出国打工潮当然削弱了斗争的力量。如果人们在海湾国家，在利比亚或伊拉克，工作几个月就可以收入颇丰，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抗争——其所得最多不过是少得可怜的工资增长？出国打工鼓励人们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却削弱了集体的抗争，这通常都是如此。既然出国打工之路现在已经关闭，那么是否出现了可能重新回归集体抗争这个埃及传统的迹象？新的法律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进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由此为大规模的失业铺平了道路。这项政策造成了人们的贫穷，他们在过去应该是会愿意为此而进行抗争的，但到目前为止，这项政策尚未引起全球化体系的领导者当中那些民主斗士们的什么兴趣。

许多迹象表明斗争正在恢复之中。行动，往往是暴力的行动，可以说是数以千计而非数以百计的，但这些行动始终都是分散的。1998年，这个国家最大的那些企业里发生了70起罢工事件。每起罢工事件当中，难以隐匿的是特别警察部队的强力干预。有些地方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些事情鲜有人提及。各政党对此三缄其口。没有人——当然甚至是伊斯兰分子也是如此——愿意承担与这些斗争沾上

边的风险。工人阶级的斗争依然是孤立的，但这些斗争并非湮没无闻，也非不受欢迎。

在农村地区，纳赛尔政权通过 1.5 万个左右的投入品采购和消费合作社进行运作。这些合作社尽管有赖于部分中等阶层的农民，而且它们受较为富有者的影响最大，但它们不像人们往往想象的那样是农业部部长所做决定的记录者，而是自己的意见会被加以考虑的合伙人。这可以避免冲突，也可以避免边缘化农民当中穷人阶级的抵抗。

新的自由化政策——压缩补贴、信贷自由化及利率从 5% 增至 14%、土地出让金率增加了 3 倍，最后还有土地所有者与佃农之间关系的自由化（此前佃农的权利可以通过续租得到保障）——瓦解了合作社运动，让富农变得更富而中产阶级变得更穷。伴随着这种改弦更张的是频繁但孤立的暴力反抗，可它们没能防止这些自由化政策的实施。1993 年，全国进步工会党的确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农民联盟。不过，在受到行政当局的骚扰之后，它最终退却。当然，这并未阻止大多数佃农的抗议运动在 1998 年里迅速增加。尽管如此，政府的反应却颇具技巧性，以牺牲一些派别的利益向其他派别做出让步，通过运用这些策略，它瓦解了这场运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穆斯林兄弟会以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名公开支持土地的所有者们，它是否因此“错过了”借力于对宗教话语体系始终敏感在农村社区的机会？事实上，穆斯林兄弟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故意跟农村里的富人们走在一起，正如它与城市里的买办阶级打成一片一样，因为它所主要考虑的是维护它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与美国外交之间有效媒介的形象。它的话语体系所针对的只是中产阶级（这一点可以从它在专业协会中所付出的努力当中看出），这是因为它让“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去贫穷的中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那里招募喽啰和打手。穆斯林兄弟会没有试图去捍卫或者遣

责这些组织，这表明它知道这些组织所从事的活动会令国家不稳定，而这在客观上巩固了它自己作为“改旗易帜”的候选者的地位。穆斯林兄弟会不断在说服与其展开对话者相信，一旦它大权在握，凭一己之力，它就能彻底根除这些“恐怖主义的”行径。

政治性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和行动因而优先针对的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扩张令这些组织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格外具有影响力。这个国家有23个大型的专业协会（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药剂师、教师协会等），会员达几十万之众，同时它们还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地方机构网络。纳赛尔政权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即控制了这些机构，它们构成了民粹主义社会经济增长主要受益者当中的主体。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为政治性伊斯兰教提供了机会，令其得以在许多这样的协会当中承担领导角色，这是由于各个党派之间缺乏一般性的辩论。1993年，国家为此制定了相关法律，从而再次实现了对这些充满敌意的协会的控制。官方的话语体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煽动性，但它准确揭示了这些协会已经变得多么的“政治化”，而这是以捍卫它们所代表的专业的真正利益为代价的。捍卫这些利益是否会进而引发其与国家的自由化政策之间的冲突，这仍有待观察。而冲突则有可能成为大有前途的军事行动的起点，这将有利于埃及的左派。

社区生活的勃兴将在下面进行讨论，但这为新的“商人”协会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历史悠久的工商协会遭到了纳赛尔的封禁，商会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失去了其功能，所以这些新的商业协会填补了真正的空白。人们经常谈论它们，把它们拿出来作为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证明。实际情况却与此迥然不同，因为这些新的协会只是涵盖了一小撮“政治寻租者”。不过，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能量却不可小觑。他们被视为“贤能之士”，有时甚至在某些不愿让步的部长们的反对之

下强行让自己的观点（保障他们自己个人收益的政策）得到采纳。

在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在整个的第三世界，学生运动在传统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几十年来，它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力量发挥自己影响力的平台。甚至在纳赛尔政权的辉煌时期，那时这个体系被赋予了声望和敬重，追随纳赛尔主义的学生们本身仍然认同于这个政权的左翼。他们属于这样一批人，这些人在1967年战败之后被动员了起来，为这个政权的激进化摇旗呐喊，而纳赛尔自己却选择了通过启动开放政策向右派做出让步。

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学生运动——至少目前为止如此（正在进行的“革命”可能改变这点）。当然，当代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见证了变化，但其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而且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战后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带来了中产阶级的极大扩张，另外还有人口的增长和大学院校数量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为这个去政治化过程承担责任。不过，这个过程往往由于各国当局所进行的系统镇压而变本加厉。埃及的情况就是如此。纳赛尔执政之前及之后，埃及政府动用大量的外部资金（来自海湾国家）有意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各所大学里确立其地位，其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不仅如此，纳赛尔对爱兹哈尔大学所实施的“现代化”改造为蒙昧主义分子在此大放厥词铺平了道路，这些人也要为此迷失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变的事实是大学依然不时陷入动荡之中，但起因则全部是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事情（支持巴勒斯坦人在以占区连续两次发起的暴动），而对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批判却再也无法将学生动员起来。社会危机的加剧、中产阶级状况的恶化和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缩减强化了学生们的生存本能，再加上教育质量的退步导致年轻人的分析批判能力退化，学生们就更加忙于苟活。伊斯兰教的渗透是这种迷失的结果而非原因。

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媒体、知识分子、艺术家（尤其是电影制作者）和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始终存在并且颇为活跃。在纳赛尔时代，《金字塔日报》——当时由侯赛因·海卡勒掌管——被认为是“权力中心”之一，享受着开明独裁者一定程度的容忍。尽管其报纸《金字塔日报》（一份有着125年历史的日报，在质量方面足以与世界上的顶尖报纸相媲美）和其智库保持了很高的质量，但这些媒体目前在埃及社会中却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大众传媒——尤其是各家电视台——彼此竞争，以图垄断空泛的官方话语体系以及同样平庸和蒙昧的伊斯兰教宣传。少量“独立的”电视频道（尼罗河电视台）进行着自我审查，自己的潜力因而遭到了扼杀——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黎巴嫩庞大的政治电视频道网络是个例外。卡塔尔新的电视机构（阿勒卡利杰电视台）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辩论激烈的电视节目，但这家媒体的各个频道小心翼翼地向任何左派的激进批判关闭大门。阿勒卡利杰电视台现在已经露出了它真实的面目，对北约的干预和瓦哈比教派的反动计划表示了支持。埃及仍然保有其引以为荣的高质量的电影产业，尽管大规模的商业制作往往掩盖了它的存在。文学——埃及产生了大量的小说家，他们大多能力出众——也具有相当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电影和小说构成了埃及残存的批判分析性政治文化当中的中流砥柱。

民主管理的缺乏反映在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之中——政党、工会、专业协会（以及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社区生活中，这点将在后面讨论），这是埃及的一个主要的负面特征，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领导这些机构的是多少有点赶不走的“具有历史影响的大人物”而不是战斗者。

为了完整绘制这张斗争图谱，值得指出的是最为贫穷的阶层所发动的新型斗争正在日益涌现，由于这些斗争独立于上述那些显而易见

的组织，所以它们很少为人所注意。街头小贩、停车场管理员和棚户区居民所构成的世界不再是“无组织的非正式部门”。这些贫穷的社会阶层在开始时遭受攻击，他们被指责违反了各种正式的规定，但他们最终通过团结一致的行动站了起来，让自己的声音得到了倾听，以致国家虽然原来打算拆除开罗市内简陋的棚户区，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代之以实施各种开发项目（供水、道路工程等）。

在对上述埃及政治和社会斗争图谱推而广之以涵盖整个阿拉伯世界之前，对各国彼此不同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渊源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若干类似的趋势。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共同点在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它们开展了一系列在基本结构方面彼此非常接近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验。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启动了这些实验。不同于埃及，这两个国家这方面的事态演变由自由军官的军事政变引发，他们没有任何政党方面的准备，所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依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政治组织的中心（而埃及的社会主义联盟则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叙利亚和伊拉克政权的军事本质导致了它们的军队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或它的分支机构）所渗透。在埃及，纳赛尔不顾自由军官中多数领导者——他们大多颇为反动——的反对，逐步强行推出了民粹主义的政策，但上层的这些冲突始终没有蔓延到普通军官那里，他们仍然听从命令。埃及只有一个法老，正如古代中国仅有一个皇帝。因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模式中所盛行的体系颇像一个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队和商人所组成的独裁复合体，阿拉伯复兴主义（开始时是阿拉伯主义）的辞令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宗教话语体系在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这种模式的独裁权与政治性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因而变得愈发暴力，而在埃及，彼此角力的这

两股力量在后纳赛尔的体系当中相互渗透，它们之间运作的方式并不相同。

由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模式至少在开始时有着真正的政党基础，所以它的独裁做法随即变得“更加有效”：迫使持有异议的政治组织乖乖就范（正如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至少部分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击溃对手（资产阶级自由派、不肯就范的共产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绝对遏制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压制草根层面的所有活动，比如说工会活动），而埃及政府则不得不敷衍着它们。这个体系的弱点可以归结于其他同样客观的因素，尤其是这个地区具体的特点以及这两个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对此种多样性的管理如果说并非全无技巧，那么也至少可以说存在着问题，即在任何情况下毫不考虑民主原则。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人格缺陷因而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哈菲兹·阿萨德，叙利亚一个有耐心、有手腕、有头脑的领袖，他碰巧有正面迎击以色列对外扩张的直接经验，对其战略野心他做到了以坚决的抵抗加以遏制，没有落入美国外交所制造的“谈判解决”的幻觉之中。至于伊拉克，一系列凶残的军官——从阿卜杜勒·萨勒姆·阿里夫到萨达姆·侯赛因——则导致这个国家陷入了它现在所身处的悲剧性的两难境地。

最初的民粹主义已经淡去，但它有可能以正在进行的“革命”为背景再次出现。军队与商人的复合体已经着手于“开放”，虽然未经证实，但在公共舆论的眼中却显而易见，所以值得以某种方式加以确认。社会的原有认识以及相应的泛阿拉伯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因而遭到了削弱。政治和社会斗争正在积极重新浮现。叙利亚有一千名知识分子签署了要求实行民主的请愿书，而他们却并没有受到镇压（这可是件新鲜事），这很可能预示着新的起点。

阿尔及利亚有着不同的历史。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这个国

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更为深入，因为民族解放阵线是个真正的、强大的政党，在这个意义上，它同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不相上下，虽然它的特点是它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限于民族主义的吁求）、它对社会的认识（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的社会内涵。类似的，可以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意识是这场斗争的结果，也可以说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和民族解放阵线因而已经成为一体。

悲剧源于民族解放阵线很快为民族解放军（一支边境部队，此前并非民族解放阵线开展斗争时所主要依赖的力量）所取代，这从1962年7月即已开始，也很可能更早，随后则发生在布迈丁时期，军队被推至权力之巅，掌握了最终的决策权，这毁掉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和声誉。阿尔及利亚的民粹主义在布迈丁死后戛然而止。军方选择了查德利接替布迈丁，此后军队便不再团结守纪，因为每个将军都攫取了军队和商人复合体中的部分权力——就像马穆鲁克国那样。阿尔及利亚进入了动荡、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反复的社会斗争时期，这带来了最坏的（到目前为止的现实）但同时也是最好的结果（舍此即为假装出来的、毫无根据的乐观）。

这是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很可能比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更为渴望政治和社会民主。他们对民主的渴望当然可以归因于他们曾经受到的殖民统治，归因于他们话语体系的含糊不清，归因于他们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抵抗。甚至在布迈丁短暂执政的辉煌时代，民族解放阵线也无法真正遏制人民的这种渴望。1964年的《阿尔及利亚宪章》（是对纳赛尔模式的真正模仿，颁布于1961年），经过1976年的修订，确立了若干旨在融合社会利益的主要原则，由于据称这些社会利益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它们在此前并未得到承认。

因此，在现实中，对其他“权力中心”也不得不加以承认（以埃及的那种方式）。首先就是工会，它们很重要、很活跃而且要求很

多（至少基层如此），在以官僚方式设置的各个部门里都有具有反叛精神的斗争者。由于被置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之下——这并不合适——因而最近几年里它们已经变得很活跃：现在每年都有几千起的罢工行动和“事件”被记录在册。此外，农民在殖民时期和解放战争中遭受了残酷的对待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尽管开始时人们对在20世纪60年代从殖民者那里收回的土地上实行农民的“自我管理”寄予了厚望，但他们无法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布迈丁所宣称的“农业革命”是个具有约束力的官方命令，并不依赖于任何农民运动的支持。后来它被悄无声息地打得粉碎，正如此前它被悄无声息地“炮制”出来。农民问题改头换面地表现为种族的多样性——集中体现在柏柏尔现象的长期存在。但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设计很不合理的阿拉伯化政策的组成部分，对这个真正的多样性的处理存在着极大的问题，独裁政权遵循其传统做法又始终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唯一的结果也是让这个问题通过多场危机爆发出来。

昭示着危机的另一场大爆发发生于1988年，其形式是城市底层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未来，由于新的自由化政策的实行，社会民粹主义已经荡然无存，所以他们原本已经非常悲惨的境地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这并非一场“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非“农民起义”或者要求政治民主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它实际上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一场大爆发，这个社会阶层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并无任何组织传统，他们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文化。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这场大爆发以僵局告终，它导致人们诉诸1992年的选举。“伊斯兰运动”的幕后指使者们很聪明，他们足以明白这个过程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机会。愤怒的选民选择了向统治当局说“不”，他们对伊斯兰分子表示了欢迎，这些人因此得以把自己

表现为唯一可以看得到的替代者。他们的运气颇好，因为统治当局选择了反击，但事实证明他们无力重组，或者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打算。阿尔及利亚由此陷入了地狱般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恶性循环由彼此对立又相互勾结的两派所造成，它们希望留给人民的唯一选择是在它们两者之中进行非此即彼的挑选。没有必要多说伊斯兰分子宣称对其负责的那些暗杀事件，尤其是针对记者、教师和民主艺术家的暗杀事件，这些人士本可成为人民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正当的选择。没有必要回顾米蒂贾的村民所遭遇的屠杀，这让农商投机分子得以用零价格买下这个国家最好的土地。不同于几个外国分析者的观点，正是雅斯米娜·卡黛哈的小说看穿了事情的实质，即到底是什么逻辑支配着人们选择了政治性伊斯兰教。

不过，1988年的大爆发所造成的震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从1989年开始，法律即授权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改革。实施了登记的有50个政党和5.5万个协会。不仅这些数字让观察人士咂舌，人民对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无限渴求也显而易见，同时隐隐若现的还有这样的一种客观可能性，即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围绕在潜在而言最为有力的“第三股力量”周围开花结果。这种可能性目前为止并没有变为现实，而其原因则难以为人们所接受——重新复活的“具有历史影响的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个人冲突。许多协会确实投身于民主和社会改革斗争之中——捍卫人权、反对酷刑和蓄意谋杀、呼吁修改家庭婚姻法、为柏柏尔人的文化权呐喊，等等——但它们的大量涌现无法取代领导者的根本性短缺，正如此前所指出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同样无法替代领导者的缺乏一样。

不幸的是，阿尔及利亚所缺少的是一个团结的广受欢迎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够在各个方面形成取而代之之势：确定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那将不纯粹只是豪言壮语，或者只是表达对民

粹主义的怀旧之情)，确定新的公民权即民主权利的具体规范，确定现代的国家性，既是阿拉伯的，同时又尊重柏柏尔的现实，确定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彼此冲突的利益之间如何达成妥协，确定国家的作用以及如何与全球体系发生联系。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说到苏丹，它表现为两个主要的矛盾，半个世纪的暴力行径没有为它找到解决之道，而且将来也不会找到。而事实证明，执掌大权的政治性伊斯兰教同样无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个矛盾在于阿拉伯的、伊斯兰的北方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苏丹的农村地区受着两个兄弟会的严密管理，这两个兄弟会是安萨尔兄弟会和卡特米尔兄弟会，它们所实行的管理模式盛行于从塞内加尔到红海的非洲萨赫勒地区。

两个主要的政党（马赫迪派和国家民主党）与这两个兄弟会的前沿人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构成了历史上实际存在于苏丹的伊斯兰教），因而虽然它们除了以现在的方式管理这个社会之外别无雄图大志，但它们仍在任何选举当中都能保证自己获胜。与此相反，城市部分则有着让人吃惊的发展：那里有力量强大的工会（尤其是铁路部门的工会，铁路行业对这个面积广大的国家至关重要），有冲锋在前的学生联盟，有专业协会，其成员是活跃的、民主的中产阶级（这在阿拉伯世界里是个例外，几乎独一无二），有蓬勃兴起的社区生活，其中包括了女权运动，还有共产党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

这是个无解的冲突，因为要解决这个冲突就必须改变军事独裁体制，它的背后聚集着上述两个兄弟会，而它所面对的则是人民大众汹涌的民主抗议，这有可能推翻现有的这个制度。

苏丹的第二个矛盾是阿拉伯的、穆斯林的北方的 3000 万居民与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南方（占人口的 1/4 ~ 1/3）之间的对立。苏丹政府除了常年挑起战争之外无力解决这个冲突，而在民主、地方自治

和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想出解决的办法并不困难。北方所有的民主力量，其中尤其是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甚至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超过几个月），在它们行使着权力的地方，它们已经将其付诸实施，但反动势力却从中作梗，随时准备着把这些民主力量推翻。南方的政治势力也赞同这个解决冲突的办法，它的军队——由约翰·加郎率领——被命名为苏丹人民解放军（并不是指要脱离苏丹），这并非偶然。随着南苏丹的独立，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

政治性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成功介入，原因在于反复失败所带来的意志消沉，在于沙特资金的大量注入（通过强大的商人阶层的中转，这个阶层本身隶属前文所述两个兄弟会），还在于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宗教狂热分子哈桑·图拉比的手腕高超。他绕过了那两个兄弟会，直接与（尼迈里的，后来则是巴希尔的）军事独裁政权结成了联盟，梦想着（或者说在实际上是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假装梦想着）“清洗”并“瓦哈比化”政治性伊斯兰教（因此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因此，军队和伊斯兰教合二为一的这种独裁统治动用着各种资源，其意图在于实现“现代化”并终结历史上的兄弟会伊斯兰教的“宽容”。这解释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何以出台：禁止自由集会活动（1992年）、限制社区生活（尤其是蓬勃兴起的各种组织，它们负责在这个饱受战争和饥荒蹂躏的国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1995年的法律）、钳制媒体（1996年的法律），等等。不变的事实在于，所有的这些图谋，即以新型的“现代”机构网络——受到图拉比个人权力的控制——取代遭到禁止的民主组织，严格来说并未产生任何的结果。少量似乎挺过了大屠杀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完全为两个兄弟会所再次吸纳。

显然，这个政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所作所为只能以灾难告终：确实完全受制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的那套逻辑，以致完全是在滑稽模仿军队、伊斯兰教和商人部落的政治讹诈。苏丹当权的政治性伊斯兰教只能加剧所有这些问题而无可奈何。

面对这样的迷失，苏丹政权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让南方战争的硝烟自行散去，让西部所有的省份（科尔多凡、达尔富尔）——主要居民是穆斯林——和东部各省（卡萨拉）以一种半脱离这个国家的方式接受着统治。这个政权主要考虑的是维持这样的一种表面现象，即它仍是首都及其临近地区大街上的主人。它首要的成就是建立了所谓的人民防御和学生安全网络，从无业游民那里招募人员，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只是像伊朗革命卫队那样恐吓人民。

这个制度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完全丧失了任何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在政治上并不允许继承。除了那两个兄弟会之外，苏丹的任何伊斯兰教政权都将非常难以在苏丹扎根，这与伊朗不同，那里的伊斯兰教学家政权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国教（此处是什叶派）的支持，一整套的制度由此建立，以此主导着这个国家，这迥异于沙特阿拉伯，它的王室连接着部族的合法性和瓦哈比版的伊斯兰教（也与摩洛哥形成了对照，它的王室就其性质而言既有民族性也有宗教性）。

民主抵抗运动并没有死去。它活过了政治性伊斯兰教的所有残酷镇压。不过，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迫流亡埃及，那里有苏丹全国民主联盟，这个组织 1995 年在阿斯马拉创建，它合并了所有在苏丹遭禁的政党和组织。埃及从来没有想过视苏丹国籍者为外国人，因此它接收了大量的苏丹移民，其数量估计至少有 200 万之众（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他们显然是在躲避自己国家日益下滑的经济生活）。无论如何，这个潜力巨大的联盟却没有任何的宏伟蓝图，这使它无力对斗争运动——依然没有连成一片，却频繁爆发于本国之

中——进行协调，也无法推动它们取代现有的政权。

摩洛哥王室建立在民族和宗教两重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它鼓励民主改革，只要这能让其国王感到高兴。另外，这些改革措施还有这样的好处，即它们不会威胁到当地的主导阶级和全球体系。不过，不应忘记的一方面是事态的这些积极进展所孕育的希望，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危机的种种症状——这类的民主无法使之得到缓和，这两者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可能终有一天会引发一场大爆发。

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埃及、突尼斯和伊拉克，民族解放斗争被迫与当地的王室保持距离，甚至还要反对这些王室，而摩洛哥的情况则不同。独立党——这场运动中的保守派——长期主导着政治舞台并且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目标仅仅是恢复摩洛哥的主权和王室。现代派则对王室有自己的看法，但它被迫保持了沉默。无论如何，现代派在这个国家有着不错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力量强大的工会，虽然经济自由化和失业率攀升对它造成了影响，但它势力依旧。工会甚至守住了自己的自主性，不仅相对于国家（它从未试图压制工会——因为它并非一个民粹主义的国家），而且也相对于自己的政治盟友和捍卫者（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它后来变成了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还有共产党，现在称进步与社会主义党）、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本身——它渴望获得部分为法庭所垄断的权力，以及处于边缘的商业资产阶级集团——它们本身也被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

王室向这些势力做出了逐渐让步，其所经历的阶段众所周知：从1963年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到1962年和1996年两次对宪法进行的修订，从首次“民主”体验（也就是说，接受通过相对公平的选举所选出的政府）到1998年的再次体验，后一次选举让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及其领导人阿比达尔·拉赫曼·尤瑟夫进入了政府，据说这个体制正在发展成为议会君主制。别忘了，英国女皇难道不是英国国教

圣公会的首领吗？

摩洛哥当局因而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与其近邻阿尔及利亚不同，摩洛哥的中产阶级没有“身份认同问题”。顺便说一句，根据城（城市地区及其临近的乡村）与乡（偏远的乡村，主要居民是柏柏尔人）相分离的传统原则，摩洛哥的这个制度管住了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而没有引发这个国家的分裂，而国王则不断赢得各个部落对他的效忠，但从没有触动地方部落首领的自主权。摩洛哥的这个制度还主动推动柏柏尔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为它从不认为阿拉伯性、伊斯兰教和柏柏尔的现实这三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性伊斯兰教正在试图取得突破，一如它利用其他问题大做文章一样，但它所面对的难题是这个制度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目前为止它还无法对此提出质疑。不过，另一方面，统治者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届政府，甚至那些确实可以为自己的民主合法性感到自豪的政府，全都不曾试图越出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这个雷池一步。因此，如果这个国家城市里的穷人，现代资本主义新的受害阶级，也在不断发动起义的话，这绝非偶然，在主要的民主力量的沉默中，这些起义遭到了压制或者暴力镇压。但这还能维持多久呢？

在所有的当代阿拉伯政治家当中，布尔吉巴最具世俗化的信念——虽然并非民主信念。他的继任者本·阿里萧规曹随，同时又实行着令人作呕的警察独裁（以防止伊斯兰教的渗透作为借口），并尽一切可能为自己的家人和亲信攫取本国的所有财富。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突尼斯和摩洛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但根据这两个国家里政治经济批判人士的分析，它们的成功非常脆弱，因为它主要建立在旅游业的基础之上。两个安全阀的存在推动了它们追求这个模式，这两个安全阀一是欧洲的部分工业——

比如说成衣业——转移至海外；二是本国人前往国外务工。现在这两个阀门已经关上，暴力因而不再可以避免。这使突尼斯人民得以把本·阿里逐出这个国家。

参考文献

- Amin, Galal (2001) *What Happened to Egypt* (in Arabic), Cairo, Dar Al Shorouk.
- Finkelstein, Norman (2000) *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London, Verso.
- Fondation Abderrahim Bouabid (2010) *Le Maroc a-t-il une Strategie économique?*, Rapport 2010, Rabat.
- Gouda, Khalek, *Mahmoud Abdel Fadil*, writings in Arabic magazines and journals.

结论：巨大的挑战

本书的大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写作于2011年的大爆发之前，而这场大爆发的重要性则促使我在第一章中对其进行分析。

第五章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和斗争，我们——如果并非所有的“外国观察人士”——从中可以理解这场大爆发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的分析也强调了这场斗争依然陷于混乱和僵局之中。在第五章中，我从一开始即提出了以下问题：这场斗争会被政治性伊斯兰教所“利用”还是能够从逆潮流而动的幻觉当中解放出来？这场斗争能否团结在一个积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蓝图周围，从而真正替代现有的体制？

2011年的这场大爆发令我们有可能想象将会出现替代性的制度，针对这些挑战做出有效的回应。但挑战是巨大的，这场运动并非没有可能陷入泥沼或者失败。这可能会是因为像过去的40年那样的衰落期会延缓明晰的替代制度的形成。在这样的时期里，批判性思维也会由于社会的衰退而受到影响。阿拉伯复兴运动是它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回应的源头所在，它混乱不堪的思维表明了纳赛尔主义，还有国家民粹主义的其他那些表现形式——它们在1950~1980年间处于阿拉伯舞台的最前沿——存在着悲剧性的不足，对此我在第五章中也进行了分析。那么，这场运动也会因为过去40年里批判性思维

的诸种不足和混乱不堪而悲剧性流产吗？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这不只是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这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里所有激进左派所共同面临的挑战。这是因为普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令世界各地的人们陶醉于“自由主义的病毒”（这是我2004年作品的书名）之中不能自拔。这个病毒让其受害者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这个错误的观点深信不疑，而恰在此时，这个制度却已经病入膏肓。它已经成了多次野蛮入侵的代名词，而且它也不再具有保证其再生产稳定进行所必需的合法性。接受这种混乱的再生产的各种要求，也就是要向这种制度投降，因此有必要辅以对蒙昧主义的支持，具体要视情况的不同，表现为宗教、种族或社群方面的蒙昧主义。对“拜金主义”的普遍臣服——美国在这方面开了先例——伴随着向各种形式的蒙昧主义的倒退。在此背景下，我以“蒙昧主义的国际化”作为我文章的标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商业和宗教这两类彼此互补的异化相互联姻，这反映在既支持对“市场”的臣服，也支持神权国家计划（“政治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这对所有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社会进步和采取必要的反帝立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老态龙钟的资本主义出现了衰落，即“资本主义的秋天”已经来临，但这并不会自动带来较好的、替代性的前景——“人民的春天”的逐渐形成。这两件事可以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可能不是。不过，如果两者合二为一，则除非而且仅有可能是南方人民和北方人民的斗争成功汇聚起来，产生一个既普遍又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前景（尊重各国人民在创造未来方面的多样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击溃资本对其衰落的反应，而这样的反应只会导致普遍的野蛮化。历史并非书写于它被经历之前。

至于这个地区，有几个国家有可能成为“崛起”的候选者：埃

及、土耳其、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但它们的崛起就长期而言并无牢固的基础可依，除非通过当前的斗争形成替代性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超越了简单地采用言辞激烈的反帝姿态，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也有效撇清了干系，从而致力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的民主化。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变化发展，或者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崛起。

民主问题无法简单套用代议制选举式民主这个公式加以解决，后者本身就处于危机之中。其替代办法——社会全方位的民主化——也不单单是一个“难以做到”可以概括。在应对这个挑战时，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可能的方案，比如说“开明专制”（而非蒙昧的专制，或者说警察专制）。这些“办法”在遥远的和最近的过去都曾盛行一时，它们并非没有与时俱进的潜力。但民主化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它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并成为构建真正的多极世界的一个部分。

作为对手，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为外围地带（南方国家）拿出了各种方案，但它们之间并无多大的区别：没有什么远大蓝图的警察独裁（过去40年里的主导模式），或者是保守的神权（或种族式政权的）独裁（华盛顿当前的方案），鉴于选举式民主显得软弱无力，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案。

“西方”舆论（如果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过于轻易地相信了政治性的伊斯兰教派是上述国家的不二选择。由于担心落入伊斯兰恐惧症的陷阱之中，所以它们过于轻易地“接受”了这个悲哀的选项——但它并非可行的选择。若干发表于英国和美国的文章（比如说罗斯塔米和波维两人2010年的文章）提出了以下观点：“权力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这里指的是伊朗——与“进步”并非互不相容。反复被提及的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女孩的法定婚龄已经被提高，女性外出工作的人数也已增加，文盲数量、出生死亡率已经降

低，而学生的数量则已增多，诸如此类。这些统计数据当然有其重要性，但它们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国家（例如埃及），所以它们只是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逃脱“现代世界发展变化”的某些最低要求。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系统化的发展已经出现，足以应对上述的挑战。

伊朗并没有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而这与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关系，这样的意识形态无法设想除了现有的市场——也即小得可怜的“集市”——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经济体系，这一点萨义德·拉赫尼玛曾经指出，我本人在讨论索马里的文章中也有所谈及。这与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这样的“市场经济，可怜兮兮且仰人鼻息”，与其“珠联璧合”的则是对伊斯兰教教法同样可悲的阐释，它沦为以粗暴的手段对待女性，迫使她们屈服，还有各种刑罚的使用。在伊斯兰世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世俗化是社会和民主取得进步的前提，而社会和民主的进步又是这些国家及其人民实现可持续崛起的前提条件。

在本书中，我试图说服读者们相信，对于正在进行中的这些事件，除非采取长期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的影响，否则从应对上述挑战这个角度而言，它们将会毫无意义。过去能够给予现在以启迪，从来都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而且与其形成互补的是，破解当前的事件也有助于赋予解读过去以意义。

参考文献

Amin, Samir (2004) *The Liberal Virus: 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in, Samir (2011a) “L’internationale de l’obscurantisme”, Pambazuka News, 18 July.

Amin, Samir (2011b) “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malia?”, Pambazuka News, 17 February.

Amin, Samir (2010) *From Capitalism to Civilis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 New Delhi, Tulika Books.

Rahnema, Saeed (2010) “Ahmadinejad: anti – imperialist or deceptive populist?” paper delivered at an Iranian Human Rights Society debate,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25 November.

Rostami – Povey, Elaheh (2010) *Iran’s Influence: A Religious – Political State and Society in its Region*, London, Zed Books.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系列

- | | | |
|----------------------------------------------------|------------------------------------------------------|--------------------------------------------------------|
|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精）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 | 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前景（上下册）
新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 | 且听低谷新潮声：
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 |
|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 |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谭索 著
2006年9月 |
|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 |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
周新城 张旭 著
2008年2月 | 美国保守主义及其全球战略
姜琳 著
2008年3月 |
|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批判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 | 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
聂运麒 著
2008年5月 | 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李慎明 等编
2008年5月 |
|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 | 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11月 | 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
谭索 著
2009年6月 |
| 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7月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 | 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6月 |
|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
何秉孟 主编
2010年7月 | 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7月 | “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
赵常庆 主编
2011年1月 |
|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20周年祭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9月 |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蔡文鹏 著
2011年12月 | 世界在反思之二——批判新自由主义观点全球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2月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研究系列 (续)

美国中亚战略 20 年：

螺旋式演进

杨鸿玺 著

2012年9月

“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

李瑞琴 著

2012年9月

世界在动荡、变革、调整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1月

世界在反思 (3)：

当代资本主义评析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2月

探索与变革：资本主义国家 共产党的历史、理论与现状

聂运麟 主编

2014年6月

世界格局与我国安全战略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9月

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

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10月

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

张捷 著

2015年3月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慎明 主编

2015年5月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者) 的历史执政及其嬗变研究

汪亭友 著

2015年6月

金融帝国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

栾文莲 等著

2015年12月

战后美国左翼政治文化： 历史、理论与实践

吕庆广 著

2015年12月

国家、阶级、民主与专政 ——中国话语权研究之一

中国话语权研究课题组 著

2015年12月

印度共产党 (毛主义者)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静 著

2016年1月

参考系列

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王玫 等译

2000年11月

古巴雄狮卡斯特的青少年时代

[古巴] D. 施诺卡尔

P.A. 塔维奥 编

宋晓平 杨仲林 译

2000年11月

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 戈尔巴乔夫现象

[澳] 科伊乔·佩特罗夫 著

葛志强 马细谱 等译

2001年6月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俄] B.A. 利西奇金

J.I.A. 谢列平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3年9月

论意识操纵

[俄] 谢·卡拉-穆尔扎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4年2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 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5年1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大元帅斯大林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

文明的对话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等选译
2007年9月

总司令的思考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徐世澄 宋晓平 等译
2008年1月

富国的伪善

[英] 张夏淮 著
严荣 译
2009年1月

卡斯特罗语录

[古巴] 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编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

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栗瑞雪 等译
2011年12月

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张树华 等译
2012年5月

富国陷阱

[英] 张夏淮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8年1月

世界规模的积累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2008年11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 (增订再版)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等译
2009年6月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日] 中谷岩 著
郑萍 译
2010年7月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巴]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郝名玮 译
2012年2月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

[俄] 根纳季·亚纳耶夫 著
胡昊 译
2012年11月

俄罗斯、中国与世界

[俄] A.P. 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日] 伊藤诚 著
孙仲涛 等译
2008年6月

富国陷阱 (修订版)

[英] 张夏淮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英] 拉斐尔·塞缪尔 著
陈志刚 李晓江 译
2010年8月

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

[英] 莱斯利·斯克萊尔 著
梁光严 译
2012年3月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俄] 叶·季·盖达尔 著
王尊贤 译
2013年1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参考系列 (续)

资本主义十讲 (插图版)

[法] 米歇尔·于松 著
沙尔博 插图 潘革平 译
2013年4月

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

[日] 鹤田满彦 著
张迪 译
2013年4月

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美] 约翰·尼古拉斯 著
陈慧平 译
2013年11月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徐曦白 译
2014年4月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2014年7月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

[英] 卢克·马奇 著
于海清 王静 译
2014年9月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埃] 萨米尔·阿明 著
沈雁南 彭妹祎 译
2014年11月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格雷弗弗 著
马维先 译
2015年1月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 著
孙成昊 张蓓 译
2015年1月

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美] 理查德·沃尔夫 著
[美] 斯蒂芬·雷斯尼克 著
孙来斌 王今朝 杨军 译
2015年6月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 美国与苏联 (1941-1991)

[英] 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2015年10月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日] 渡边雅男 著
李晓魁 译
2015年11月

情报的兴衰：一部国际安全史

[美] 迈克尔·华纳 著
黄日涵 邱培兵 译
2016年1月

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美] 山村耕造 著
童晋 译
2016年5月

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 领导地位

[美] 戴维·罗特科普夫 著
孙成昊 张蓓 译
2016年8月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 全球化

[美] 贝弗里·J. 西尔弗 著
张璐 译
2016年1月

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

[美] 詹姆斯·M. 戈德盖尔 著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徐洪峰 译
2017年4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皮书系列

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二）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一）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

2006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三）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

2007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8~2009）——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五）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六）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七）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1~2012）——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八）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2~2013）——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九）

李慎明 主编
2013年5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3~2014）——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4~2015）——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一）

李慎明 主编
2015年4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5~2016）——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二）

李慎明 主编
2016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6~2017）——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三）

李慎明 主编
2017年3月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李慎明 著
2012年7月

“普世价值”评析

汪亭友 著
2012年7月

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王正泉 著
2012年7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毛相麟 著
2012年7月

新自由主义评析

何秉孟 李千 著
2012年7月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陈之骅 著
2012年7月

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姜辉 于海青 著
2012年7月

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徐世澄 著
2012年7月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周新城 著
2012年7月

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梁柱 著
2012年7月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革新

谷源洋 著
2013年5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罗文东 著
2013年5月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解说词)

李慎明 总撰稿
2013年5月

全球化与共产党

卫建林 著
2013年5月

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徐崇温 著
2013年5月

俄罗斯的私有化

张树华 单超 著
2013年5月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朱继东 著
2013年5月

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

吴恩远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

李捷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崇富 著
2013年5月

《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

靳辉明 李瑞琴 著
2013年5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王伟光 著
2013年5月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 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 著
2013年7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历史命运(大字本)

王伟光 著
2013年8月

谈谈民主、国家、阶级和专政

王伟光 著
2015年1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刘国光 著
2015年1月

抽象的人性论剖析

有林 等著
2015年1月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侯惠勤 著
2015年1月

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周新城 著
2015年1月

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

顾玉兰 著
2015年1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老挝：在革新中腾飞

柴尚金 著
2015年1月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迟方旭 著
2015年1月

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与中国应对

李艳艳 著
2015年1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二十年

刘淑春 著
2015年3月

纵论意识形态问题

王伟光 著
2016年10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谈

朱佳木 著
2016年10月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特点

姜辉 著
2016年10月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樊建新 著
2016年10月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周新城 著
2016年10月

社会主义在哈萨克斯坦的兴衰

赵常庆 著
2016年10月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李东朗 著
2016年10月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王正泉 著
2016年10月

欧洲共产党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镌刻史册的伟大贡献

于海青 童晋 著
2016年10月

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

张剑 著
2016年10月